

# 中共党史资料



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交往

我了解的有关杨献珍的哲学“罪案”

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州工作

建国前后取缔一贯道的斗争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杨献珍同志的生平及主要贡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60

1996年12月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北京



国防大学 2 063 7722 2

责任编辑:纪 边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60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12

ISBN 7-80023-986-1

I. 中… 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6306 号

### 中共党史资料(60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62581570 传真:(010)6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

850×1168 毫米 32 开 7.25 印张 160 千字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

ISBN 7-80023-986-1/K·906

定 价:6.00 元

# 目 录

## 回忆录

- 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交往 ..... 尚 钺(1)  
我了解的有关杨献珍的哲学“罪案” ..... 艾恒武(8)  
对杨献珍反对“五风”的一点追忆 ..... 庞长富(40)  
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州工作 ..... 梁灵光(44)

## 专题资料

-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政策 ..... 李荣珍(98)  
建国前后取缔一贯道的斗争 ..... 郭玉强(114)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 梁秀峰(136)  
中共八大对“一五”经济工作的分析 ..... 董志凯(160)

## 人物介绍

- 杨献珍同志的生平及主要贡献 ..... 汪家鏐(175)  
杨献珍的风范 ..... 萧岛泉(180)

\*\*\*  
\* 小 资 料 \*  
\*\*\*

- 长征中的《红星报》…………… 孔宪东 顾 鹏(197)  
历经长征的新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名录 …… 谭 铮(206)  
《中共党史资料》(第 51—60 辑)目录索引 …… (222)

# 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交往<sup>①</sup>

尚 钺

1927年秋，我在国民党的酷刑之下，病倒在浙江省陆军监狱，由于一个朝鲜籍医官对政治犯的同情，我于1928年初被保出外医治。因这个机会，我逃到了东北，改名谢仲武；由于楚图南同志的介绍，到吉林毓文中学任国文教师。这个学校有不少朝鲜被迫流亡到东北的学生。

这个时期，正是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实行所谓“换旗”不久之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公开活动，已开始由沈阳伸入吉林。

毓文中学在吉林省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学校，也是国民党特务很注意的目标，虽然他们在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控制这个学校。

我进入毓文中学的时候，国民党也正在积极打入这个学校。有的教员被收买了，还有一些是新由教育厅派来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如教务高某、训育主任何某、体育主任马某，都是该校老教员，这一时期都成了国民党员，并

---

<sup>①</sup> 该文系中国人民大学已故教授尚钺的一篇遗稿，写于1955年，原件现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革命纪念馆。本书编发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渐渐露出憎恨学生进步活动的言语和情绪；这些人在毓文组成了一个反动小集团，以各种方式破坏进步活动，甚至将图书馆的进步书籍收藏起来。另外，他们又一致地歧视占学生人数比重不小的朝鲜籍学生。

但是，同学的活动却更为积极，成立班会、组织演说会、辩论会，出壁报，订阅进步刊物等等。我感到学生中进步组织是存在的，但不清楚是党的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为帮助党和团推动工作，我选择了李大钊、高尔基、鲁迅先生等革命青年导师的一些文章，进行启蒙式的讲解。

因此，不拘汉族和朝鲜族同学，都与我很接近。我的屋中，经常挤满了充沛着正义勇敢精神的活泼可爱的孩子。这些同学中间，在一年级乙班，有一个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说话不多的朝鲜籍的同学，名字叫金诚柱，这就是后来领导朝鲜人民解放祖国的金日成元帅。

当时他在一年级乙班，是毓文中学的新学生。他常和其他的同学来我处，但每次他总是说话最少的一个。我很注意他这个特点。他使我感觉出他虽然年纪很小（约十五六岁）却在精神深处隐藏着祖国沦亡的惨重伤痛。

为着稍微满足一点他和许多进步同学对我的要求，我尽我的能力和尽快地为他们改作文，并在作文本子上提出鼓励进步和批判不正确思想的冗长批词。一旦谁的文章上我改的少或批语简短了，他们就感到不满足。特别是对朝鲜籍的同学，我曾着重地激励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朝鲜出卖祖国的地主阶级的仇恨，并鼓励他们友爱团结恢复祖国的意志。

我的这种作法，对青年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使反动分子对我与进步同学更加嫉视。

每逢星期日或假期，我与许多进步同学，经常到吉林背后的北山，或龙潭，或其他风景幽美的地方去旅行。金诚柱虽然平素很沉默，但是到了出外游玩的时候，他总是显出一般健壮青年爱说爱笑的活跃精神来。爬山、游泳、冬日溜冰等活动，他都喜好。他的身体很好，提的问题也多，所有关于文学、艺术，乃至其他许多社会科学的问题，几乎他没有不问的，而他特别着重屡次询问的问题，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侵略的各种问题。记得有一次还谈到安重根。当我谈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采用安重根式的恐怖主义手段是不妥当的，他立时警悟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绝不是搞掉一两个大财阀的走狗所能解决的。必须教育人民群众，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组织人民群众。

我们利用课堂，讲述帝国主义侵略及反帝国主义的各种问题。我搜集了当时中国关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论著，拟了一个题纲，为同学作了约一个多礼拜的专题演讲。这讲演，对东北的汉族和朝鲜族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和间接侵略压迫下的青年来说，是特别能够领会的。许多进步同学，尤其是金诚柱的笔记，记得又清楚、又详细。

使我感觉最深的，当时在毓文中学虽然有许多中国同学（包括汉族、朝鲜族）和朝鲜同学，但一般人还存在着狭隘的民族情感的隔阂。而金诚柱和一般进步的汉族、朝



鲜族同学相处的却很融洽。他不仅在班上和所有的同学相处的很和谐,而且他每次到我住室里来的时候,经常是和进步的同学一块儿,使我感觉到他与中国同学之间没有任何隔阂。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当时党或团的教育,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善于团结群众,基本上从自己幼稚心灵中在消灭着这种落后的界限。自然,对于若干汉族的反动教员,特别是他们歧视朝鲜籍同学的恶劣作风,他怀着极大的不满和愤慨。

这时反动教员国民党分子冯某,威胁校长李光汉,要开除进步的同学,特别是进步的朝鲜籍的同学,并且说:“不把这些捣乱分子滴溜(逮捕)起来,学校的课程无法进行”。又污蔑朝鲜同学说:“这些高丽棒子都是日本间谍。”这就暴露出国民党反动派准备迫害进步同学,特别是迫害朝鲜进步同学的卑鄙的阴谋。在毓文中学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进步同学和中朝同学反对反动派压迫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这样一来,反动派就更加仇视进步同学,并特别注意金诚柱。如有一次在教员中间闲谈时,体育主任马某就说:“这些高丽棒子最坏咧,你看,金诚柱这家伙简直仇视我们中国教员。”这是企图激发中国教员对朝鲜籍同学,特别是对金诚柱的恶感的阴谋。当时我反驳说:“他们年纪很轻,不知事的情形是有的。仇视中国教员的情形,我还没发现。”马某立即说:“不要看他年纪小,心里鬼多着咧。”由此,我感觉到这些反动分子,已经在阴谋着要迫害这些进步青年,作他们向国民党反动派报功升官发财的准备了。

我在课堂上辛辣地讽刺着这些卑鄙无耻的反动分子，鼓励着这一百多个追求真理的中、朝两国的进步青年。我教给他们从阶级分析上辨别自己的同伴、朋友和敌人，使他们在阶级社会中对人分清界限，仇恨敌人，并暗示反动分子的阴险图谋。我给他们讲授我所闻所见的一切反黑暗势力斗争的伟大革命英雄人物的顽强奋斗的历史和伟绩，激励他们幼稚的革命意志。

这中间我举的例子最使这些青年孩子感到兴趣的，就是我所知道的有关列宁和高尔基艰苦革命斗争的片断。譬如，列宁在监狱中如何用牛奶写信，指导外边的同志进行反沙皇的斗争，和列宁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类美满社会而奋斗的卓绝事绩。他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有的说：“咱们要学习列宁”，有的说：“咱们到苏联去。”但金诚柱却沉默着。我问他：“你不喜欢到苏联去吗？”他的回答是：“我很想到苏联去学习，可是不把日本鬼子帝国主义赶走，在咱们这里是建设不起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最要紧的还是先赶走日本鬼子。”他对于他的民族和朝鲜人民的深沉的热爱与责任心，在他这样幼小的时代，已经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所以，他总是问：“用牛奶怎么能写信呢？”“列宁怎么能同外边的同志联系呢？”显然他的幼小的心灵中，此时已经很隐秘地决定着长期的艰苦的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因而，要从我的浅薄的经验和知识中，学习列宁和许多革命工作者的斗争经验了。

我也教给他们连我自己知道也很少，实践也很幼稚

的斗争经验和知识。我很想尽量搜罗一些培育他们建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为共产主义、为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人民大众而斗争的方法和经验。可惜,当时我不过是比他们大几岁的大孩子,不论是知识和经验,都还是异常浅薄和幼稚的。

在这样的课堂上,许多进步的学生,都饥渴地希望从我的浅薄幼稚的讲说中,吸取着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特别是在一年级乙班的课堂上的前两排,由于他们年纪最轻,人也最小,对于我的讲话最为注目。尤其是其中我最喜爱的几个最小最进步的同学,其中即有金诚柱,当时为反动派所嫉视的孩子。

因为在我的课堂是这样的课堂,为着尽我所能帮助每一个同学向他自己所要求的方向发展,所以作文题目我虽然也出,但经常让他们自拟,让他们能从作文上,获得他所要求的我的适当帮助。因之,每周一次作文,各种文体,各种意见,都在作文中尽情发表出来,其中,我最深切记忆着的,就是金诚柱的文章。

虽然有叙述,有议论,有散文,有诗歌,但却有一个总的精神,那就是团结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祖国。在有些叙述文里,他尖锐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穷凶恶极的榨取,暗无天日的压迫,以及朝鲜人民群众被迫害而陷落于颠簸困苦,流亡异域,辗转于死亡线上的悲惨生活。因此,在另一些文章里,他就歌颂着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和冒险主义的英雄安重根。

所有这些,就说明了金日成元帅在少年时代,不仅已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恢复祖国的重担肩负起来了,而且从少年时代,努力锻炼自己,多方面地诚恳地吸取为完成自己所负担的历史任务的知识 and 经验,学习着团结群众,使自己能负担起这一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所惜的,只是我的知识不足,斗争经验又十分缺乏,当时未能给他更多的帮助。而且我自己在学期末,便被毓文的反动分子“欢送”出来,带着我对毓文中学的许多同学的热爱,离开了吉林。

# 我了解的有关杨献珍的哲学“罪案”

艾 恒 武

杨献珍同志逝世已经三周年了，今年的7月24日是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杨献珍一生所走过的路程中，有相当长的阶段是坎坷的。两次被敌人逮捕，第一次经社会各界营救无罪释放；第二次被捕，被判处死刑，经过翻供斗争，改判有期徒刑，抗战前夕，经党营救出狱进行抗日。1959年康生借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模式，把杨献珍批判“五风”的言论诬蔑为反党、反“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打击，把校长职务降为副校长。1964年康生又抓住杨献珍用中国古语“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定性为修正主义，企图在政治上将杨献珍一棍子打死。罗织了杨献珍十大“罪状”，免除了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调出中央党校。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一冤案，是由我按照他讲课的思想，写了《“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闯了“塌天大祸”，使杨献珍犯了“弥天大罪”。康生是怎样制造这场冤案的，我作为一个当事人，有责任将我所了解的经过，写出来作为信史留给后人。

## 杨献珍对“合二而一”概念的采纳

杨献珍采纳“合二而一”这个提法，是有个不短的过程的。1956年，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译本出版。杨献珍看到《谈谈辩证法》中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写道：“参看……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斐洛说：“因为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的伟大而光荣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把这个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为自豪吗？”看了这段话之后，杨献珍想：对立统一规律既是一种普遍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能在古代希腊的大思想家的头脑中得到反映，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大思想家，也一定会有反映的。但在中国思想家的头脑中怎样表达的呢？他留心探寻这个问题。1961年他在《兰田县志》中看到一段话，说宋朝有一位思想家叫吕大临，著有《老子注》，晁公武介绍这部书的大意：“盖以老聃之学，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由出，盖至于命矣。”并指出《老子》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为例。杨献珍认为“合有无谓之元”就是对立统一思想，同黑格尔认为“存在”和“无”的统一或不可分性提供转化、生成，是很相近的。1963年明朝方以

智的《东西均》出版，其中提出“合二而一”。杨献珍说：“我认为这个提法与斐洛说的‘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一样的意思。‘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表达法。在看《东西均》这本书时，我采取了‘合二而一’的提法”。

### 杨献珍讲“合二而一”的背景

1958年3月15日，杨献珍在给中央党校干部作《关于整风第四阶段的任务和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报告中说：“这次整风是全民整风，为的是要在全国人民中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确立共产主义思想。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搞大跃进，人人都在大跃进，而资产阶级思想则是跃进的绊脚石，非把它彻底去掉不可。”5月3日他应北大校长的邀请，给北大哲学系师生讲《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工作跃进的关键》。1958年8月，他带领中央党校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到十三陵水库建设工地参加劳动，看到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积极性，他的情绪也异常兴奋。应邀给参加劳动的人员讲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工人阶级是改造世界的人，改造世界的人必须学习使用改造世界的工具。”“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唯一能够使我们对于世界上的事情获得正确认识的认识方法。”“马克思曾经预期将来的世界是一个哲学的世界。我们希望我们的

新中国变成一个哲学的中国，把哲学普及到社会主义中国的人，应当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一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说：“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对于总路线的统一认识，就不能有统一步调、统一行动，……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搞不好的。怎样才能使大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有统一认识？那就只有大家都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才是。真理是客观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只能有一条。只有大家有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才能发挥出无比伟大的力量来。而达到统一认识的方法，就要用唯物辩证的方法。”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同时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党校除新疆干部班和自然辩证法班外，其他各种班次均停办，工作人员除一小部分留校坚持工作外，大部分下放到农村、工厂，在大跃进中锻炼。杨献珍领导新疆干部班和自然辩证法班学员和留校工作人员，为完成“1070万吨钢”，为“提前完成12年农业发展纲要”贡献力量。学员用土法炼钢，行政处种一亩小麦试验田。煞时间形成生产热潮，学员楼的院子里，机声隆隆，烟雾迷漫，学员们夜以继日炼钢。行政处参照社会上的贯彻“农业八字宪法”的丰产经验，把土地深翻三尺，分层施肥，采取密植，下种二百斤，等等措施。没有订产量指标，是想看看到底能产多少斤。长出的苗太密，拔一行留一垄，垄中疏苗；还密不通风，就架起鼓风机往田里吹风；为防倒伏，钉上木桩拉上



草绳扶苗。就这样不断努力,收了734斤。杨献珍还到山西太谷、河南登丰看望下放干部,了解那里的情况。以后他又到河北徐水、河南七里营、崆峒山等地视察,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学员也跟他到这些地方参观,在大跃进中学习。

杨献珍在视察中看到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异常高涨的同时,他看到听到实际工作中出现订生产计划的浮夸现象,有的社队订亩产小麦几千斤、几万斤、几十万斤,甚至有个别社队订到120万斤的计划。虚报产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有的社办工厂,白手起家,苦干几十天,要生产出汽车、拖拉机、飞机,甚至要造火箭放人造卫星。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一大”就是越大越好,并小社为大社,一乡一社。“二公”就是越公越好,消灭一切私有,不仅平调农民的生产资料,而且平调农民的生活资料,归集体所有和使用。在分配上,实行食堂吃饭不要钱,有的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嫁”全包下来,实行各取所需。在生产上,贯彻“全民炼钢”,把农业劳动力调到钢铁第一线,背矿石,建土炉,大炼钢铁。农业战线只剩老弱妇女,地里的粮食收不回来。用片面性形而上学方法指导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提出深翻土地“越深越好”,密植是“越密越好”,施肥是“越多越好”,有的地方由于这种极端做法,造成颗粒无收。收购农产品,按虚报数字收购,只购不留,甚至把农民口粮、牲畜饲料和种子都给“购”去了。这些做法遭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就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推行,轻则辩论、打骂,重则捆绑、关押、饿

饭。由于购过头粮，群众挨饿，造成非正常死亡。干部在群众生活困难时，多吃多占，生活特殊化。这些问题当时被概括为“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生活特殊风”，统称为“五风”。

就是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杨献珍对“五风”进行了严厉的尖锐的批评。他首先是从1958年11月19日给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讲《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作用问题》开始，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

随着“五风”的表现和危害越来越严重，杨献珍批判“五风”也越来越尖锐、“刻薄”。1959年6月12日和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的谈话——《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1959年6月19日在全国文联作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报告；1959年7月29日和中宣部政治经济学学习班的谈话——《离开唯物主义是危险的》；以及1959年10月13、14日在中央联络部组织的一次集会上发表的讲话：《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这几次讲话，是杨献珍批判“五风”的代表作，也是康生抓杨献珍“右倾机会主义”的把柄。杨献珍说：“有人说：‘实践就是理论，读书就是教条’。……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读书就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吗？我看靠不住，如有的地方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可是去年，弄虚作假几乎成了

‘流行病’。河南的西平县某公社胡吹‘小麦亩产 7320 斤’，有个科学刊物叫做《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 年第 4 期上登了一篇题为《揭开了 7320 之谜》的文章，……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由’，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的。我看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掩盖 7320 的谎言’，才比较切合实际。科学刊物发表这样的文章，到底科学不科学呢？还有这样一个生产队，为了虚报丰产，放假卫星，就把几十亩水稻移栽在一块供参观用的水田里。白天晒死了，夜间再移栽新的。像这样的卫星还是以不放为好。某地三官庙乡，被称为‘哲学之乡’，他们在大办钢铁时提出的口号是‘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这个实现‘三超’的哲学之乡，它的哲学到底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列宁说过，离开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甚至是反动的。有些人把列宁的这些话忘记了。还有人拿着唯心主义当宝贝，说什么‘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等等。现在应当好好地检查一下，到底是虚报能鼓足群众干劲呢？还是实报能鼓足群众干劲呢？虚报的结果搞得没饭吃，搞得群众脸都浮肿了，这叫群众脸上有光吗？”“面对着唯心主义成灾的形势，党校现在的任务更重了，要培养实事求是的作风，要狠狠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和由此产生的荒唐行为。不把唯心主义批透，说不定哪一天还会刮起这种风来。”杨献珍说：“去年刮的‘共产风’，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而是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背道而驰的东西，马克思把这种思潮叫做原始的共

产主义。‘共产风’实际上就是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初期、在欧洲一度流行过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形式，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绝对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要是我们把去年刮‘共产风’的人有关思想研究一下，就很容易看出古今中外的原始共产主义是何等相似。有人说，公社成立后，就是各取所需，要什么有什么，……共产主义使人们享受共同待遇，不分技术高低和劳动创造的财富多少，……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有钱一律归公，孩子也是大家的。劳动的有吃有穿，不劳动的也有吃有穿，什么都是人人一份，什么你的、我的，都是一个样”。“马克思指出：原始共产主义实质上是私有制的普遍化，即普及到集体的每个成员那里的私有制的表现形式，……原始共产主义既然是以实现普遍化了的私有制来反对一般私有制，它势必要把一切不可能为每一个成员所私有的财富破坏掉。……他们要求人们平等地占有财富，结果是财富的消灭；他们为了分配的平等，而否定人们才能上的差别，可是只要人们的才能上还存在着差别，分配上的不平等实质上是平等的表现形式。否定这种形式的平等，就把平等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结果是生产率下降，以至整个社会经济破产。因此，恩格斯非常生动而深刻地把这种思潮叫做‘狂暴的幻想’。”“用原始共产主义来消灭私有制，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倒退到尚未达到私有制的生产力水平的社会里去。在那里，没有任何文明与文化，只有一群贫困的、没有理想的人，他们和物质世界的关系用近似于动物对物质世界

的状态表现出来。我也很怀疑有些热衷于刮‘共产风’的人能否言行一致,真正愿意去过他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生活’,因为马克思还说过,原始共产主义不过是挂着公有制幌子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个表现形式。”“随着去年的‘共产风’一齐而来的还有各种胡言乱语。有的人说,建成共产主义,只要人民觉悟提高就行了,不一定要物质基础很丰富。……进入共产主义,不是根据什么规律,而是由某个人说就算了。”“这些大概是他们‘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吧!”杨献珍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是科学的,是因为马克思严格地依据历史和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来论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正如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书中所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是完全而且仅仅根据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我们有些同志,……不分析我们经济上成熟的程度,不考虑物质基础,凭脑子一热凭主观愿望,嘴一张,以为说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本来是集体所有制,这样的所有制是和我们现实的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合的。如果在公社成立后,谨慎行事,现在的情况会好得多。可是有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急急忙忙地宣布改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又急急忙忙地宣布全民所有制就是共产主义,这就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不同的社会阶段,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给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准备好了条件,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够为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

社会过渡提供物质基础。一切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都必须首先热心于积极地、老老实实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为全国的高度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努力奋斗。”“去年也有‘浮夸风’、‘瞎指挥风’，……主观能动性当然要讲，但排斥客观规律性的主观能动性则是瞎指挥的思想基础。”杨献珍针对“强迫命令风”的较为普遍存在，引用毛泽东的话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人与人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敌我关系，处理人民群众与敌人的关系，就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再一种是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处理这种关系，毛泽东同志讲要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因此，……首先应当注意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个最根本的问题研究起，才能把群众路线研究得比较深刻、透彻。”他在尖锐地批评“五风”的同时，以急切的心情，用唯物论、辩证法原理结合当时的实际，论证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以使之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相符合。

1959年8月杨献珍参加了庐山会议后期的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结束后，“反右倾”斗争开始推向全党。康生这个批判彭德怀的最积极的分子，抓住杨献珍的几次讲话、报告中批判“五风”的言论，按照庐山会议批判彭

德怀的模式，发动中央党校党委对杨献珍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康生、陈伯达等找杨献珍谈话，指出他的“严重错误”，责令他进行检查，承认错误，改进党校工作。12月9日康生召集党校党委委员开会，部署对杨献珍的批判。从1959年12月15日起到1960年6月16日，共开了22次全体会议，进行长达6个月的批判。康生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一唱一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教学上犯了“不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方针性错误”；等等。杨献珍也不得不作了违心的检讨，校长职务被降为副校长。不久，任命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兼党校校长。任命艾思奇、范若愚为副校长，艾思奇主持日常工作。

全党“反右倾”斗争的直接后果是1959年冬季又刮起“共产风”来，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1959年冬季又刮起来的“共产风”。1961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各级领导“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就在这个时候，根据安子文的建议，王从吾校长批准杨献珍到下边去进行调查。1961年2月26日，杨献珍西出潼关到西北调查

研究。到达西安之后，参加了陕西省三级干部会议，阅读了会议简报。还借阅了甘肃省和新疆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简报。这些简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和杨献珍 1958 年到 1959 年在河南、河北、湖北、天津等地所看到的那些“五风”问题几乎完全相同。这个事实表明“五风”问题带有普遍性。三级干部会上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唯心主义口号作了批判，杨献珍非常高兴。他感到自己 1959 年讲的那些话并没有错误，因为讲话中批到的那些问题，正是今天中央和省三级干部会上批判的错误。杨献珍在陕西、新疆调查研究时，应陕西省委和新疆自治区委之邀，就“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问题向干部作了报告，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总结三年的经验教训，提高到世界观、方法论上进行分析批判，使很多干部有茅塞顿开之感。

1961 年 6 月中央在《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中规定：“过去批判和处理错了的，要改正过来。恢复名誉，恢复职务；部分问题批判和处理错了的，改正这一部分问题的结论。错误地对群众(包括富裕中农)进行的批判，应向他们道歉，……”。1961 年 9 月，杨献珍调查归来，首先向王从吾校长汇报调查工作情况。同时许多党校的学员、工作人员到杨献珍家来看望他。建议杨献珍以《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问题》，给中央党校学工人员作一次报告。王从吾校长也同意讲这个题目，从总结经验教训入手，进行思想发动，解决中央高级党校几年来的种种问题。



杨献珍将要以《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为题讲课的消息,很快在校内外传开,前来联系听讲的人很多,教务处应接不暇。1961年11月7日讲课这天,停车场上停满大小轿车。有的人还是从外地乘火车、飞机赶来听讲的。盛况空前。他从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和世界观、方法论、思想方法的一致性三个方面展开,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符合我国当时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实际的方针政策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讲课多次被听讲人的热烈鼓掌声所打断。绝大多数人,认为杨献珍能在“五风”猖獗时,对这些危害国家民族、危害人民利益甚至生命的现象,进行无畏地批判,真是难能可贵。但也有少数人,持不同看法。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中央党校的主要领导人王从吾、杨献珍、侯维煜、艾思奇等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对杨献珍说:“听说1959年你在中央党校也受了批判。我看现在可以翻身了。”会议结束后,2月下旬向全体党员干部传达了大会文件和领导同志的讲话。很多学工人员,包括党委委员中的多数,向王从吾校长提出为杨献珍甄别平反的意见。于是经过一番准备,校党委一致通过给杨献珍平反的决定。

然而,正当全国受批判的干部得到平反,切实抓起工作,全国形势有些好转,难关正在渡过的时候,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又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把党内的一些不同的认识问题说成是“人民群众同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有人把当时形

势说成困难形势的‘黑暗风’，主张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求平反的‘翻案风’。”形势发生了180度的变化。这时蛰伏已久的康生，又活跃起来，反对给杨献珍平反，说什么“我说杨献珍问题可以甄别，并没说给他平反”。在康生的干预下王从吾被迫离开党校。在他离开党校之前，以校长名义给中央写报告：“杨献珍虽然有错误，但他没有反对三面红旗，不是右倾机会主义；鉴于他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他的这一案，可以了结。”彭真在此报告上批语：同意为杨献珍平反。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在彭真的批语上划圈表示同意。1963年1月中央任命林枫为中央党校校长。由他宣布了中央同意为杨献珍平反的批示。但是康生对杨献珍问题的平反，却耿耿于怀，窥视着杨献珍的言行，以便抓住把柄，再作较量。

林枫来党校后，曾对杨献珍说：希望你能多给学员讲讲课。杨献珍从1963年到1964年6月的活动主要是备课讲课。1962年11月杨献珍给学工人员讲《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时，哲学教研室辩证唯物论组组长黎明派我和李公天一起去给杨献珍讲课作记录并整理此稿。从此我开始帮助杨献珍作些工作，主要是给他提供资料和整理稿件。1964年元旦，我到艾思奇处表示祝贺新年时，艾思奇对我说：“林枫校长说杨献珍的年纪老了，让哲学教研室派年轻人去跟杨献珍学习，把他的东西接过来。你是否去跟杨老学习？”我表示同意。就这样，我就实际上在给杨献珍作助教工作中向他学习，跟着他

活动。1963年11月6日，杨献珍给学工人员讲《哲学引言》，印发一件《“是——是，否——否；是——否，否——是”是什么意思？》的资料，其中在批判形而上学思想的“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命题时，第一次用“合二而一”这个概念。在这篇资料中写着“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是一个意思”。在讲课时并没有讲“合二而一”。1964年新疆干部班学习哲学，我下到班里主持哲学教学工作。学员们听说杨献珍1962年讲《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情况，因此，在订教学计划时，新疆班办公室主任向我提出：学员要求杨老除讲尊重唯物论外，还要求给他们讲尊重辩证法。我把学员要求向杨献珍提出，杨献珍同意了。讲题为《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去做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在此次讲课中不仅提出“合二而一”的概念，而且给“合二而一”以确定的含义。

### “合二而一”的含义

杨献珍说：“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的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抓住了辩证法的核心。’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

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对立面的统一,意即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面构成的,或矛盾构成的,……‘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二本于一’”。他还说:“对立的统一或矛盾的统一,读的时候,因具体情况不同,有时重读‘矛盾的’三个字,有时重读‘统一’两个字。读法不同意思就有所不同。矛盾的统·一,意思是说,不要忘记这个统一是由矛盾构成的。矛盾的统·一,意思是说,虽有矛盾,但是能够统一的。前者意思侧重在矛盾,后者意思侧重在统一。”“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的联系着的,当强调一个侧面的时候,不要忘记另一个侧面。”矛盾的统·一,不只是说,矛盾双方不可分离地处于一个共同体中,也包括着矛盾的斗争,‘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他认为“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二本于一”一样,都是对立统一的通俗表达,它既包括对立面的互相联结,也包括对立面的互相斗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矛盾的统·一侧重同一性方面,矛盾的统·一侧重在排斥、斗争方面。”这是杨献珍的关于“对立统一”即“合二而一”的总的论点,或者说是“对立统一”的定义的解释。

杨献珍的《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针对我们干部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中的片面性讲的。因此,他虽然也讲了对立面的斗争和对

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问题，但是大量的篇幅、重点是讲对立面的互相联结的同一性的。他说：“辩证唯物论的对立面是形而上学唯心论。”“什么是形而上学方法呢？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在形而上学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中的反映即概念乃是个别的，不变的固定的，永远如斯的东西，应当一个一个地、彼此独立地受到研究，它是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他的说法：是——是，否——否；除此以外，即是鬼话。在它看来，一个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同样，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而又是其他事物。正与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与结果相互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对立中’。这里恩格斯描写了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方法，就是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要就是这，要就是那。要购就购光，一点不留。在购与留中间有什么关系，它看不出来，这就是片面性。”杨献珍说：“‘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着’的方法，形而上学的方法、片面性的方法，是相当普遍的。例如现代修正主义者把和平与战争绝对对立起来（不是和平共处，就是人类毁灭）。在我们的干部中，这种情况也不少，如把民主与集中对立起来，把多快与好省对立起来，把数量与质量对立起来，甚至把劳动与休息对立起来，如此等等。他们没有能力把两个思想联系在一起”。“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就是说，要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来做工作，学会两条腿走路。”

杨献珍说：“什么叫对立统一，需要把这句话的意思

弄明白。”毛主席说：“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一方，它自己的这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对立面的统一’，意即对立的两个东西本来是不可分离的联系着的。”杨献珍接着用对立面的互相联结的同一性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用大量的事例说明要学会用对立统一规律指导工作。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民主集中制就是对立统一；自由与必然是对立的统一；……个别与一般，生产与消费，购与留，产量与质量等对立统一。”他还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典范。统一战线政策是辩证法，关门主义是形而上学。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反对帝国主义，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这就要求研究对立面是怎样能够同一的。此‘同一’是指共同要求。”“共同要求”是同一性的一种具体情形，不是同一性的等同。同样道理，“共同点”、“求同存异”也不是同一性的同义语。杨献珍说：“事物本来是由矛盾的两个侧面构成的，两条腿走路，而只抓住一个侧面不放，用一条腿走路——这就是片面性。……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不可分地

联系着的，而硬要把它分开，只抓一面，这是人为的，是违反事物本性的。”“要经常记住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经常记住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实际工作中的片面性。”

杨献珍虽然是为了克服片面性的方法，把重点放在对同一性阐述上，占的篇幅也较长，但是他并没有忽略论述的完整性，没有孤立地讲同一性。他是全面论述对立统一规律的，也论述了对立面的斗争和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他说：“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矛盾的统一，不只是说矛盾双方不可分地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也包括着矛盾的斗争的意思。‘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对立的两个侧面，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也是对立面统一规律。”“没有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对于“转化”问题，杨献珍也讲了不少。他说：“矛盾双方因一定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情形叫同一性。这是矛盾同一性的第一种意思。矛盾双方因一定条件又互相转化，这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思。”

在讲完对立面的统一，对立面的斗争和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之后，杨献珍还讲了对立统一规律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他说：“学习对立统一学说，是为了学会分析方法，即所谓一分为二。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主席说：‘一分为

二,这是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主席在《矛盾论》中讲了辩证法的宇宙观之后说:‘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 “罪案”的制造

杨献珍同志只是在课堂上讲了“合二而一”的问题,并没有发表文章向社会上宣传“合二而一”理论。是我把他讲课的“合二而一”概念和内容写成文章,闯了“塌天大祸”,使杨献珍坐了“弥天大罪”。1964年哲学教研室订计划时,要求我写两篇文章,争取在中央的报刊上发表一篇。当杨献珍在4月3日给新疆干部班讲课中,把“合二而一”、“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作为同义语提出,并且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来论证“一分为二”的两分法以及按照事物发展规律来改造事物理论时,我的正在考虑写文章的题目和内容的脑子,一下子就反映进来,立即就想到《“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是个写文章的好题目,从客观事物的“合二而一”即“对立统一”原理来论证“一分为二”的两分法的正确,进而论述根据对立统一规律——“合二而一”来改造世界,避免形而上学片面性。下班回家,就把杨献珍讲课和我考虑写文章的想法告诉我当时的好友林青山,并提意我两人合写此文。当即得到林青山的赞同。我本想请林执笔写文章,因为他分工是讲辩证法的,我是搞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林又把执笔给我推回



来了，他说：“是你听杨老讲课，体会深，我还得备《反杜林论》辅导课，由你执笔。”我只好承担下来。我们商量就用杨献珍讲课的逻辑结构写，他讲课举例很多。写起来并不费力。四个晚上就把初稿写出来，林看后没作改动，签了名，送辩证唯物主义组组长黎明征求意见。黎明提了点意见，我们又作了些改动，就由黎明推荐给《光明日报》哲学专刊。黎明看过我们这篇文章后，于5月14日辅导《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时提到：对立统一规律有“一分为二”的问题，也有“合二而一”的问题。过去“一分为二”讲的多，“合二而一”讲的少，大家可以研究，写写文章。5月中旬，《光明日报》印出《“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清样由编辑王愚送来，交给林青山，说：“准备发表，文章写的清楚，对主席的哲学思想是有体会的。不过有人也说：已经有对立统一，再用‘合二而一’来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标新立异。”这些是我从学员班里回来时林青山转达给我的。当我听到“准备发表”，我很高兴，因为我的当年写文章的任务将完成一篇；当我听到有人说是“标新立异”时，我又考虑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标新立异，是非同小可的事。我对林说：“文章发表不发表，以后再说！”林当时反复说，让他们发表。我坚持以后再说。林表示由我决定。我是既想发表，又有顾虑。当晚，我把文章清样给杨献珍送去，对他说：“我根据你讲课的内容，写了《“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光明日报》印出清样送来，说准备发表，有人说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是标新立异。您看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这个提法是否

能站得住？”杨献珍说：“站得住，中国哲学史上早就有人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了，他不知道就说是标新立异。”杨献珍看了清样后，让秘书给送来，指着划红线的地方说：纠正了你们用古汉语形容词的不准确之处。第二天，我跟杨献珍去听他讲课，休息时我问他：“您看这篇文章能不能发表？”他说：“写文章不要怕人家攻。”我考虑提法站得住，当然不怕别人攻了。于是通知《光明日报》，同意发表了。

《光明日报》在给我们送来清样时，由康生掌握的，以关锋、吴传启等人组成的“反修哲学小组”中的一个成员到《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编辑那里，看见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清样，拿了一份到“反修哲学小组”。这时，康生也拿到了这篇文章的清样。1962年反对给杨献珍平反的康生，在中央批准给杨献珍平反之后，就在窥视着杨献珍的言行，以便抓住辫子再进行打击，当他看见中央党校两个哲学教员写的与“一分为二”相对立的“合二而一”文章，当然不能轻易放过。据范若愚在他写的《“合二而一”批判由来》中揭发：康生说：“《光明日报》打了清样送给我看，我一看有问题，就告诉《光明日报》，凡是这类稿子一律扣起来不发。”关锋看见清样后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康生还说艾、林“是杨献珍的代言人”。康生抓到了整杨献珍的机会，阴谋便开始了。先是布置“反修哲学小组”写反对“合二而一”的文章，设置埋伏。文章写出后康生通知《光明日报》发表《“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登于1964年5月29日“哲

学”专刊。紧接着一期“哲学”专刊又发表“反修哲学小组”“项晴”署名根据康生指示写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当天康生“叫江青送主席看”。《中央党校大事记》记载：“1964年6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号召展开对‘合二而一’的批判”。正如范若愚后来回忆所指出的：“从此以后，他（指康生——引者）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欺上骗下，就把‘合二而一’这个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搞乱了。”康生这个阴险狡诈的家伙，整人是他的特长。他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把合二而一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搞的。开始是以学术争论作伪装，有意识地引起大家讲话。他在6月27日说：“关于‘合二而一’问题，还可再放出四篇错误意见来。”这场所谓学术讨论，在中央党校被康生“引蛇出洞”“策略”引出来的和在其他方面和杨献珍有关系而遭迫害的学员和工作人员达150多人。社会上写文章参加“讨论”赞成“合二而一”的，无论文章发表与否，都由报社指定专人登记报原单位进行批判。1964年8月31日康生讲：“大区书记（还有省里的）开会，报社把‘合二而一’问题整份材料交给他们。”有人揭发说：批判“合二而一”以来，“报社每天收到许多来稿，每天将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来稿，专门写一份书面材料，写明作者的地址、单位和文章标题。康生要将各省有同意‘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作者列出名单，交给各省……过了一段时间，有几个省来信索取这些同志的文章，报社都照寄了，后来听说这些同志许多都挨批了。”

把“合二而一”和“合二而一”的作者“批倒、批臭”，这是康生制造冤案的第一个步骤。

第二步，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杨献珍。

当康生知道《“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作者是中央党校的教员，是听了杨献珍讲课，按杨献珍的观点写的文章后，向中央党校索取了在新疆班翻译手中放着的杨献珍的《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讲稿。根据这个讲稿，由康生主持的中央理论小组反复修改炮制出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文章，题目是：《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商榷》。文章一写好，立即排印，送到钓鱼台，由康生主持定稿后，康生提出让范若愚署名，范不同意，让艾思奇署名，艾也觉得不合适，建议由新疆班工作人员署名较好。后来这篇文章的署名者，王中、郭丕衡曾回忆说：“7月16日艾思奇同志把我们两人找去，……说这里有一篇文章你们看看，如果同意的话就用你们的名义发表。当时，我们错误地认为，……‘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的，赞同批判……所谓错误。在这种错误认识下，就同意用我们两人的名义发表那篇文章”。正在艾思奇和王中、郭丕衡谈这件事时，《人民日报》来电话，说《商榷》明天（即7月17日）要见报，用谁的名义发表是否定了下来？艾思奇在电话中告诉对方，用王中、郭丕衡的名义发表。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商榷》，报社把“郭丕衡”写成“郭佩衡”了。这篇文章连作者的名字也不是“作者”写的。康生说：“在党报上公开批判一个中央委员不是随便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杨献珍在

政治上的批判。”“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

康生是怎样把杨献珍的《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讲稿，用文字狱的手段，罗织出《商榷》一文，一步步地制造成冤案，把杨献珍整垮的？

《商榷》完全不顾杨献珍讲稿中对对立统一的全面论述，完全不顾讲稿中对于对立统一的明确无误的含义，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把对立面互相联结的同一性的命题抽出，孤立起来，用以偷换杨献珍的关于“合二而一”即对立统一规律的命题。《商榷》说：“什么是‘合二而一’呢？杨献珍是有很确定的解释的：他硬说‘合二而一’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并把对立面的统一做了不正确的解释，他只强调对立面的不可分性，而不强调它们的斗争性。他反复地说：‘对立面的统一思想，只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的联系的’，‘矛盾的统一，只是说矛盾双方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意思’。”然后批判说：“决不能说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只是说’的对立面不可分离地联系着，因为它还要说到对立面的互相斗争。把不断地相互斗争的对立面的联系说成是‘合二而一’，是错误的。”进而提出责问：“难道这种把对立面调和起来的方法是辩证法吗？”这就把杨献珍的对立统一亦即合二而一的辩证法的核心改造成批判所需要的矛盾调和论了。因为康生的这一套手法，是借人民群众对党的报刊的信任来实现的。这样欺骗之后，动员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和群众对杨献珍进行围剿，提到政治上去批判。1964年8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受康生直接领导的关锋等人以“撒仁兴”署名的《“合二

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明明是关锋等人用对立面互相联结的同一性的命题偷换对立统一规律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命题,还用组成统一战线的基础的“共同点”、“共同要求”概念偷换了同一性命题,篡改了杨献珍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定义,却反诬杨献珍“曲解对立统一规律”,“把对立统一规律说成只是对立面的‘不可分离地联系着’,这就从根本上排斥和抹杀了对立面的斗争及其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于是对立统一规律,就被偷换成‘合二而一’”。更有甚者,当关锋等在杨献珍的讲稿中找不到用以偷换“在一定条件互相转化”的语言时,竟用逻辑推理,演化出他们进行政治“批判”所需要的论点,强加给杨献珍。他们说:“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是一种排斥矛盾斗争的哲学,并且从否认斗争合乎逻辑地否认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关锋等用偷换命题的手段把“合二而一”篡改为排斥斗争;又用逻辑推论出“合二而一”抹杀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另一方面,关锋等赋与“一分为二”以斗争哲学的意义,他们说:“‘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承认事物通过斗争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从而在社会观上坚持阶级斗争和革命,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排斥矛盾斗争的‘合二而一’哲学,必然导向于阶级调和论;那些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的谬论,那些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归结到哲学世界观上来,无非是排斥矛盾斗争的‘合二而一’的哲学,无非是

折衷主义的诡辩哲学。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合二而一’哲学出发，在思想上，理论上和政治实践上，就不是划清阶级界线，而是混淆阶级界线；就不是实行无产阶级斗争，而是实行阶级调和，阶级妥协，为资产阶级效劳。所以说，‘合二而一’论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

1964年7月24日康生讲：“党校斗争，从‘合二而一’必然要向另外方向发展。党校讨论‘合二而一’已经一个月，会发展向‘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去。政治上一定会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讲话问题和1962年翻案风问题上，党校办校方针、对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态度问题。……会涉及到党校八年来的问题。”由于康生上述讲话的引导，中央党校于1964年8月4日召开了全校大会，对杨献珍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命题”和“综合基础论”进行批判，接着8月17日起又连续举行三个半天的全校大会，将“合二而一”问题与1959年——1960年在高级党校党委内部对杨献珍的批判和1962年杨献珍的“翻案问题”联系起来，认为杨献珍是一贯地“用形而上学反对辩证法，用矛盾调和论反对对立统一规律”。实际上这是一次从政治上、理论上、世界观上到个人品质、作风上对杨献珍的全面否定。

为了把杨献珍从理论上驳倒，政治上一棍子打死，康生、陈伯达还下令《红旗》杂志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给杨献珍，给“合二而一”定性。康生于8月23日说：“已告诉《红旗》写文章，要《红旗》开展政治批判。”文章初稿写出后，在北戴河讨论修改两次。认为对“合二而

一”在理论上并没有驳倒。经过康生反复斟酌,决定文章不用“本刊评论员”名义,改用“本刊报道员”名义,题目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为了提高这篇文章的质量,收集到一点真赃实据,《红旗》杂志编辑部于1964年8月24日下午、晚上和25日上午,连续三个单元时间在中央党校召开有《红旗》杂志的人员、中央党校学员支部代表、工作人员支部代表、哲学教研室部分人员,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哲学研究所等单位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会议要求大家回忆一下,‘合二而一’问题没有拿到社会上以前的情况,并要公诸于世,用报道的形式发表。中心是谈杨献珍同志的观点的发展和影响。当时我也被通知参加这个“座谈会”,目的是要我交代问题的。关于写《“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前后,我早就一五一十地交代了。在这个会上不过是再说一次罢了。我正在讲的时候,有人突然打断我的发言,问我:“你们考虑到‘合二而一’的发明权算谁的没有?是杨献珍同志的,还是你艾恒武、林青山的?杨献珍为什么把发明权让给你们?”我说:“学生按老师观点写文章,是平常的事,没有想过发明权问题。”他们又严厉地质问:“艾恒武,你要交代杨献珍是怎样授意你写文章的。”我说:“他没有授意,是我自己写的。”他们看我没有响应他们的质问,便以诱导的口吻对我说:“从本质上看,不要从现象上看,就可能看出是杨献珍授意你们写文章的。”我还是说:“他没有授意我写文章。”大概是由于我冥顽不灵,他们又转向黎明,问:“黎明,你说杨老是怎样对你说的?”黎明说:“杨老没有对我



说过，我是看了艾恒武他们的文章之后才知道的。”大概是迫于康生的督战，会议的主持人不得不以严厉的姿态出现，说：“你们不要把党看成傻子，你们怎能瞒住？这场斗争不获全胜不会收兵。”“保杨献珍是保不住的。给杨献珍殉葬也顶不了什么事。”“说是杨献珍授意你们写文章还轻了，完全是有组织的指使。”接着又威胁说：“黎明，如果我们意见一致了，就不报道你，只报道艾恒武和大家的揭发。”但是要让黎明这样的共产党员就范，是不容易的。他严辞拒绝了逼供。这时一个女学员把林青山叫到墙角处，对他说：“他们的态度不好，不承认杨老授意，你何不趁此机会，争取个好态度，承认杨老授意给你了。”林青山被她说服了，回到他坐位前边，“我说说。”主持人说：“好，你说。”林说：“杨老授意给我了”。会场顿时活跃起来，有的交头接耳，但很快静了下来，听讲如何授意。这时会议主持人又问我：“艾恒武，他说授意了，你看怎么办？”我说：“他说授意了，你就按他说的办。”林说：“我对杨老说：我们根据你讲的课写了一篇文章。杨老笑眯眯地，没说话，我理解这就是授意。”主持人对林青山交代的所谓授意。并不满意，说：“算了，你也别笑眯眯的了”。24日晚的会无结果而休会。25日上午继续开会；主持人说：“昨天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认识没有取得一致。如果我们一致了，就一句话：杨老在党校讲，不满足，要拿出去，授意你们写文章，你们根据杨老讲课内容写了文章，杨老积极支持。现在你们没有勇气证实杨老的授意。”“不能从杨老是否让你们写文章的话来认识，要从本质上来认识授意的

问题。”通过这次会我才认识“从本质上”这块画皮，可以掩盖多少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鬼蜮伎俩。没有的事，“从本质上”看，可以变为有，是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可以变为非；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从本质上”看，可以连在一起。

《红旗》编辑部的“座谈会”开完之后，1964年8月31日出刊的《红旗》第16期，刊载了该刊报道员：《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新论战》虽然没有“授意”二字，但是康生这个刀笔吏罗织出来的文章，使人们一看就意识到我们的文章是在杨献珍授意下写的。《新论战》说“1964年4月杨献珍同志在高级党校新疆班讲课时，便进一步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论点，把它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了。接着，杨献珍同志千方百计地宣传他的‘合二而一’论，企图把他的反辩证法的观点，塞到他所能塞到的地方去，……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同志也在课堂上宣扬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5月14日黎明讲课时说，现在‘一分为二’讲多了，‘合二而一’讲少了。他还鼓动大家写文章来宣传‘合二而一’论。“艾恒武、林青山都说，他们在写‘合二而一’文章过程中曾多次同杨献珍商量。杨献珍同志帮助他们修改。黎明也两次给文章提了意见，并做了修改。”“杨献珍同志又给艾恒武、林青山鼓气说：‘文章的观点站得住脚，拿出去吧！’”“这样杨献珍同志的‘合二而一’论，就通过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从高级党校搬到社会上去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也就在报刊上展开了。”《新论战》在理论上对杨献珍的“批判”也没有

什么新招儿，也和《商榷》、《基础》一样，用的手法是断章取义、偷换命题，逻辑推论，把杨献珍的辩证法理论“合二而一”改造成矛盾调和论，然后对矛盾调和论进行作战，《新论战》比《商榷》、《基础》不同之点是政治上纲更为肆无忌惮。

这篇所谓报道和我们写文章的事实经过相反。所以黎明看到《新论战》的歪曲报道后，发表声明说：报道的不是实际情况。因此，他受到严厉的批判，说他“反动气焰极其嚣张，竟敢对党刊发表声明！”哲学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要黎明认清“今天的运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但是，黎明并没有表示收回他的声明。因此他被开除了党籍，调到天津市的郊区县的粮食局，接着又下放到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文化大革命”中继续遭迫害，含恨而死。

我很惭愧，对《新论战》的谎言，我本来也是看得清清楚楚，我觉得我们说的实话，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在《红旗》第16期出刊的同时，中央党校校委1964年9月2日下发一个关于印发《新论战》的《通知》说：“现将《红旗》发表的《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的报道，印发给我校全体学工人员每人一份。大家要逐句逐段、深思熟虑地研究一下这个报道。注意报道中叙述的一些重要情况，注意报道中对问题的分析和提法。认真研究这个报道，将会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合二而一’论的理论和政治的实质，也会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一分为二’同‘合二而

一’的论战,既是哲学上的原则斗争,也是政治上的原则斗争。”为了提高《新论战》的“价值”,校委还印发了《德波林的调和矛盾和否定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论点》的材料。发这篇材料的目的是,用以说明批判杨献珍及其“合二而一”的意义和贡献,相当于苏联之批判德波林。可见,当时批判者们对《红旗》的《新论战》的得意和给与的多么高的评价。

在这一系列的阴谋构陷之后,到运动的后期,1965年罗织了杨献珍十条“错误”,写成《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并决定“撤销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委员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在这场政治大冤案中,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受到株连。仅中央党校就有154人受批判遭迫害。这些人除极个别的态度较好的以外,都决定调离中央党校。我被决定调辽宁省北镇县供销社工作,因当时正在温泉公社“四清”运动中改造,生产队中有一清政治的任务不能结案,故调动未成行。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工作队撤回,我们这些被康生说成是“杨家党”的人,就都不准离校,重整旧案,继续被批斗。杨献珍这位老人,精神上受了污辱,身体上受了摧残。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康生加扣上“叛徒”、“里通外国”的“罪名”。逮捕关押8年,后又流放陕西潼关三年半,开除党籍。可谓一撸到底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献珍的问题得到平反。1979年被任命为中央党校顾问,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这桩哲学“罪案”终于彻底了结了。

## 对杨献珍反对“五风”的一点追忆

庞长富

河南省信阳县是我的家乡，她是大别山根据地的一部分。1958年我在武汉大学哲学系读书时，曾随全系师生下放到大别山根据地的核心地区——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公社劳动过10个月，并到过该县其它公社搞过哲学普及宣传工作。亲身经历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全过程，参加过该地区大办钢铁运动的全过程，目睹了“三面红旗”、“五风”给这个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过无私奉献、巨大牺牲的老区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1960年冬，学校接到通知：不放寒假。春节前夕，我的大妹多次给我写信，说父母和弟弟妹妹“病重”（当时对饿得要死者只能叫“病重”），赶快回家，否则，今生今世可能再也见不上一面了。我多次向系里请假未允，最后，我以母亲“病危”、我的外祖父是黄麻起义时牺牲的烈士，母亲是烈士的遗孤为由，说如不让我请假三天回去看看，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讲要有浓烈的阶级感情呢？在这种情况下，系里只好同意我请假，但要求必须按时返校。我明白，系里为我而不顾禁令，我当然应当以按时返校来报答系里对我的关照、甚至是恩德。

农历大年初一深夜我回到了家。我在家停了一天一宿多，吃了四顿“饭”（主要是树叶之类，大米加起来不到200粒）。我目睹了那场灾难后，就与父亲商量说，返校后我是否给毛主席写封信，把情况反映上去了，也许能拨粮食救灾。我父亲严厉制止说，给毛主席的信，邮局统统扣下，而且会打成反革命，你千万不能写这个信。又说，你、老三在学校读书，老二在当兵，你们仨是安全的，千万不要惹事，你要记住：就是我和你妈、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饿死了，还有你们哥仨，比别人家没有在外边的，要万幸得多。总之，你不要管我们，你也管不了，千万不要闯祸，要把大学读完，将来好为国家做点事。我对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父亲之命是不能不听的。

我返校后，白天强打精神听课、学习，夜里，那些主要靠吃树叶、野草、麦苗而被饿得骨瘦如柴的父老乡亲的可怕可怜的形象，如同过电影似的，一幕幕地在脑海里难以中断，泪满枕巾。痛苦与失眠严重折磨着我。使我非常难过的是“三面红旗”和“五风”给党、国家和人民（特别是根据地的人民）造成如此严重的灾难，但竟不让人、甚至不允许像彭德怀元帅这样的人提出一点批评，不允许说实话，一味地歌颂“三面红旗”。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我于1961年9月9日分配到了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工作。是年11月7日，我有幸去听杨献珍同志为59班（为党培养高层次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班）学员讲授的《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这节课。（杨老的这篇讲稿已被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一书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献珍文集》第二卷)。杨老在这次讲课中,以他所特有的风格,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有针对性地、大量地、准确地,援引了马恩列斯毛的有关科学论述,以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为理论指导,对“大跃进”时期以空想社会主义和主观唯意志论为理论基础的“五风”及其在神州大地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作了无情地揭露、鞭挞。例如,他针对“共产风”尖锐指出:“刮‘共产风’的时候,人们所搞的共产主义不是科学的共产主义,乃是马克思所早就驳斥过的所谓平均共产主义,或者叫做原始共产主义,粗糙共产主义”,“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只能实行社会主义,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按需分配,一切平调。……因为按照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觉悟程度等等,只能这样做”;他针对主观唯意志论指出:“这几年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地方提出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口号,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做得到’,‘只有低产的思想没有低产的土地’,‘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如此等等。这些口号这几年有些地方在实际上起指导作用。请同志们分析一下,这些口号到底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呢?”杨老针对“浮夸风”所放出来的这“卫星”、那“卫星”批评说:“这些都是唯心主义的虚构,是直接违反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原则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而不附加

以任何外来的成分。我们党的传统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就是从这种世界观来的。浮夸风破坏了我们党的这种传统的优良作风。弄虚作假的人是存心骗党、骗人民。”他针对瞎指挥风说：“瞎指挥的人都是些根本不懂科学的人，他们毫无生产知识，根本不懂生产发展规律，却硬要自作聪明，冒充内行，强不知为知。”他针对命令风、干部特殊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应当说是奴隶主的、封建主的、资本家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总之，在杨老看来，“三面红旗”和“五风”及其危害的理论根源是“没有尊重唯物论，没有尊重辩证法，没有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办事”，是“违反了众所周知的真理的结果”。

我听了杨老的这一讲课后，深感杨老是一个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前途与命运有着高度责任心的共产党人和高级干部、老革命家，看到了党的伟大形象，看到了党、国家与人民的前途与希望。听完课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反复回忆与思考杨老讲课的精神，我热泪盈眶——在我们党内的高级干部中，如果有杨老这种精神和认识的人再多一些，“大跃进”的灾难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是可以减轻的，对错误的纠正是可以更及时、更彻底的，党的声誉是不会遭到如此严重破坏的。

从听了杨老这次讲课后，我对杨老就异常崇敬。我为我们党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中央委员、理论家而自豪。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们党培育出杨老这么一个哲学家、理论家、教育家，不仅是中央党校的光荣，更是我们全党的光荣。



# 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州工作

梁 灵 光

## 受命南下 主政羊城

1980年10月，中央决定调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回中央工作，由任仲夷和我接替他俩的职务。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我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对于广东工作，小平同志强调要发挥优势，把特区搞好。他指出：“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带着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我和仲夷南下广东。到广东后，我们专门翻阅了一些书面材料，发现1978年以前，广东连续14年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979年，全省人均工农业生产总值才513元，而全国是636元。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广东只有糖的产量是全国第一，再就是自行车占全国总数的7.7%，其

它数据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数。

在重工业方面，广东基础薄弱，很少大型骨干企业，只有广州石化厂和茂名石化厂以及两个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和韶关钢铁厂，合起来一年也才产 50 万吨钢。此外就是搞了些水电站、矿山和铅锌冶炼厂。

轻工业方面倒是有一定的基础，广州这方面的情况较好，但技术力量和基础水平不高。

运输也存在问题，建国后，铁路只修了广三、黎湛等几条短线，公路质量差，运输能力低，货物进出全靠一条京广线，以及经过黄埔港和湛江港的水路运输。

市场紧张。那时，一个老太太上街购物，兜里竟要揣着四十几种票证，像塘鱼这种广东人喜欢吃的佳肴，广州市居民每人每月才发鱼票 0.5 元，而且还往往兑现不了。好一点的烟更是奇缺。社会上就流传着这么一首顺口溜，叫“中华大地无中华，牡丹四季不开花，前门香烟后门卖，凤凰几时到我家”<sup>①</sup>。这足见当时物质的匮乏程度。

尽管广东存在着上述种种不利因素和困难。但我和仲夷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因为我们有党中央的鼎力支持和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同时还清醒地看到了广东搞改革开放仍存在着巨大潜力和优势：

首先是广东毗邻港澳地区。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交通、信息的中心，轻工、电子有一定的基础；作为广东拓展国际关系的媒介，这方面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

<sup>①</sup> “中华”、“牡丹”、“前门”、“凤凰”均为当时国内的名牌烟。

其次，广东的华侨众多，占全世界 3000 万华侨总数的 2/3，拥有大约 1400 亿美元的资产，而且总的来说，华侨是爱国爱乡的。正如耀邦同志向我们强调指出的：“如果你们把华侨工作做好，把华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对祖国的四化建设很有作用的。”

第三，广州是我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建国后每年兴办两次出口商品交易会。这是广州所独具的优势，它表明广州的市场经济影响较大，对外交往多，因而势必造成群众的观念比内地要开放得多。

第四，广东热带、亚热带资源比较丰富，海域宽广，有 4000 多公里的海岸线，可供挖掘的潜力很大。

第五，习仲勋、杨尚昆等同志在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以及广东的改革开放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因此，我们决心在广东做出点成绩来。

## 解放思想 统一认识

1978 年 11 月 10 日，中央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讨论小平同志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 年 4 月，中央又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邓小平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敏锐眼光和伟大气魄，支持并要求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创造经验。也就是在这次

会议上，中央正式提出了“试办出口特区”和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问题。

同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正式批转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文件说：“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于是，广东凭着中央授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把“尚方宝剑”，担负起了改革开放“突击队”的特殊角色，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我和仲夷到来时，广东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还遇到不少困难和阻力。广州市的一些干部对我说：“现在是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我把这些情况反映给仲夷。于是，他在省的传达动员会上把这“三不”改成了“三真”，明确表示：“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号召广大的党员、干部、群众在新的形势面前，迅速行动起来，提高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广东的经济建设搞上去。

根据省委的部署，1980年11月22日，广州市委、市政府也在市委礼堂召开了一个全市党员干部的传达动员大会，主要是贯彻中央指示和仲夷的讲话精神。我对大家说：“省委领导说：‘广州市工作做得好坏，对我省四化建设和我国的对外影响关系很大；广州要搞好，必须依靠全

省；全省要搞好，就要重点把广州市建设好’。因此，我们要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争取各有关部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不但思想要解放，工作方法也要改进，要善于抓住关键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主动地拿出一套办法、措施来；看准了的，就主动去干，快刀斩乱麻，不要顾虑太多。做错了由市委负责，大家接受经验教训加以改进……”。

刚解放时，广州市是直辖市。后来归省管辖，但市里各部门的领导资格大多比较老，有些不太服气，双方关系不是那么协调。我们下来前，中央领导同志就对我们谈到广东的省、市关系问题。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我们要求广州市委的各级领导应该主动与省里搞好关系，要对省委、省府及有关各部门多请示、多汇报，以争取更多的支持。对兄弟地区、兄弟部门，也要讲团结、讲风格、讲协作，热情相待，互相支持。至于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接触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仲夷也常在会上说：“我们来广东开展工作，不谈过去，主要看现在，看表现，看将来……，”即要看大家对中央“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认识和贯彻程度。我在广州市也反复强调这点，要同志们摒弃前嫌，摆脱偏见，跟上当前的大好形势，要搞“五湖四海”，以团结为重，从而化解了过去的一些不团结现象。

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从1981年4月起，我在广州

专门组织了一次长达1个多月，且是半脱产的学习，内容是清理批判“左”的流毒和残余，统一大家对四化建设的认识，增强使命感。参加这次学习的有市委常务、市革委会副主任和各条战线的主要负责同志。我们前后大约开了11次的学习讨论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纷纷联系本部门、本行业的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7月17日，市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接着，从8月8日起，市委又在前一段清“左”学习的基础上，在市委党校举办了几期县以上党员干部学习《决议》轮训班。到国庆前夕，我们硬是将县以上近万名干部轮训了一次，这在广州市还是第一次。《决议》为我们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振奋了搞四化建设的精神。

1981年9月15日，经过近大半年的酝酿准备，中国共产党广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胜利召开了。大会总结回顾了广州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讨论和制定了广州市今后的建设方针和主要任务，最后选举出中共广州市第四届委员会，市委第一书记梁灵光；市委常务书记许士杰、薛焰；书记欧初、林西、范华；杨毅为副书记。

9月23日，广州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也胜利开幕了。这次大会选举梁灵光为市长，王玄、左铭、汤国良、陈安良、杨毅、林西、欧初、罗培元、钟非、梁尚立、赖竹岩为副市长（以姓氏笔划为序）。

党代会和人代会在广州已多年没开，上届党代会是1971年召开的，相隔10年；而上届的人代会更早，是1965年召开的，相隔16年。从这点就可看出在“左”的思想干扰下，党内外民主生活都极不正常。因此，这两个大会的召开，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新的领导班子的成立，为今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 调整国民经济 加快改革步伐

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但因急于求成，在1977、1978年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新的失误。

针对这种严重情况，1978年底，陈云、李先念致书中央，提出“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李先念还说，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为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我们在实行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之后创造一个良好的新开端。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这一重要决策。随即，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在全国铺开。

### 一、“八·五”省委常委会议纪要出台一波三折

我和仲夷走马上任之际，适逢经济调整之时，这令我们心里颇感为难。经再三斟酌，我们决定还是要根据广东的实际，一方面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调整方针；另一方面

根据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坚持发展生产和对外搞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以调整为中心，安排我省的经济工作，继续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一步搞好特区建设，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统一起来，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把‘退够’和‘前进’统一起来”。

为了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的经济调整政策，1981年元旦刚过，我在市委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前后开了3天。第一天由我传达中央12月工作会议期间小平和陈云的讲话。

记得小平同志的总结发言很简练，他谈了调整、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改善党的领导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总的指导思想就是：一要在经济上进行必要的调整；二要对妨碍安定团结的进行必要的打击，这样才能把调整国民经济工作搞到底。陈云的讲话内容比较多，共涉及14个方面的问题，其中讲到“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市场物价要冻结半年”、“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开国以来经济工作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最后他还讲到，实现四个现代化要靠党的领导，干部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是个大方向，并说：“调整要退够，不要害怕这健康清醒的调整，要退到一毛不拔，不下这个决心不行。”

常委们经热烈讨论后，决定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广州经济调整问题。

1月31日至2月3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如期举



行。会上,我指出,第一,广州的经济调整工作应该退的必须退够。所谓退,主要是压缩基本建设,紧缩行政费用开支,对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我们虽然没有重大基建项目,但全市拟建或在建的大小基建项目有 1000 多个,战线还是长了些,因此要对所有的基建项目排排队,认真进行清理,对那些不具备条件的,可搞可不搞的,效果不好的项目,坚决退下来,而且要退够。第二,该上的还是要积极发展。主要是农业、轻纺、电子、能源、交通、建材、市政建设和科、教、文、卫等方面。为了搞好工业调整,有两个问题要解决好,一是调整的目标要充分利用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使我们的产品不仅赶上上海,而且要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二是要发展消耗能源和原材料少的高精尖产品。要下决心打破行业界限,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专业化协作,进行大批量的社会化生产。当前基建的重点,应放在清还市政建设和人民生活欠帐方面,解决骨头和肉的配套问题。投资来源主要从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解决。……我们还要争取在深圳、珠海实行的特殊政策在广州也实行。

经过整整 3 天的讨论,最后大家一致通过了广州市经济调整的总指导思想,即“经济要调整,政治要安定,精神要文明,特区要前进”。同时制定出如下措施:(一)增收节支。在分担中央、省财政困难后,做到市财政收支平衡;(二)把物价基本稳定下来;(三)注重质量、品种和经济效果,不搞高指标,工业总产值增长 5%(其中轻工业增长 7%),农业总产值增长 4%。在调整经济的同时,争取对

外经济活动有较大的发展；(四)量力而行，努力偿还部分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和文教体卫方面的欠帐，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随后，省委和市委联合派出工作组，对广州市的经济调整和城市建设进行调查研究。5月20日，在广泛深入的调查基础上，我向省委常委详尽地汇报了广州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突出的矛盾以及存在的问题。

我说，广州市是我省的老工业基地，在全省经济建设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1至4月份的经济情况是好的。在重油、煤供应比去年同期减少 $\frac{1}{2}$ 和 $\frac{1}{3}$ 的情况下，全市工业总产值、财政收入、上交省工商税、商业企业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市场供应继续好转。广州市机动财力由过去的1200万元增到7000万元，有条件开始逐步偿还一些欠帐。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重工业的投资比例过大，经济效益很差；电力、燃料和某些工业原料生产能力跟不上，尤其是建筑材料工业薄弱；交通紧张；轻纺工业长期受挤，靠吃老本过日子，造成“三老”（产品老、工艺老、厂房设备老），“四低”（技术水平低、新产品档次低、质量低、竞争能力低）；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生产配套能力差，仓库严重不足；农业生产结构不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

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方面的欠帐更多，主要表现在住宅、供水、供电、民用石油气、通讯、市内交通、市场供应、劳动就业相当紧张；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设施跟不上；城市面貌破旧，市区拥挤，新工业区设施不配套，

环境污染严重等。

据估计,要还清广州在城市建设方面多年积累下来的欠帐,就需要投资 25 亿元。另外,工业欠帐 4 亿元,科、教、体、卫事业欠帐 5 亿元,环境保护欠帐 3 亿元,商业网点欠帐 1.2 亿元,农业欠帐 1.9 亿元。全市偿还各方面欠帐共需 40 亿元。

为此,我们恳请省委对广州的调整工作给予支持。希望省委给广州下放一定的自主权,让广州有个“休养生息”机会,进而加快广州的建设,发挥广州这个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的作用,并带动全省。

从 20 日至 22 日,省委常委用了整整 3 天的时间讨论广州市的经济调整问题,特别是城市建设问题。省委认为,广州市的经济调整和改革工作做得好不好,对全省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是它份量重。广州市工业总产值占全省的 40.6%,外贸收购值占全省 30%,财政收入占全省的 41.5%;二是它影响大。广州是广东省会,是华南地区经济、科学文化的中心,是交通运输的重要枢纽、军事战略要地和历史名城,它还是国内关注的祖国南方的门户和社会主义的橱窗;三是它的经济基础好。广州是广东省重要的工业基地,配套协作条件好,科技力量较强,更重要的是,它的进出口贸易发达。所以,省委明确表示应重新认识广州市在全省所处的地位,各级党委要统一思想,在财力、物力上支援广州的调整工作。但主要还是要靠广州市自己的力量努力把工作搞好。

这次会议,省委领导缜密的考虑后,制定了几条原

则：

(一)把广州作为全省工作的重点,不能把广州市和各地、市等同看待。要在全省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上,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重点支持,以充分发挥广州市这个老基地和中心城市的作用,更好地促进和带动全省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要放宽政策,给广州市更多的自主权和机动权。

(三)大力加强广州市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凡是驻广州的中央、省和军事机关、企业,都要服从广州市的城市建设规划和管理制度,不能各自为政。

(四)在经济调整中,省委适当增加给广州市的机动财力,给予休养生息的机会。

(五)省各有关部门要真正重视和支持广州市的工作,把经济搞活。凡是能给权的多放一些权,能放宽政策的多放宽一些政策,能给钱的要给一点钱,而以前两者为主。

对广州市委在汇报中所提出的有关经济调整的几个问题。省委作出如下决定：

(一)认真抓好工业调整。

全省的工业调整应以广州为重点。凡是广州市技术基础比较好、比重比较大的产品,特别是中央主管部门已确定在广州市布点的产品,要支持广州搞上去,以形成“拳头”,不要分散力量,重复布点。广州市属工业企业的调整和改组,由市自行决定。广州地区的中央、省管企业

调整,也要与全市的调整规划相协调,打破地区、部门所有制界限,按行业进行调整、联合和改组。

(二)进一步搞活对外经济工作。

为了发挥广州市对外经济活动的优势,广州市可先采取下列几项措施:

除中央外贸专业总公司统一经营的出口商品以及国外有配额、国内有计划控制出口的商品,须按规定申请出口许可证外,凡是广州市生产的出口商品和同外区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在中央统一的外贸方针、政策和有关规定的指导下,由广州市各专业进出口公司和联合体直接对外谈判、成交、出口、运输、结汇。

经营外贸的实体,应放在企业和企业的联合体上,同行业的也可以联合起来,组成专业联合企业。凡是广州市出口量占多数的,以广州市为主,组织工贸联合体。市出口量大,品种单一的企业,可由市先成立工贸联合体,直接办理进出口业务。

支持广州市扩大以进养出。今后进料加工复出口的原料、零部件,可免交关税。同意广州市往香港派出人员到粤海公司工作,在公司统一领导下,办理广州市的进出口业务。

扩大广州市引进外资、灵活贸易的审批权。除按规定要上报国务院审批的项目外,有关合作生产、合作经营、补偿贸易、旅游、宾馆、公寓、住宅等利用外资的项目,凡市能自行平衡的,均由广州市负责审批,报省备案;市不能平衡的,应报省审批。

为了加快改造老城市,发展旅游事业,市利用外资建设宾馆、旅游设施、公寓、住宅等的外汇收入,同意按照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及旅游总局规定,全部留给广州市使用。

### (三)改善交通运输。

为了适应广州市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必须相应加强交通运输工作,改善当前某些方面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状况。

为了适应当前急需,广州市可自筹资金建设码头,谁建谁管,产权、收益归谁。

为了保证广州市出口商品特别是鲜活商品的及时运输,同意市组织专业船队,直接经营广州至港澳的运输业务,并适当增辟一些鲜活商品出口码头。

为了搞好广州市的公路建设,省交通厅应增拨广州公路局的养路费用。

### (四)安排好市场。

广州市是我国南方的门户,来往人口较多,购买能力强,商品供应压力大,货币回笼任务重。因此,一定要把市场安排好,全省要给予支持。

广州市的郊县要把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提供日益增多的副食品作为首要服务。

### (五)积极改进财政工作。

1980年,广州市试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已经收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也确实存在上缴省的工商税收稳定,而作为省市分成的“四项收入”不很稳定,地方支出受到影响的问题,同时“利税分家”也不利于促进

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为此，广州市要求对现行财政体制作进一步的改革。省委认为，考虑到广州市多年来各方面欠帐很多，机动财力较少，确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现行体制原定两年不变，因此，今年不作变动。

对于中央的借款任务问题，省财政厅提出，考虑到广州市的实际情况，分配给广州市的中央借款，比例可适当减低；如仍有困难，可在年终结算时给予照顾。

广州市还提出，1980年以来，由于省采取重大措施影响广州市财政收入的部分，应按省人民政府的规定，适当调整市的财政分成基数，或专款结算，在上交款中扣除。省委认为，这两个问题由省、市财办及财政厅具体商议，于最短期内报省裁定。

会后，仲夷让我和李建安把省委常委会讨论的具体内容修改后定稿。8月5日，我们将整理好的《省委常委讨论广州市经济调整工作的会议纪要》和《省委常委讨论广州市城市建设问题的会议纪要》打印下发给各厅、局参照执行。谁知文件下发后被一些厅、局顶住，他们说，这两份文件不是省委和省政府的红头文件，所以不好执行。尽管我们反复做疏通工作，但仍很难贯彻下去。不久，中央《紧急通知》下达，仲夷被召进京。回来后，他对我说：“灵光啊，看来这两个文件阻力很大，暂时还不急，收一收吧！”我知道他有难处，也就只好同意了。现在看起来，当初我们这两份文件所提的一些具体要求，与广州市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城市的情形相比，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像这

样的省委常委通过了的决议，居然会在本省还行不通，可见“先行一步”有多难。尽管如此，我们市委并没有因此懈怠，而是决心凭藉自己的财力、物力搞好广州的经济调整工作，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 二、调整工业结构 创优质名牌产品

1981年6月13日，广州市工交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和全省工交会议套着开的。根据省、市工交会议精神，广州市工交战线迅速开展起以“一整三改”（整顿、改组、改造、改革）为中心的调整、改革工作。市委还成立了以范华、萧鸣、汤国良为主的工业调整领导小组，作为市委的全权机构，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经济调整工作进行研究和作出决定，重大问题才提交市委讨论决定。

当时，我们主要抓了这么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产品结构，重点抓了10个拳头产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手电筒、电池、电风扇、针织品、服装、中西成药、自行车内外胎）和58个重点产品；二是按行业、按重点产品进行全面认真的调整；三是抓行业归口，组织专业化生产；四是在工业调整的规划中，加强市场调查和预测；五是在专业改组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尤其对轻纺工业从广州实际出发，实行“六个优先”（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技术改造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使用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对重工业则侧重围绕着发展轻纺工业、农业和扩大出口，调整服务方向。

经过近两年的治理整顿，工业方面，广州关停并转了



109 户消耗高、亏损大、布局不合理、产品无销路的企业，对 347 个企业进行了整顿；农业方面，按照“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和“为城市服务”的方针进行调整，从而将过去单一化搞粮食的生产结构逐步调整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多元化结构；城建方面，调整了固定投资的方面和重点，停缓建了 100 多个基建项目，增加了与人民生活比较密切的城市公用事业，居民住宅等方面的投资。经努力，广州市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渐趋协调，工业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1982 年，工业总产值达 104.56 亿元，比上年增长 7.8%，48 种主要产品产量，增长的有 20 种，有 15 个产品获国家质量奖，59 个产品获部优质产品称号，一批“拳头”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增长，如缝纫机和自行车的产量就分别达到 110 万架和 120 万辆。两年中，我们上缴省财政 24.35 亿元，还新增上交中央借款 1.52 亿元。

在调整中，对于一些该上的项目，我们还是积极争取的，例如：

#### （一）广州万宝冰箱厂。

万宝冰箱厂原是个年生产不到 2 万台的小厂，在我任广州市长之前，厂领导已在考虑引进生产线了。但厂领导和技术人员，一方主张从日本引进一个 5 万套的新设备；另一方则主张从新加坡引进一台八成新的 10 万台的设备，争论半年相持不下，结果反映到市委来。我建议他们干脆两套都引进，大胆发展。他们最后照这样做了，从而迅速起步，经过几年努力，万宝冰箱年产量一度超过

100万台,成为世界上8家大电冰箱厂之一。可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个优势未能保持住,产量下降,万宝就转为多种产品、多种经营的企业集团。

谈到电冰箱,必然牵扯到压缩机问题。在我还是轻工部部长时,曾到日本考察。在东京见到日本三洋公司总裁井植熏,他愿意在上海投资压缩机生产线,对此我表态欢迎,并在回国后马上安排。谁知上海的二轻局与机械局意见不统一,拖了一年都没谈成。这时我将赴任广州,轻工部便对我说,这个项目是你谈定的,上海安排不下,干脆你带去广东吧。当时全国有好几个地区都想争这个项目,我为此又亲自写了封信让市政府的汤国良同志带上到北京,找杨波部长面谈。这样,电冰箱压缩机厂最终落户广州。但轻工部最后选用了日本松下公司的设备,三洋公司没有被采纳。压缩机厂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广州市引进的第一个技术先进,比较完整,也是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投产10年来,发展迅速,效益很好,目前年产已达到120万台,并成立了集团公司。它是广州市一个有很大发展前景的骨干企业。

## (二)广美食品厂。

广美食品有限公司(简称广美公司)是由北京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广州市广东罐头厂与美国 BEATRICE(毕萃斯)公司合资建立的。这个项目是我任轻工部部长时,与美国最大的食品集团 BEATRICE 公司谈定“共同在中国发展食品业”的一个意向。当时 BEATRICE 总裁达特先生向我提出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型的、全国性

的食品集团。意即它既是生产型的(有工厂、企业)也是投资型控股型的(有金融机构),用美国人的话说是一个伞型的大企业,可以辐射全中国。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项目,于是拉上“中信”荣毅仁与轻工部三家联合组成一个公司,点定在北京或上海。

但是,由于那时我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许多政策性的问题未能解决,所以北京和上海均认为十分困难,故想放弃。轻工部和中信公司派人到广东找我,我便让广州市有关方面继续与 BEATRICE 公司洽谈。

经双方反复研究,最后认为可以在广州先建立一个经济实体,建一个生产厂家,等立足后再向外扩散。我认为这个设想很好,因而支持他们与美方作进一步的实质性谈判。

然而,广美公司从开始立项起就引起激烈的争论。因为它主要是看好中国市场,重点发展软饮料,而广州有的同志认为软饮料是广州的优势,不应让出市场。针对上述情况,我将那些同志都找来,向他们解释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开放的有关方针政策,并说:“合资企业是互利的,我们让出部分市场,但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个项目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的,是可行的,外方愿意出钱,并派人来管理,工厂建在广州,我们是可以放心的”。在我的积极促成下,三方于1981年12月在广州正式签定了合同。接着美方又多次派出专家、学者来华考察,与我们磋商具体的实施细则。1983年,共投资1000万美金的广美食品有限公司这一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最大、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也

是轻工方面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终于在广州市东郊珠江河畔破土动工了。

1984年10月,该公司就把高质量的产品推向市场。但由于有一个外汇如何平衡的问题,以至广美公司的发展再次受到困扰。当时外汇是十分宝贵的,而外方在中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赢利,那时不要说分到外汇红利,就是连维持企业正常运转需要的外汇也难解决。因而许多同志强调由外方承担返销比例问题。我向厂方负责人提出这么个思路:“合资企业产品外销比例不能强加给外方投资者,应由合资企业本身负责,从前我国有不少轻工产品由中百站包销,工厂没有销售权,今天我们合资企业的产品,难道还要找一个外国站来包销吗?至于合资企业的外汇问题,应该主要由企业自身来解决,外方总经理会有办法的。”后来的事实果不出我的预料,广美公司外方总经理在外汇遇到困难时,设法由美方公司拨出200万美元,存在香港银行供广美公司使用,而且不但不付利息,甚至连银行利息都归广美公司所有,从而支持了广美公司的扩展。

### (三)珠江啤酒厂。

珠江啤酒厂是广州市政府从比利时引进的项目。它的筹建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因为当时要建这么个年产5万吨的啤酒厂,需投资5000万元,还要省计委拨1500万美元的外汇。开始,省里有关部门认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对啤酒的需求量不会大,没必要花这么多的外汇。而且要生产啤酒,所需的酒花要从新疆运来或者靠进

口,大麦也靠从浙江、安徽、河南等地调进,所以省计委和粮食厅均不同意上此项目。我为此找刘田夫,对他说:广东的气候炎热,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啤酒的需求量肯定增大,而全国的啤酒产量一年才 20 至 30 万吨,因此将它发展起来很有必要。于是,刘田夫亲自找计委和粮食厅谈,这才说服他们。定下来后,又遇到选址问题,当时有人提出摆在流溪河上游,说那里的水质清,造啤酒好。但市里管城建工作的赖竹岩不同意,他找到我说,流溪河是广州人民的食用水,河上游的生态环境不能破坏,建议将啤酒厂建在现在的赤岗,并说可以抽取东江水供给啤酒厂。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亲自带着有关人员到赤岗一带查看地址,把厂址定了下来。

珠江啤酒厂在德、法、比利时等国的帮助下,产量不断翻番,现在已成为年产 100 万吨的集团公司,啤酒的质量也比较好。

### **三、企业的整顿与初步改革**

调整和改革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改革必须推动调整,调整又以改革作为前提。

那时,我们对企业的整顿,注重对它们经营管理上的改善。一句话,要按“三化”(精干化、专业化、年青化)、“三基”(责任制、基础工作和基层建设)、“三全”(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员培训)、“三好”(文明生产好、安全生产好、均衡生产好)四个方面的要求加强整顿,即把调整、改革和企业的整顿结合起来,提高经济效益。同时在市属国营工交、财贸、基建、农牧和物资等企业中,我们进

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普遍推行了经济责任制。具体的方式有五个：（一）扩大企业自主权。我们选取了 85 个企业作试点，实行基数利润留成和增长利润留成，部分试行全额留成的办法。企业留成的利润，主要作“三金”（生产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二）试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即由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国家向企业征收所得税。（三）以主管局为单位试行行业利润（亏损）包干（或分成）的办法。（四）对部分政策性亏损的商品，如蔬菜、民用煤、牌价鱼、木柴等实行联产计量补贴的办法，主要在经营这些商品的商业和物资企业中实行。（五）对一批肉菜市场、小型百货商店和小饮食店实行承包经营负责制。同时还将一些集体所有制企业由原来的统负盈亏改为自负盈亏。这些改革初步改变了财政上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状况，把企业的责、权、利和职工的责、权、酬结合起来，进一步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在这方面，广州白云山制药厂是个典型。该厂原是个只有 24 人的小厂，主要生产土霉素。1981 年，厂长贝兆汉大胆起用“有问题”的技术人员，凭借 32 万元起家，对原有的产品进行革新，结果工厂产值在 1982、1983 年连连翻番，创造了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而造成一家现代化企业的奇迹。该厂的成功，在于它“不拘一格降人才”和充分利用农场集体经济比较灵活的机制，开拓创新，自强不息，所以当时我们把它树为标兵，号

召大家向它学习。

#### 四、初步改革外贸体制,扩大出口

我国的外贸体制,1978年以前,一直是采取由国家外贸部门直属的外贸总公司统一经营,统负盈亏的办法,这一办法同当时的经营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吻合的。然而,随着中央“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政策的实施,相应地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交往,于是,外贸体制改革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1979年10月,广州率先拉开了外贸体制改革的序幕。这段时间,外贸体制改革总的趋势是改变外贸一家垄断的搞法,逐步实行开放,达到多形式、多渠道地发展对外贸易。具体来说,主要的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下放外贸经营权。如省里从1981年底起将鲜货产品的出口权统一下放到各市县;第二步是建立起地方性的专业贸易公司,批准一些有条件的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业务或以工贸联营,工贸产销合作,工、贸、客商三方合作等形式合作联营,扩大出口。

由于这些措施的试行,较好地解决了工贸结合和农贸结合等问题,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当时的出口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有以货易货、代理出口、联营等等,这些方法,大大便利了出口,也推动了外贸的向前发展。

1979年至1981年,广州的外贸发展相对较快。因为鲜货产品放开后,大大地提高了外贸部门的积极性,出口额和外汇大幅增加。但由于管理一时跟不上,随之也带来了一些弊病。不少单位为了多创外汇,盲目地抬高价格到

内地抢购货源,然后低价销售到国外、港澳地区,结果是“肥水流向外人田”。当时我发现蔬菜的出口尽管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但收汇却反而降低,原因就是我们将蔬菜大量出口香港,造成香港蔬菜积压,以致价格也一跌再跌。从这点看,外汇的利用也应该有个计划来协调,即既要放得开,又要管得住。就这个问题,我在一篇讲话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在中央内参上登了出来。

实行外贸承包经营制,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向中央提意见,要求在外汇的收入和使用上与中央分块包干。开始外贸部不太愿意,但基于形势还是下放了部分权限,却又对资金等抓住不放,以致最后算帐我们反而亏损,因为这有个基数问题,加之那两年人民币降低汇率,国际上的货价又下跌,所以出现了1981年赚钱、1982年打平、1983年大亏的局面,结果是外贸不但停滞不前,而且还倒了回去。以后我们吃一堑长一智,外贸企业跟生产部门也因此练就了加强经济核算的概念,于是广州的对外贸易才又赶了上来。由于有这三年经验教训,1988年至1990年,中央鉴于外贸补亏居高不下,让全国都包了干,整个外贸体制顺利转轨。

## 大抓市政建设 改善投资环境

广州是广东的省会,是祖国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因此,广州的城市建设和环境、生活条件,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国家的声誉,因而需要我们下大



的功夫把它管理好、规划好、建设好,使它既成为一个综合性、多功能的中心城市,又成为展示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成果的一个重要“橱窗”。

我到广州上任后,曾亲自察看了市区的几个地段,所见所闻,着实令我大吃一惊。不仅马路上垃圾成堆、蚊蝇孳生,而且交通秩序混乱、阻塞严重,骑“霸王车”、“闯红灯”的随处可见,服务态度也不好。我还收到不少外宾、侨胞的来信,纷纷责问为什么广州这么“脏、乱、差”,有些外宾说:过去听说中国人很讲卫生,为什么现在这样脏?人民政府管不管?有没有环境卫生法?所有这些都迫使我们下决心对广州市进行一番治理整顿,尽快摘掉“脏乱”的帽子,恢复“花城”的容貌。同时,这也是我们搞改革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的迫切需要,是“硬件”。

1980年12月9日和15日,我主持了两次办公会议,研究整顿市容卫生问题。19日,又专门召开了一个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元旦、春节前开展一次全市性突击活动,实行“三整顿”,即整顿市容卫生、整顿市场物价、整顿交通秩序和社会治安。

22日,我们召开了一个全市性的动员大会,省委书记任仲夷对这次活动也很重视,他要求省委各部、各驻穗部队、中央机关都要积极配合广州市的行动。从22日到25日,广州市共出动了3万多人走上街头大扫除,共清理淤泥11800多吨,清理路障1145宗,使得东风路、环市西路、工业大道、金沙路等长期无人打扫的地方焕然一新。

接下来的三个月，各部、委、办、局、区、县仍狠抓落实，主管部门抓紧立法，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各单位将室内外的环境卫生分片包干。同时，我们还修订了《广州市维护市容卫生守则》，并在报纸、电台、电视台广为宣传。我们规定凡在马路上乱吐痰的要罚款0.5元，由纠察队监督执行。有个从辽宁来的客人被罚后很不满意，他把罚款发票寄给他的老书记任仲夷以表示抗议。当时，广州一些同志看到我和仲夷亲身下去检查卫生也感到不可思议，认为“你们省市委不抓大事，专抓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此我感到很坦然，因为我们的这些行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在为群众办实事，城市环境卫生的好坏，直接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明和市民的精神风貌，影响着外商对我们投资的信心，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活动应该是经常化、制度化的，而且应该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到了1995年，黎子流市长和市政府还在大抓城市卫生，提出解决脏、乱、差，可见这个问题的艰巨性。

过去，广州市政建设“骨头”与“肉”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方面的欠帐很多。拿居民用水来说，一进入夏季，市区到处闹水荒，甚至出现华南工学院一带的教职员工因苦于无自来水而拉上队伍到市政府请愿的事情，搞得市政府非常狼狈，只好派出洒水车运水到学校缓解群众的吃水问题。从市建委刚提拔到市政府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赖竹岩向我反映，说广州市的市政水管不但国民党时代的有，甚至还有清光绪年间的，由于年久失修，阻塞、破漏现象严重，以致造成水压小，供

不上去。而要改造这一状况,单供水投资就需 1.7 万元,可当时整个市政建设的经费才拨 5000 万,其中供水公司占 1000 万,但他们每年却要上交财政 500 万元(包括折旧费、利润和税收),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可能发展自来水事业。

1981 年 4 月,广州市委、市政府鉴于目前城市建设欠帐多,为了筹集资金解决当务之急,向省委提出两条建议:(一)广州市向省每年实行财政包干 10 亿元,一定 5 年不变,财政增收部分,由市拿出 50%用于偿还城市建设的欠帐;(二)充分利用外资,把我市旅游外汇收入的全部留市周转使用,搞好城市建设。并将此意见提交省市联合调查组进一步调查研究,提出具体意见上报省委。

1981 年 5 月 20 日至 22 日,仲夷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省市联合调查组对广州市城市建设工作的调查汇报。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向省委具体提出了“三养一费”的方针,即“以水养水、以园养园、以公共交通养公共交通”和从基本建设的投资中提取 5%的市政建设费用于改换下水道、扩展道路等。

省委常委基本上同意了我们的“三养一费”方针,还对其它的一些问题作了相应的决定。仲夷强调省直各部门要重视和支持广州的市政建设,各驻市的党、政、军、机关、团体和个人,都必须服从广州市规划和管理,不允许有例外。

在省委的大力支持下,从 1981 年至 1983 年,广州自筹资金投资 3400 多万元扩建、改善了一批供水设施,并

将原来的小水管逐步换成了大水管,使供水量增加,市区居民用自来水普及率也达到了90%以上。另外还扩宽、新建了8条马路,增加了部分公共汽车,陆续上马了石围塘立交、区庄立交桥工程,并准备贷款建广州大桥和海印桥。在此期间,“以水养水、以园养园”完成的情况是好的,进展也比较顺利,但“以公共交通养公共交通”却遇到重重阻力,由于养路费由省交通厅统一收取,广州市缺少自主权,这给广州市的道路建设带来一定的困难。我们要求省交通厅下放一部分权限给广州,即市内的养路费由广州市统一收取,并将这些资金用于道路、桥梁的修建,但省交通厅不同意。我在省委常委会上说:这样下去,恐怕广州会出现“四肢发达,心肌堵塞”的交通局面。后来的事实表明,此话竟不幸言中。听武汉的同志介绍,他们的养路费是与省对半分成的,所以他们的市内交通发展得比我们快。我们建议学武汉的办法或者由省交通厅和市共同派人去武汉考察,结果都没有实现。

另外,我们那时还重点抓了广州市的总体规划工作。广州市的城市建设历代都有规划,但从来都很笼统,不具体。我来时广州市的市区面积只有54平方公里,这与人口的发展极不适应,为这事我找规划局的局长谈,要他们多找些专家、学者来研究这个问题,并亲自参加他们的城市规划会议,对城建部门提出的“近郊新建与旧区改造相结合”、住宅建设实行“六统一”(统一规划、统一征地拆迁、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配套、统一管理)等方针,我也提出具体意见,并同意他们成立一个城市建设开发总

公司来加强市政建设的领导。最后他们不但搞出了总体规划，甚至还搞了专业规划和小区规划，并于1983年上报国务院。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后广州市的城市建设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蓝图进行的，可以说，它为广州的发展远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不过，它也有估计不足的地方，如将市区面积从54平方公里扩大为92.6平方公里，虽然增加了将近一倍，但当前的预计仍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当然以后的建设者就将它修订得更全面、更切合实际了。

广州还是全国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每年来穗旅游的外宾、华侨、港澳同胞多达几百万人。然而，它的各种配套服务设施却跟不上开放的需要，如通讯不方便、宾馆的档次低、管理水平较差，外商来广州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因住不下只好将他们安排到番禺、从化温泉等地，他们戏称来广州是“进不来，住不下，出不去”。为了给过往旅客创造舒适的生活条件，大力发展“无烟工业”，并使广州有一个新的姿态出现在改革开放中，市政府于1979年派出林西和赖竹岩与香港的霍英东先生洽谈合建白天鹅饭店的事宜；1980年，又在刘田夫的支持下，与香港的爱国知名人士利铭泽、胡应湘等洽谈花园酒店和中国大酒店等问题，几乎是同时签订了两大酒店的合作意向书。

正当利铭泽先生将自己的1亿港元资金全部投入花园酒店的平整土地、拆迁等工作时，香港碰上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同时，听说有些港商知道我国1997年要收回香港主权，更感到前途未卜，这使他原来从其它几个大财团

中集资的打算落空，利铭泽为此陷入了困境，决定放弃花园酒店这一合作项目，由他的总会计师关超然下令停工。我考虑到利先生是打开国门后首先到广州投资的香港知名人士，像他这样身分的人在中国投资如果半途而废，那势必影响别的财团对中国投资的信心，在海外也会造成不良影响。于是，我一面通知市珠江工程公司继续施工，一面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一情况。廖承志得知此事后，马上打电话给香港中国银行，要他们贷 3 亿港元给利铭泽。但中国银行拒绝了，理由是花园酒店的股东自己都不再投资了。我再找中行的行长蒋文桂来广州，说由我们市政府替利先生担保行不行？同时考虑到市政府不是经济实体，提出让珠江公司担保。中行说，珠江公司目前是个皮包公司，根本没有什么经济实力，最后我只好再修书一封给香港中国银行，以广州市市长的名义证明珠江公司是代表市政府的，有什么问题市政府可承担起来。最后香港中国银行总算同意贷款 7 亿港元给利铭泽。市里纯是无条件支持，没有收任何费用。由于花园酒店的总投资需 9 亿港元，所以我又为此找了谷牧，由谷牧支持在国内贷了 5000 万人民币交给珠江公司，（因贷款协议中规定，在未还清贷款前，花园酒店不得在香港再贷款。），才最终使花园酒店建立起来。

那时候，对外商的投资，国内有些人总以为是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中国大酒店就遇到这么个难题。本来中国大酒店是广州市羊城服务发展公司与香港新合成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讲明我们市政府划出地皮给他

们,由他们的六个大财团即胡应湘、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冯景禧、郭德胜投资兴建,建成还本付息后利润对半分成,15年后全部无偿归还我们。可是省建委却下了个通知,对该项目施工要收34%的管理费。胡应湘为此找到我,说“待遇不公平,为什么你们自己的只收20%的管理费。有些老板也因香港经济萧条、怕亏本而犹豫不定。于是,我把他们几个都请来广州,给他们打气,并主动提出我们让利5年,即合作期延长为20年。当时,有些人不理解这一点,说是卖国。我认为通过这些实际行动,可向国内外宣传我们改革开放的各项优惠政策,消除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顾虑,充分体现平等互利的原则,增强外商的投资信心。事实证明,这几个大酒店建好后,给我们开展外经、外贸,发展旅游业和增加税收、就业等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既改善了投资的环境,又安排了成千上万的就业人员,还为我们自己培养了大批的管理人才。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总的来说,合作是成功的。如今,这几大酒店均成为国内外知名度颇高的“五星级”酒店,利润在全国同行业也位居前列,对推动全国的旅游服务行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广州“对外开放”的形象也因此更为突出了。

再有一个就是广州市的通讯建设问题。我刚到广州的时候,就有人对我说,“在广州办事,骑自行车比打电话快”。这种落后的状况与广州经济建设大步发展的形势极不适应。一次,我在北京开人大会议时与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福建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

较好，他们利用外资将福州、厦门的通讯设备全部作了更换，结果给福建的经济建设带来了许多好处。当时我就提出请福建邮电局局长郭金海到广东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经验，项南慨然应诺。从北京回来不久，郭便应邀来到广州，于是我把刘田夫也请来听他介绍经验。在各方支持下，广州市电信局打破条条框框，引进了日本一套2万门装机容量的电讯设备，同时还把高空架设的通讯线路放入地下，并新增设了几个电信分局。从此，广州市内“电话不灵”的情况得到缓解。

城市的污染，也是个令人极为困扰的难题。在我刚当广州市长的时候，就收到不少群众来信，纷纷反映荔湾区的污染严重。我派人、自己也到下面查看，发现荔湾区一带的工厂都是自备小锅炉，污染源自200多个烟囱。那时报纸上有人提议把那里的西村电厂作一番改造，使之成为统一供电、供气的热电站。这个意见获得我和一些常委的赞同。可电厂的领导却说他们经费不足，无法完成。我们曾考虑过让省电力局支持，可他们迟迟未有动作。后来厂里终于利用各种渠道的贷款建成热电站，从而拆去了这200多个烟囱，解决了荔湾区一带的环境污染问题。这样做还有一个大好处，它不但增加了广州市的供电能力，而且每年可节约一二十万吨煤。

### 减少流通环节 促进农业发展

我刚到广州时，广州市的市场供应相当匮乏，存在着



流通渠道不通,商业网点不足,群众衣、食、住、行、买难等问题。1979年,广州市商业部门凭借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乘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开始了商业体制的改革。

这一年,广州市陆续恢复和新办了信托贸易、水产、牛羊、禽蛋、日用杂品、果品、中药材、粮油、日用百货等贸易货栈。由于贸易货栈具有交易灵活,信息灵通,联系面广,购销方便等优点,所以它一开始就对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减少商品流通环节,活跃城乡、地区间的物质交流起了良好的作用。

然而,由于价格是由国家制定的,农民的剩余产品是按统购派购办法和国家规定的过低价格交售给国家,农民既没有生产自主权,又没有销售自主权,而是依附于国家受计划摆布的产品生产者。所以农村是产品经济,不是商品经济,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珠江三角洲竟出现“鱼米之乡无鱼食”的怪事。针对这一现象,1982年,广州市经周密调查和审慎考虑,决定冒险将价格政策做番改革,即率先放开了鱼价。顿时,鱼价跳涨几倍,群众议论纷纷,我们所受的内外压力都很大,但我们对此坚定不移。果然,在价值杠杆的刺激下,农民纷纷大养其鱼,产量很快上升,鱼价也逐步回落。3年后,更出现了广州居民在全国18个大中城市中吃鱼最多、价格最便宜和史无前例的“南鱼北运”现象。

放开鱼价第一炮打响后,我们又乘胜前进,进一步缩小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工业产品统购包销的项目,逐

步把计划管的项目缩小,并将产品逐步放开,随之价格也逐一放开。1979年以前,广东农副产品的统派购共118种,到1983年已减为13种。

为了进一步敞开城门,打破城乡封闭,在1981年8月,我曾提出:“规划出一些地方,欢迎县市来广州摆卖各地土特产品,并为各省、市在广州建立驻穗办事处,进行经济交流提供方便”的设想,获大多数常委的支持。1982年,广州市政府和工商管理部门拨出188万元维修、改造和扩建了全市的农贸市场,甚至允许农民在大街小巷摆档经营。结果一到假日,农民们纷纷肩挑手提或推着车子拉着自己生产的富余产品进城贩卖,一下子繁荣了广州的集市贸易,各种土特产品在集市贸易里应有尽有,大大地活跃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弥补了国营商业的严重不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而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国营商业,我们则放弃了过去限、卡、堵、压的老办法,要求他们利用自己的资金、仓库等,重点搞批发市场,使大量的农副产品疏导调节到城镇、外地,起组织商品流通的作用。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流通方面打破了四个界限:一是打破了批发和零售的界限;二是打破了行业的界限,综合经营;三是打破了生产经营的界限,发展商办工业;四是打破内外贸的界限。这些措施,对于进一步搞活流通,繁荣市场,提高效益大有裨益。

但是,正当我们大刀阔斧改革商业体制,在农村推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时候,1981年七八月间,由于连日

暴雨，广州市竟出现了蔬菜供应严重紧张状况。蔬菜问题实际上暴露出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失误。造成蔬菜供应紧张状况的原因，一是过去郊县菜农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但自从农副产品提价之后，蔬菜的收购价却维持不动，随着农贸市场的放开，于是就出现了新问题。同样是一个农业劳动日，种水稻每工收入 1.8 元至 2.2 元，种花生 3.2 元，种甘蔗 5.4 元，而种蔬菜才 1.1 元，这就影响了菜农的积极性。二是蔬菜的流向发生了变化。过去邻近广州的县历来有向广州市场供应蔬菜的传统渠道，后因种花、养鱼、搞出口的收入大，这些县的菜田面积大量缩小，甚至有的郊县反倒向广州市购买蔬菜回去吃，这就加剧了广州市蔬菜供应的紧张局面。三是许多统购蔬菜流入农贸市场和供应出口。如豆角每斤价格，香港是 6 元港币，深圳是 1.2 元人民币，尽管广州涨到 0.5 元，但仍出现外流现象。四是蔬菜部门没有实行财政包干，不能鼓励和调动经营单位的积极性。五是对渡淡菜没能立足于防灾渡淡，而在蔬菜旺季又缺乏储存、加工的场所和手段。

为了解决蔬菜问题，1981 年 9 月，广州市在省里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调查小组，专门调查广州市蔬菜生产、收购、销售的情况。市委、市政府也一再重申郊区必须以菜为主的方针，还提出了 10 项解决蔬菜问题的措施，明令各县要保证蔬菜的种植面积，健全生产责任制。鉴于蔬菜收购价格太低，难以调动菜农的生产积极性，市政府研究决定，提高蔬菜的收购价格，每担菜由市府补贴 1 元，仅此一项，那年我们的财政就多支出 700 万元。

那时，我们十分强调“郊县生产首先是为城市人民的生活服务”，所以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我们还对农民进行“一个坚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个不变”（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农村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和“三个兼顾”（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宣传教育，既鼓励农民劳动致富，又强调要为国家多作贡献。

市委、市政府还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靠广泛发动社员搞养猪、养禽、养鱼的专业户、专业组、专业队；二则建立和扩大机械化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和渔业基地，以保证城市的供给。1981年，市府一次性拨出350万元在郊区人和、太和增建了两个副食品基地。副食品基地的建立，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带来了许多好处，像广州机械化养鸡场，仅1981年就为市场提供了18万只活鸡和97万斤鸡蛋，1980年这个企业还亏损16万元，而这一年盈余便达20万元。到1982年，广州市蔬菜供应情况已大有好转，不但数量充足，而且上市均衡，淡季不淡。

此外，市委、市政府还注意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多种经营。1981年9月，我和许士杰等同志到龙门、新丰两县考察山区经济的发展。在龙门，县委书记陈仕周向我们介绍，他们根据山区的特点，提出了发展龙门经济的“四大支柱”、“四张王牌”和一条桥梁的路子。所谓“四大支柱”，是指小水电、竹木加工、建筑材料和以年桔为主的经济林；“四张王牌”则是指龙门鸡、蜜蜂、草菇和龙门米粉；一座桥梁即是开辟南昆山为旅游区，借它来带动龙门的经

济。我感到，龙门县的这些设想很好，路子走得对，希望他们挖掘出更大的经济潜力，要从山区的特点出发，认真贯彻以林为主的多种经营方针，大力发展林业，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禁止乱砍滥伐森林，同时应该搞好农业的全面规划，注意长短结合，以短养长。

当时，龙门县的小水电在全省居第三位，水力资源相当丰富，是否可将他们的电力输送一部分到广州？因为那时广州的用电相当紧张，每年进入夏季，各区都要分片停电。我把这一设想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来，获得大家的赞成。结果，1982年，市与龙门县共同投资1230万元，架设了一条11万伏的输电线路，将龙门、新丰电输入大电网。这条线路于9月1日开通，平均每天可向广州输出10.54万度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广州的用电紧张状况。

1982年11月，我曾带领市政府的一个考察团出访菲律宾。在菲律宾，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农场，品尝了他们种植的芒果和葡萄，发现菲律宾的芒果肉厚核薄，味道鲜美。当时我就对随行的郊区书记吕刚说，是否可以引进些品种到广州培植，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鲜奶、鲜果等食品的需求必定增高。吕刚当即表示在广州市郊要大力发展和引进优质水果。

当时吕刚他们在郊区罗岗推行承包责任制，把大片的水果地如橙子、荔枝等岭南佳果承包给农户管和种。此事效果不错，承包第一年荔枝、橙子等水果就获得大丰收。于是吕刚把我和仲夷，以及省军区、广州军区、广州军分区的主要领导都请到果园，看着枝头挂满的串串红荔，

大家兴致勃勃，吕刚提出，农民承包土地后，尝到了甜头，但担心承包期太短，希望能长期承包下去，仲夷当即表示：“让他们包吧，20年，30年都可以嘛……”。

到1982年止，广州市有96%的生产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总值达14.5亿元，比1980年增长27.3%，粮食、糖蔗、花生的总产更是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郊县农业初步开创了新局面。

##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来的。

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海外刮来一股强劲的南风，冲击着广州。当时，街上到处播放着港台歌曲，人们穿着红着绿，尼龙衣料、太空楼……这些都是内地“老三色”无法比拟的；电视机、收录机等高档消费品，那时在内地尚属希罕物，但在广州大多数市民都可从海外的亲戚朋友中获得。在这种物质生活的背后，一些年青人却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渣滓视为精华，不少人蓄起长发，穿起奇装异服，有的甚至效仿西方的颓废青年纠合起来打群架，一些非法刊物、非法组织也重新抬头。这些现象引起了广州市委的注意。

1981年2月，广州市委召开全市青少年教育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市委要

求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青少年的教育工作,要在全市的青少年中深入持久地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和“一学”(学雷锋、树新风)活动,要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的情操。为了激励全市的青少年奋发向上,市委树立了几个典型人物,号召全市的青少年向他们学习。一是海珠区青年民警卜东昌,他为保护群众利益和维护社会治安,孤身与 20 来名歹徒顽强搏斗;二是全国十佳运动员陈肖霞、容志行,为了祖国和人民的荣誉,勤学苦练过硬本领;三是海珠市场售货员宗永强,刻苦自学外语和海洋专业知识,翻译了一本几万字的外文书,被吸收到科研单位工作。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对培养广大青少年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起了积极作用。

1982 年,中央决定将每年的 3 月份定为全国“全民文明礼貌月”。当时,广州是全国开展这一活动的 12 个重点城市之一,因此省、市委对此极为重视。刘田夫还在电视上发出号召,要求全省人民积极投身这一活动中,做到人人讲清洁,人人讲秩序,人人讲礼貌。

广州市在“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是既轰轰烈烈,又是颇有成效的,尤其是解决“脏乱差”问题上有突破性的进展。仅 3 月份全市就组织了 4 次卫生统一行动,上至党政军主要领导,下至男女老少都一齐动手。“全国第一街”南华西街就是从这次活动脱颖而出的。街道党委书记韩伟煜把净化、绿化、美化街道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来抓,亲自发动干部群众栽花种草。为了美化、绿化环境,他们建立了干部职工每月为美化街道

义务劳动一天的制度和卫生地段包干责任制度，并拨出2万元作为专用经费，采用民办和公助相结合的方法，平整路面、建造花坛、花基，在房前屋后、阳台窗台栽花种草，使街道如同花园一样。南方大厦也是这次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位，大厦的领导把“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作为开展“全民文明礼貌月”的核心，发动干部职工制定出服务公约，并建立了经理每天开门列队迎宾制、领导干部接待顾客制、科室干部轮流参加晚上义务售货制以及三级检查制度，这些制度后被全市乃至全国的服务行业纷纷效仿。

在“全民文明礼貌月”中，广州市的工、青、妇组织还发起了制定《广州市人民文明公约》的倡议，内容如次：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维护祖国南大门荣誉。二、热爱劳动，热爱科学，奋发图强，同心同德干四化。三、讲文明，讲礼貌，团结互助，尊老爱幼，家庭、邻里和睦。四、讲清洁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抛脏杂物，搞好环境净化、绿化、美化。五、维护公共秩序，自觉遵纪守法，勇于向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六、爱护文物古迹，爱护公共财物。七、破除陋习，树立新风，计划生育，勤俭节约。八、参加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抵制反动淫秽的文化。当时，市委令所有宣传机构都在广州播送这八大公约，并在全市展开讨论，一些热心的广州市民甚至亲自跑到电台讲感受，补充内容，提出修改意见。《广州市人民文明公约》的出台，促进了全市社会风气的好转和人与人关系的改善。



除了对全市人民和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以外,对全市党团员、干部和广大职工,二月市委扩大会议还决定开展“五提倡”活动: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倡大公无私,先人后己;提倡奋发图强,艰苦奋斗;提倡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提倡团结互助,同心同德。强调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充分发挥带头模范作用。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1981年3月12日,广州隆重召开第三次科协代表大会。我在会上提出,为了加强广州四化建设,真正做到科技先行,科协及广大科研工作者可从以下几方面开展活动:

第一,密切结合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提供咨询服务活动,为建设一个繁荣、文明、整洁、优美的现代化城市出谋划策。

第二,密切结合经济建设的需要,组织技术攻关,为发展轻型结构的工业贡献力量。

第三,密切配合厂矿企业做好技术开发,推广科技成果,努力提高经济效益。要把部、省、市三者的力量组织起来,逐步实现科研、教育、生产三结合。这样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

第四,积极开展对外科技交流活动,及时掌握、消化、吸收并改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

第五,大力开展科技普及,搞好职工技术培训,为四化培养更多技术人才。

我在会上一再明确:“市科协和工、青、妇、农协一样,

是市委直接领导下的人民团体之一。科技群众团体的活动经费要纳入地方财政开支计划,单列户头,请市财政局与市科协进行研究。至于科技群众团体的活动场地问题,市计委和市建委要给予全面安排考虑解决。希望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要根据市委要求,充分认识科技群众团体在建设四化中起到的独特作用,加强对科技群众团体的领导,支持科协和学会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开展活动,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他们创造条件,多提供方便。要十分注意关心和尊重广大科技工作者,使他们真正有职、有权、有责,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创造较好的物质条件、工作环境和居住条件,尊重他们的艰苦劳动,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四化建设作出新贡献。这篇讲话,在科技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不但广东科协出了份简报,全国科协的杂志也全文转载了我的讲话内容,其影响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说明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科学技术的春天来到了,广大的知识分子迫切期望把延误的时间夺回来,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才智和热血。

由于市委及各级党委重视科技,截止到1982年底,广州市属的独立科研机构已发展到59个,并拥有一支强大的科技队伍。1982年,广州市取得科技成果1800项,据对其中的75项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情况的调查统计,在1982年内就创产值25606万元,获税利12355万元。可见精神文明的建设,促进了物质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在我们经济改革大潮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

正当广东的经济工作逐步开展,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取得初步成绩的时候,1982年,我们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广东开放之初,省委、省政府就对走私贩私问题有所警惕,但由于对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缺乏经验,防范措施跟不上,无论缉私队伍、缉私装备和管理措施都不适应,加上沿海部分地区有些干部对走私贩私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有的甚至想乘机捞一把,因此给海内外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沿海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走私浪潮。有些地方出现“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的混乱局面。他们一窝蜂似的在街头巷尾、公路沿线兜售私货。

早在1980年7月13日,省委、省政府就发出了《关于坚持打击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的指示》。1981年2月,国务院在福州召开东南沿海三省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之后,省委又在这年的3月和8月分别召开两次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东南沿海三省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的精神,组织了两次全省性的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并着重抓了两件工作:一是狠抓提高各级、各部门领导和干部对反走私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当时有些人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认为“走私货价廉物美,对搞活经济有好处”,“买卖私货,赚钱为公家,只要不落入个人

腰包,没有什么坏处”,有的甚至把购销私货作为“发财致富”的捷径,有的认为“打击走私,是‘左’的行动,担心会影响对外开放政策”等等。针对这些错误思想,我们批判了靠走私贩私赚钱、“来之不当,用之正当”的谬论,明确提出,走私贩私是违法行为,并引导干部群众划清劳动致富和走私贩私攫取不义之财的界限,划清搞活经济与违法经营的界限,不断提高对走私贩私危害性和开展反走私斗争重要性的认识。

二是加强领导,组织海上、陆上打击活动。省和沿海地区地、市、县、公社都成立了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加强了对反走私斗争的领导,统一组织了两次大的打击行动。第一次是集中沿海各个方面的缉私艇共 59 艘,分驻在汕头、惠阳等地区的 6 个海区,堵截海上走私。第二次是调集部分缉私艇到香港、澳门周围海域巡逻查缉,堵住大规模的海上私货渠道。与此同时,陆上层层设卡检查,并扫荡取缔了沿海 18 个主要私货市场。全省大规模地开展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走私浪潮得到了遏制。

但是,由于我们对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不够了解,1981 年底,政治局常委看到中央纪委的一份简报,反映广东省有些干部利用对外开放之机,搞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等非法活动。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十分关注,先后作了批示。1982 年 1 月 11 日,党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1 月 14 日,我到省委参加常委会议,一进门就见到了中央书记处派来广东

的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不一会，任仲夷宣读了中央的《紧急通知》。接着，由王鹤寿传达胡耀邦、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同志的指示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大家听了，心情很不平静。经过讨论，省委决定成立由李坚真、寇庆延等6人组长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随后，省委先后两次向党中央上报贯彻《紧急通知》的电报。2月4日，任仲夷、刘田夫、梁灵光、李坚真等19位党政负责同志赴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座谈会。省委、省政府只留下个别领导同志在家做留守工作。大家坐在飞机上，不像以往那样谈笑风生，心里都在捉摸这次进京，不知情况如何？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纪委负责同志，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广东、福建两省省委常委共69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气氛非常严肃，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份文件，还有一份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我们看了，不禁愣了起来。试办经济特区刚刚开始，如今就提出“租界”问题，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讨论有效地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之所以找两省的同志来，主要是因为两省是走私的重要通道，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又有特区，有许多认识问题、政策问题需要研究，如果混淆了界限就会搞乱。”

11日，先由广东、福建两省同志作汇报，谈认识。广东主要由任仲夷和刘田夫作汇报，我和其他同志也先后

作了发言。我们详细地汇报了广东出现的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情况，省委、省政府组织的两次大规模反走私斗争，目前所采取的海陆同时并举的措施，以及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打算。

12、13日，胡耀邦等中央负责同志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希望我们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

胡耀邦同志说：“广东的工作，无论是仲勋同志、尚昆同志主持的时期，还是仲夷同志和灵光同志去了以后，都是做得很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不成问题的。同样地，广东的对外经济工作，成绩也是主要的，而且可以说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已经打开了一个可观的局面。”他同时指出广东对外经济工作在进出口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点和偏差。他希望我们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不移地对党内腐败现象，作严肃认真、顽强到底的斗争，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

座谈会结束后，2月18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由任仲夷、刘田夫、梁灵光和杨应彬向常委和有关负责同志传达中央书记处召开的这次两省座谈会精神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任仲夷就如何贯彻这次座谈会精神及进一步抓好各项经济工作讲了话。

1月19日，我在市委也组织了局处以上的干部进行

传达学习,并按照省委的布置,成立了以薛焰为组长的“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领导小组”,成员有:薛焰、宋恕忠、王玄等9人。同时还采取平行作业的办法,一方面抓传达,另一方面由领导小组先研究一些案件的处理。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动手采取果断的措施,开展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斗争,要雷厉风行,一抓到底。对违法乱纪的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该处分的处分,该清办的清办,决不能姑息。

2月22日,任仲夷和刘田夫向我们传达了2月19日胡耀邦等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省委常委研究了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的部署。

从2月24日开始,省委常委、党员副省长用4天半时间召开民主生活会,着重谈个人思想认识,讲清个人在经济上应讲清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随后,省委向省直厅局以上负责同志和参加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传达两省座谈会和胡耀邦等同志2月19日的指示精神。接着,又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讨论系统地贯彻反腐败斗争,端正党风和经济政策等问题。

3月2日,省委常委听取了各地、市负责同志的情况汇报。任仲夷要求他们回去后抓好几件事:一、抓好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二、抓紧大案要案的处理。三、研究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各项经济政策。必须做到执法更严、纪律更严、管理更严,用“三严”保证“三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贯彻执

行。

省委还决定加强对反走私和反腐蚀斗争的领导。任仲夷亲自抓，刘田夫以更大精力抓这项工作。我则侧重抓广州，其他省委常委、副省长也要抓好分管战线的这方面的工作。3、4月间，省委从省直机关先后抽调局、处、科干部共267人，组成12个工作组，分赴沿海地区检查和帮助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中央也派大批人员到广东指导、检查和帮助工作。

3月1日，党中央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即中发[1982]17号文）。中央在通知中指出：“《纪要》关于进一步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精神，完全适用于全党、全军和全国各地。希望各地、各部门和各级单位的党组织认真学习讨论，根据《纪要》精神，检查前段工作，结合实际情况，对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作出具体部署，坚决贯彻执行。《纪要》中关于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两省经济的精神，对全国各地和有关部门的工作同样有指导意义。”

中央17号文下达后，广东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中央及有关部门为加强管理，将下放给广东的外贸进出口权收了回去。而内地一些省市，也采取一些措施把广东运往各地的许多物资当作走私物品扣压、冻结。广东的供销人员到外省市进行正常的业务工作，受到冷落，有的甚至被当作走私分子看待，轻的被搜去证件，重的无理扣押。有些省区不准供销人员到广东来做生意，有些外省商



人因怕涉嫌“走私”而不敢来广东来开展正常业务工作。广州等一些大中城市一下子由门庭若市变得冷冷清清。有些省区甚至对广东实行经济封锁，我们只好舍近就远，到内地一些地方去采购粮食、煤炭和其他农副产品，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本省有的同志见有人否定特区，否定广东对外开放，也产生消极和悲观情绪，存在种种疑虑，认为中央对闽粤两省的政策，可能会出现逆转的情况。这期间，虽然风浪迭起，但省、市委都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和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批示，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走私的斗争。省委制订和颁发了《关于处理经济领域中犯罪案件的若干具体政策》，明确处理走私贩私行为的具体政策界限，并对全民和集体单位购销私货实行登记清理。同时，查处一大批大案要案，狠狠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任仲夷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即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坚定不移。我十分赞成他的这一提法。省委还注意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凡属省里过去有过规定而出现的工作失误，我们主动承担责任，从而使广大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继续在改革开放中大胆实践，敢冒敢闯。不少部门、企业还专门召开供销人员会议，动员他们打消重重顾虑，继续到外地去进行购销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严厉打击，堵塞漏洞，建立和健全措施，我们基本上遏制了大规模的走私贩私活动。与此同

时,广东不断向中央和有关部门汇报情况,加深相互了解,在共同努力下,解决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这年9月间,党的十二大在北京隆重召开,我和任仲夷、刘田夫、王全国等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我和仲夷都当选为本届的中共中央委员。9月14日上午,谷牧召集我们4人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开会,研究广东省经济工作问题。在此之前,7月间,省委曾派副省长王全国到北京汇报广东经济工作。当时,广东省积压的进口商品总值共8.7亿元,被兄弟省市也扣压、冻结了一大批物资,这些急需请求中央和国务院帮助解决。另外,我们还提出34种商品出口税退还广东,“三资”企业进口技术、设备免征进口税,解决市场紧缺物资和提高外贸出口换汇率等问题。

在这两次经济工作汇报会上,国务院有关部门对广东在经济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和困难,采取积极帮助的态度,得到较好的解决。谷牧在会上指出,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他希望我们“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把两省的事办好,把特区的事办好”。

任仲夷代表我们表示,“中央各部委帮助广东解决问题,是对广东工作的大力支持,属于广东自己工作中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认真清理,努力改进,进一步做好工作,更好地完成中央赋予广东的任务。”

根据陈云在1月所作的关于“特区第一位的任务是

认真总结经验”的指示，我们经多次学习讨论，对试办特区的经验认真加以总结。10月22日，省委、省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同月30日，陈云作了批示，认为“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11月15日，中央书记处向陈云、李先念等同志汇报闽粤两省的情况。汇报提纲指出，“经过中央十七号文件，过去两省出现的缺点和偏差已基本上纠正”。“两省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争取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头”。并要求中央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广东、福建的工作，帮助研究解决财政包干、计划管理、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外贸经营权、市场物资供应等若干政策性问题。中央书记处指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我们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既是两省的大事，又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全局。两省的担子很重，应该遵照中央的有关文件指示精神，不断总结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中央有关部门也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这项政策，积极支持两省的工作，进一步加强指导和帮助，密切协作配合，把这桩事情办得更好。

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经过全省、市上下共同努力，我们终于顺利地渡过了广东改革开放之后遇到的第一场大风雨。

广州市的走私贩私活动相对来说不太严重，但经济领域中严重违法乱纪现象却是存在的。如立新中路的房

屋纠纷便是一例。

我到广州不久,就到街道里了解居民住宅情况,看到有一家大小6口人仅挤在一间6平方米的小房里,感到这问题的严重。据说全市人均住房在两平方米以下的超过两万人。我还到滨江路一带的边缘去看水上人家。这些被称为“疍民”的,那时大约2万多人,全部因没有房子住而居于船上,而且附近没有自来水供给他们,需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上船。为此,我责成城建局尽快铺一条自来水管到那里,并在几年的时间里,通过各方努力,把这部分人从船上搬到陆地上居住。

那几年,市政府拨出不少专款用于住宅建设,立新中路工程是当时改造旧城区搞整片拆建的试点。谁知大楼盖起来后,却有不少动迁户不能回迁,而本来不属拆迁的43户居民却被安排住进了大楼。群众对此议论纷纷,告到了市委。我批转广州市建委,要他们将情况了解后向市委汇报,可他们只由住建办简单地写了个报告交上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5月,市委派出调查组下到立新中路,重点检查住房分配中的存在问题。据市委派去的胡楠卿反映,立新中路的房屋分配确实存在以权谋私、欺上瞒下、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被安排进去的非拆迁户大多是掌握回迁、安置工作的隼××、龙××等人的“关系户”。市委常委会讨论处理意见时,大家一致认为隼××、龙××已属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搞不正之风,应该秉公办事,给予严肃处理;对那些非法占住的一定要迁出,回迁户的政策也一定要落实。这一事件我们处理得比较好,所以广

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它说明市政府是取信于民的。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恢复了奖金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把责、权、利结合起来，克服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的思想。这本来是件好事情，可是，却有些单位为了小集体的利益，不顾国家利益，违反财经纪律，巧立名目滥发奖金。例如原南海水产公司的营业部只有职工 100 多人，他们通过“委托代销”东北某地的水产品，从中渔利，获取了大量利润。于是他们提取巨额奖金进行私分，仅 1981 年就分掉“奖金”达 45 万元，上至公司党委的主要领导人都从中捞到了“油水”。类似这样的不正之风，在不少单位和部门都存在。尽管我们三令五申，制定了规章制度，但仍有部分人对此置若罔闻，甚至明知故犯，违法乱纪。对此我们在全市进行了一次财务大检查，对发放奖金、执行财务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一加以认真的解决，同时加强干部的组织纪律和全局观点的教育，在党员中开展民主评议，自检自查，纠正领导上涣散软弱、自由主义的现象，对违反党纪国法的干部坚决开除出党，把一些年富力强，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提拔到领导班子中来，纯洁党的队伍。经过这番整顿，广州市领导班子的风气比较正了，群众的向心力也增强了，社会风气也有所好转。

“春江水暖鸭先知”，回想起主政羊城的近千个日夜，我的思绪万千，心潮澎湃。那时，广东处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在摸索、实践中迈进。但是不管怎样，广州的经济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人民物

质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果。1982年底,中央决定调我到省政府出任省长一职。1983年4月初,省召开人大会议进行换届工作,由我正式出任广东省省长。从此,我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整理:李芮)

#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政策

李 荣 珍

红军长征期间,先后接触了藏、壮、回、苗、瑶、白、侗、裕固等 10 多个少数民族,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制定了相应而具体的民族政策,形成了一套较系统、较全面的民族政策理论。回族地区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红军的回族政策,不仅赢得了回族人民的爱戴,保证了红军长征的顺利进行,而且也为回族人民指引了一条民族解放的道路。红军长征时期对回族的政策,在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 一、长征时期西北、西南地区的 回族社会状况

中国回族的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聚居区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30 年代的西部地区,灾害频繁,战乱不已,地方军阀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勾心斗角,赋税奇重,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在四川、云南等地居住的回族,社会经济制度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地主对贫苦农民的剥削量高达 50%—

70%。在甘、宁、青的回族聚居区,社会经济也极为落后。如据 1936 年的调查,临夏占总户数 1.3% 的地主,却占有全部耕地的 72%。14 户大地主、每户占地 5 万亩,而占总户数 58.1% 的贫雇农只占有全部耕地的 8%。在重利盘剥下,负债回民占到总户数的一半以上,当地民谣说:“交不完的租子,还不完的债,扛不完的长工,使不上个钱。”<sup>①</sup> 在这种高债率下,农业生产连遭破坏,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据统计,1927 年甘肃耕地为 2601 万亩,到 1937 年下降到 1761 万亩,十年竟缩小了 1/3 左右<sup>②</sup>。

西部也是干旱、风沙、雹、洪等灾害奇重的地区。1927 年,甘肃 7.3 级大地震,死亡人数达 30 多万,“积尸梗道、人相食”的现象比比皆是。持续不断的旱灾使甘肃省政府在文告中也不得不承认:“甘肃连年大旱,夏秋无收,加以兵迹匪蹂,劫烧杀戮,惨无人道,破坏至五十余县,死亡达三百万人,其幸存者衣食居住,一例荡然。”<sup>③</sup>

西部地区也是军阀割据、争抢地盘的重要场所。如甘肃,先有冯玉祥部队的入甘,后有陕军控制政局,继而又有马家军阀的崛起,1930 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又进入西北。这种军阀混战、政局更迭、经济落后的局面,使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回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

① 《回回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2—74 页。

② 丁焕章编:《甘肃近现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58 页。

③ 王致中、魏丽英著:《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30 页。



蒋介石完成了形成上的全国军事统一后,对边情复杂、民族矛盾剧烈的西部地区,则利用地方军阀来加强其统治。在西北,就有了马麒、马麟、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等回族军阀的入主甘、宁、青。

马氏回族军阀代表的是蒋介石在西北地区的利益,因此,他们的主政并未给西北回族人民带来多少好处,回族人民仍处于繁重的税收、兵役压迫之下。如青海就有“十人九兵”之说,马步芳也就是靠迅速壮大起来的武装力量奠定了他在青海军事统治的基础。马鸿逵对宁夏的经济掠夺主要表现在增加税收和实行经济垄断,其税收多如牛毛,到了几乎无货不征、无物不税的程度,其结果是造成工商业的凋零、破产,而兵役的繁重则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外流。据1935年统计,宁夏人口为103.2万人,而到1941年时,降至73万人,其中逃兵役就是人口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sup>①</sup>

在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回族人民曾多次举起反抗的义旗。1928年至1929年在甘肃爆发的马仲英起事的“河州事变”,就是二三十年代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回民起义。这次起义声势浩大,回族群众参加者数万人,号称“十万”。起义宗旨也很明确:“不杀回,不杀汉,单杀国民军办事员。”但由于当时主政的刘郁芬等人利用民族矛盾制造事端,使这次起义的

---

① 丁国勇、王永亮编:《宁夏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性质逐渐改变,起义军在往甘南、河西等地转移过程中,烧杀劫掠时有发生,甚至在湟源、永昌等地还发生了屠城事件。这种民族仇杀逐渐失去民心,起义也最终走向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余波一直延续到三十年代中期。

综上所述,红军长征前夕的西部回族人民,处于沉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复杂。这也给长征在回族地区的红军提出了课题: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红军顺利通过回民区并唤起回族人民的觉醒,进而领导回族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尤其是在日军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否争取动员回族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红军长征时期党对回族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新形势的需要下产生的。

## 二、长征前夕党对回族政策的简单回顾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关注民族问题,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原则,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党对回族的政策也是有其连贯性的。在中央制定的政策文件中,就多次提到回族。1922年党的二大上,就提出了“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sup>①</sup> 1928年党的六大上有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

---

<sup>①</sup> 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并准备在七大召开前准备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列入七大议程并加入党纲;<sup>①</sup>1931年6月16日,中共中央给苏区各级党部及红军的训令中也指出:“党在大会上应提出关于拥护和援助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自决和解放运动的决议案,以对抗反革命国民会议席上所拥护的国民党对于蒙藏回民族的‘藩属政策’”;<sup>②</sup>长征前夕的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决议也指出:由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斗争的高涨,党在少数民族中的不可容忍的薄弱亦清楚地暴露了出来。党必须加强在蒙古人、回族、苗族、瑶族之间的工作,必须领导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与自立。五中全会还责成政治局及各省委,要根据党的革命的民族政策定出在各民族中开展具体工作的纲领;做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也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将民族政策专列一节,他在报告中抨击了国民军在甘肃屠杀回民的政策,强调指出:“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蒙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属居住在中国境内者,他们加入中国苏维埃联邦,或者脱离苏维埃联邦,或者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均由各民族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sup>③</sup>

---

① 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第34页。

② 同上,第70页。

③ 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96页。

党对领导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基层党组织的指示就更加具体。1926年中共中央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中就指出：“西北军现时所占的地盘，是最贫瘠苦穷之地，经济上一切措施均受限制。政治上还有一个民族问题（对回民），须对付得好”。“冯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使他们乐意帮助冯军”。<sup>①</sup> 1929年6月22日，中央对陕西问题的决议中也指出：“加强回族蒙族中的工作，对于回族与陕北蒙族须扩大民族自决，联合奋斗的宣传，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屠杀压迫回族蒙族的反动行为，反对民族间一切歧视不平等的待遇，同时亦要领导回蒙民众反对他们的酋长王公的各种专制特权。在以回族士兵为主要成分的军队中，与在陕北蒙族的石里喇嘛土匪部队中，要特别加紧工作。”<sup>②</sup> 1932年8月1日中央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中又强调：“关于甘肃回民中的工作，中央要唤起省委同志的注意，陕西省委现在就应该担任创造甘肃省的工作。”<sup>③</sup> 根据中央指示，陕西省委于1932年12月20日专门作出《关于西北回民工作的决议》，并在同年底派出回族党员关鸿宾在兰州组建了甘宁青特委，在甘肃、宁夏境内开展兵运工作和民族武装斗争，组建了一支汉、回、蒙、藏等民族组成的抗日游击队。同时，在陕甘边根据

---

① 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第25页。

② 同上，第141页。

③ 同上，第82页。

地的陇东龙咀子一带,建立了西北地区第一支回族革命武装——回民游击队,成为西北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 三、红军长征中党对回族政策的主要内容

红军长征时期的回族政策主要是通过沿途发表有关的决议、布告、宣言、法规、张贴标语口号等方式和大量具体细致的民族工作实践来体现的。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1、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压迫、民族歧视。

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后,就制定了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具体政策中又指出:“回、番、蒙、藏、苗、夷各民族得组织自己苏维埃或人民政府,各民族一律平等。”<sup>①</sup>并特别强调红军在川、甘、陕、青、宁等区域,要对回蒙民族做更多的民族工作。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哈达铺时,颁发了《回民区域政治工作条例》,要求红军部队要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反对汉官压迫回民。红二方面军在《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中也指出:“川滇黔边区的少数民族(苗、彝、瑶、回……)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平等,发展民族文化教育,

---

<sup>①</sup> 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页。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信仰自由,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各民族之间相互歧视,反对剥削和压迫,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sup>①</sup> 在红四方面军制定的《回民斗争纲领》中也号召回族“推翻汉族压迫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1936年5月发布的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则规定的更加具体明确:“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sup>②</sup>

2、尊重回族的特殊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回族群众信教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是党的宗教政策的基本原则。对回族这一近乎全民信教、其风俗习惯又与伊斯兰教密切相关的民族来说,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更具特殊意义。党对回族的政策尤其强调了这一点,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条例和规定。要求各部队要深入了解回族习俗和伊斯兰教特点,争做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模范。红军在进入回族地区前,及时调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和宗教概况,制定出相应而具体的政策。如中央红军进入哈达铺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就找来甘肃籍战士了解情况,之后,红军政治部颁发了《回民区域政治工作条例》,四条条例中就有三条是涉及回族风俗和伊斯兰教的:①进入回民区域,应

---

① 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② 李德明:《红军西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获得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营。②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③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各部队在回族聚居区,不得吃猪肉猪油。在哈达铺举行的军民会餐活动中,对回民都另桌招待,以示尊重。红二十五军在经过隆德县的兴隆镇时,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中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注意不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回族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红二、四方面军在云南的寻甸和官渡及川西北的茂县、阿坝等回族小聚居区也制定了“不进回民家”、“不用回民锅灶”、“不进清真寺”、“遵从回番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信仰自由”、“反对伤害回、番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等规定。1936年,红军在对回族宣言中则更明确的宣布:“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政策,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sup>①</sup>红军在云南柯渡,甘肃哈达铺、徽县时,有部分回族群众不明真相,逃匿山林,红军对出走群众的家产予以保护,对清真寺予以保护。做饭时还将灶具搬至野外,用水时先征得当地群众的同意,并帮助群众打柴、打扫庭院。红军的遵俗爱民行动打动了回族群众,逃走的人也陆续返回家园,以加倍的热情和行动支援红军长征。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既是民族宗教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模范的执行者。在进入回民区前,毛泽

---

<sup>①</sup> 李德明:《红军西征》,第133页。

东就让警卫员将一袋用猪油炸的干粮处理掉；在单家集村，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亲自到清真寺拜访阿訇，讲解红军尊重回族风俗习惯，尊重宗教信仰等政策，使阿訇和回族群众深受感动，纷纷腾出住房，热情接待远方来的贵客，红军走时，群众又夹道欢送，将鸡蛋、红枣等东西塞给红军战士。张闻天当时就说：“这个地方的回族群众真好。”<sup>①</sup> 在云南寻甸柯渡乡，朱德亲自到回辉村清真寺拜访回族教长，向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并征得教长的同意，在清真寺墙壁上写下了“红军绝对保护回族工农群众利益”的标语。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邀请回族阿訇进行座谈，特意购买了“三泡台”的清真茶具，以回族的待客方式来接待阿訇，并将一面绣有“德高望重”的锦缎匾额送给清真寺的阿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到红军西征部队采访，在其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彭德怀休息的时候，请回民老乡进来，向他们解释红军的政策。一个老太太坐着同他几乎聊了两小时，数说自己的苦处”。<sup>②</sup>

### 3、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帮助回族人民建立自治政权。

长征初期，党中央仅把民族问题和长征的战略转移联系起来，政策中仍强调民族自决权，主张实行联邦制，建立苏维埃的民族政权。如1935年5月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编印的少数民族工作须知中就提到要实际帮助少数

---

<sup>①</sup> 刘英：《长征路上》，载《红旗漫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sup>②</sup> 李德明：《红军西征》，第194页。



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与本族压迫阶级的斗争，帮助他们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茂汶、金川、阿坝等地都建立了回族小聚居区范围的区、乡苏维埃政府，但在具体实践中这些政权已带有自治性质，如在绥靖建立的回族苏维埃政府，主席尚桦（红军中的阿訇担任），副主席周××，是由当地的阿訇担任，体现了红军“各民族得组织自己苏维埃或人民政府”的主张。1935年8月，在毛儿盖会议上制定了党对少数民族工作的方针，认为：在一、四方面军没有会合以前，四方面军在帮助少数民族组织游击队、建立革命政权及发动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上，取得了成绩。但目前建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是为时过早的。强调指出：党和红军今后在西北地区活动，到处离不开少数民族，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意义。在民族政权上，可以采取民族统一战线的人民革命政府和工农苏维埃两种形式。从这次会议后，红军在民族地区建立的政权就更强调了区域自治的性质。如红军帮助建立的川康省委就对民族政权做了这样的规定：少数民族在自治政权机关中应当占主要的领导地位。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宁夏后，其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规定的更为具体了。1936年5月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回民工作指示》就要求在回族地区“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毛泽东签发的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也宣布：“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

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政府”。<sup>①</sup>

根据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在甘肃徽县帮助回族建立了县一级回民自治委员会,阿訇马克仁被选为主席,委员也均由回族来担任。在此基础上,又成立了徽县苏维埃政府,由马克仁任主席。徽县回民自治委员会已具有区域自治性质,但尚未达到组织回民自治政府阶段。1936年10月,红军在西征中帮助建立的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则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回族地区的一次成功尝试。预海回民自治政府成立那天被回族人民当成了喜庆之日,方圆数百里的回族群众赶来庆贺,庆祝活动持续了三天。自治政府通过了《陕甘宁省预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陕甘宁省预海回民自治政府为处理债息暂行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等文件,选举马和福(回族)为自治政府主席,军事、文化、粮食、保卫、财政等委员均由回族担任。之后,在自治政权行使职能的时间里,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充分发挥了民族自治地方的作用。预海回民自治政府虽由于红军的撤离而只存在了9个月时间,但其意义是深远的,是回族自治政府的第一次,被誉为“回民解放的先声”。

#### 4、对回族民主上层人士实行统战政策。

---

<sup>①</sup> 李德明:《红军西征》,第133页。

回族民主上层人士在回族地区具有代表性，在群众中有影响、有权威，为团结这部分人，红军实行了统战政策。如红四方面军建立的金川省就在党代会的决议中有这样的规定：“不论阶级、不论部落、不论土司、头人、活佛、喇嘛、不论夷马模、阿訇，不论什么军队，不论什么派别，不论什么宗教民族，都可以联合共同奋斗”。<sup>①</sup> 红军经过回族区，都要先与当地阿訇取得联系，向他们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再通过他们向广大群众做工作，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亲自与阿訇或教长交谈，体现党对回族人民的关怀之情。红军路过西吉县的西塔村时，毛泽东、彭德怀写信给教主马西塔，表示红军不打回族土豪，不没收寺院财产，保护清真寺。马西塔非常感谢，帮助红军顺利通过了这一地区。红军西征在同心喊叫水地区时，就多次拜访洪岗子教主洪寿林，洪教主对红军的主张非常赞成，向广大教众宣讲“瓦尔孜”时说：“红军是顺乎民心的，他们的事业一定能成功”。<sup>②</sup> 红军向洪教主赠送了“爱民如天”的锦旗，洪教主视为至宝，冒着生命危险将其保存下来，传给后代，建国后又赠给了人民政府。徽县回民自治委员会主席马克仁、大金川省回民委员会主席萧福祯都是当地有名的阿訇。

根据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

---

① 《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第236页。

② 李德明：《红军西征》，第65页。

神,红军对回族军阀也采取了统战政策,如马鸿宾在陇东阻击红军被击败时,红军将其旅长冶成章,副旅长杨子福俘虏后,为其治伤,然后将两人先后释放;红一军团长左权对马鸿宾的骑兵团长马培清写信晓以大义,马回信表示同意,并做到互不相犯。红军的统战政策对马鸿宾也有触动,最终导致了他在解放战争中的率部起义。在河西走廊活动的红西路军也对马步芳、马步青提出了“联合各党各派各军队一致抗日”、“欢迎二马回军将士参加抗日联军”的口号。西路军还在武威与马步青订立“城下之盟”,不战而过武威城。但由于马步芳、马步青的反动本性所致,统战政策未能奏效。

#### 5、培养回族干部,造就回族栋梁之材。

党很早就认识到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性。红军提出:“对回民亦须注意提拔回民干部”。各部队及机关的回民同志,应当尽量的集中到各政治机关的地方工作部去,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造成为强有力的回民领导干部。还要从工作中提拔和培养回民新干部,尽量吸收一切愿意为回民自决而斗争的回民人才,特别是对于在回民中有信仰的领袖,更要注意指导他们的自决运动。在党和红军的培养下,也出现了许多影响大、贡献多、觉悟高的回族干部。金川地区的阿訇萧福祯参加红军后,被调至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工作,后又被选举为川陕省苏维埃回民委员会和西北联邦政府回番委员会的成员,还担任过大金川省回民委员会的主席,1936年遭敌人袭击时壮烈牺牲。在西北,马和福这样的回族干部也很有代表性。马和福出生

于甘肃东乡锁南坝一个贫苦穆斯林家庭，三岁丧母，后随父流浪到宁夏同心定居。1936年红军西征到达这里，在和红军相处的日子里，马和福的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工作出色，他被推选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府主席。红军撤出同心后，马和福率领回族游击队坚持斗争，后不幸被捕，于1937年4月被敌人杀害于同心城西门外。

许多回族青年加入红军后，也成长为颇有作为的回族干部。如红二十五军入伍的回族青年中，就有马青年、欧阳武等回族人才，马青年曾任预海自治政府军事部长、回民独立师师长等职务，解放后成为党的高级民族领导干部。西征红军的师团地方工作部中，部长大都由回族干部担任。陕甘宁省委还通过回族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干部，如建国后成为宁夏人大副主任的马有德就是在那时加入革命队伍的。

## 6、建立回族革命武装。

回族是具有反抗精神和斗争传统的民族，红军很注意帮助回族建立革命武装，发展民族武装斗争。党中央在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指出：“武装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所不可少的条件，我们联合回族中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与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我们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sup>①</sup>。红四方面军也在文告中强调：“回番民族是

---

<sup>①</sup> 李德明：《红军西征》，第133页。

中华民族之一，他们具有丰富的革命力量，是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斗争中一个有力的支柱”<sup>①</sup>。在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就有许多回族青年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建有回族独立连，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回民支队；红二方面军在徽县帮助建立了一支由回汉民族组成的游击队；红军西征部队中有回民连，后发展成回民独立师，还在预海地区成立了预海回民游击队和主要有回族群众参加的江湖抗日游击队，由马青年任总指挥，这支游击队发展到 3000 多人。这些回族武装在保卫新生政权及维护地方治安、打击地方恶势力、配合和支援红军作战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这一时期，党对回族的政策还涉及到发展回族教育，保护回族文化，开发回族经济等诸多方面。这些政策表现了党对回族问题的高度重视，团结了广大回族人民，使回族人民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和红军才是回族人民的救星和可以信赖的人，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民族解放的新生之路。

---

① 《红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第 23 页。

# 建国前后取缔一贯道的斗争

郭 玉 强

一贯道是我国现代历史上最大的反动会道门组织。它源于山东济宁，创始于清光绪年间，前身为民间秘密组织“白莲教”的分支“先天道”演化而来的“东震堂”。“东震堂”在其十六祖刘清虚办道时，取《论语·里仁篇》中“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的说法，改名为“一贯道”<sup>①</sup>。

一贯道的“教义”，主要有“三期劫变观”，“救赎说”和“无生老母的信仰”等。宣扬：自开天以来，有三次大劫难，现在是最后一劫，要想得救，必须加入一贯道。

一贯道初创时曾奉有“反清复明”的宗旨，后来政治色彩逐渐淡化，成为一个一般的封建迷信组织。1932年，其所谓“十八代祖”道士出身的张光璧（又名张天然、张奎生，号天然子）接办道务，他采用各种手段，极力扩展道务，从而使一贯道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即由济宁一地发展到菏泽，济南、青岛、天津、北京等地。一贯道越来越大的

---

<sup>①</sup> 引自野樵：《一贯道黑幕》，群众出版社1962年版。关于一贯道的源流和变迁有各种说法，本文暂取此种说法。

声势,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所以,1936年冬,蒋介石以“赴宴”为名将张光璧转禁在南京,经过秘密谈判,张光璧答应了效忠蒋介石的条件。从此,一贯道在政治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一个封建迷信组织,逐渐变成了一个受反动势力操纵的带有越来越多的反动色彩的反革命组织了。

抗日战争时期,在“万教归一”的招牌下,一贯道又投靠了日本侵略者,积极扩展组织,为日寇服务。1938年向东北伸展,1944年蔓延到华南,1945年又向四川、西康扩展,道徒有上百万之多。抗战胜利后,一贯道重又回到国民党的怀抱。国民党虽曾被迫宣布对其进行取缔,但不久即把一贯道改名为“中华道德慈善会”,通过军统特务暗中进行操纵。这样,在国民党的庇护下,一贯道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势力反而继续扩大。1946年,又扩展到了台湾和海外一些地方,发展成为一个除西藏、青海等地的近乎全国性的组织。

1947年,张光璧死于成都,一贯道遂日趋分裂。解放前后,一部分一贯道分子逃到了台湾和东南亚一些地方。就目前情况来看,大陆上的一贯道经过建国前后大规模的取缔斗争,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只有少数地方,极少数人仍在活动。而在台湾省,一贯道还有很大的势力,约有道徒170多万,坛堂遍布整个台湾岛<sup>①</sup>。

---

<sup>①</sup> (台)郑志明:《台湾的宗教与秘密社会》,台原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



一贯道之所以能发展成一股庞大的势力，一是一贯道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蒙蔽了一些愚昧无知、没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人。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反动政权的支持。无论是国民党政权，还是汪伪政权，都有很多“达官贵人”加入一贯道，所以社会“上层人物”也争相效尤。而反动政权在交粮纳税，抓夫抓兵等方面都给予道徒以很大的照顾，从而迫使群众加入一贯道。也正是由于反动政权的支持，一贯道才发展成为全国第一大反动会道门组织的。

一贯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组织，在反动政权的特务机关的操纵和指使下，干下了丧尽天良的坏事，对人民犯下了种种可耻的罪行。

日伪时期，张光璧亲自充任汪伪政府外交部顾问，诸民谊、周佛海都加入了一贯道。张光璧等一贯道头子大肆散布奴化思想，毒化抗战意志。同时，一贯道还屠杀抗日军民，为日本特务机关搜集情报。仅在山东一地，一贯道即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指使下，勾结其他反动会道门，制造屠杀我抗日军民事件十余起，杀死干部近千人，抢劫财物，烧毁房屋无数<sup>①</sup>。

一贯道与国民党的勾结更是紧密。许多一贯道分子都参加了军统组织，成都著名道首何锡珊，即是军统局的高级特务，而国民党军统特务、包括毛人凤都加入了一贯道。国民党竭力利用一贯道进行反革命活动。国民党山

---

<sup>①</sup> 野樵：《一贯道黑幕》，第14—15页。

东省党部的“反共计划书”中,就曾写道:“利用民众之迷信心理,拉拢帮会,全省各地道门……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的暴动屠杀行为……使其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sup>①</sup>。张光璧的儿子曾多次参加中美特工联席会议,接受反革命任务<sup>②</sup>。

解放战争时期,一贯道利用各种手段,或为国民党发动内战制造舆论,欺骗普通道徒充当炮灰;或破坏土改、参军、支前,为国民党刺探情报;组织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一贯道仍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操纵和指使下,利用一切可乘之机,极尽造谣、潜伏、破坏之能事,甚至阴谋发动反革命暴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贯道分子在各地散布谣言,说什么“解放军长不了,共产党很快就完”<sup>③</sup>,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造谣说“美国应运,统治天下”“蒋介石就要回来了”。共产党要“割蛋”、“割子宫”送给苏联造原子弹<sup>④</sup>,并“将猪肠,豆腐涂以红色丢在野地里伪称是割的蛋,恐吓群众”<sup>⑤</sup>。这些谣言和阴谋曾产生了极坏的影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危害。如察哈尔省在“割蛋”谣言传开后,一时

---

① 195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② 1951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③ 野樵:《一贯道黑幕》,第19—20页。

④ 张林:《严厉取缔反动会道门》,《时事手册》第41期,人民出版社1950年12月,第79页。

⑤ 罗瑞卿:《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7页。

人心惶惶,很多人白天无心生产,夜间不敢安眠,生产大受影响。在农村,如有坏分子夜间大叫“割蛋的来了”,则全村骚乱<sup>①</sup>。

另外,一些一贯道分子则改头换面,混入了“我某些工作薄弱或偏僻边远地方的区乡政权,农业合作社,民兵组织以及某些工厂,中小学等基层单位”<sup>②</sup>。河北吴桥县达观乡李村党支部4个支委系一贯道“三才”“分坛主”和积极活动者。这些人往往利用职务之便,在内部大搞破坏活动。

甚至还有一些一贯道分子,蒙骗、挟持一些道徒和落后群众,阴谋进行反革命暴乱。解放初期,从全国各地发生的反动会道门暴乱案件中来看,“以一贯道最猖狂,危害性也最大”<sup>③</sup>。1949、1950年,江苏淮阴等地,一贯道勾结其他反动会道门组织过两次暴乱<sup>④</sup>。1950年,陕西朝邑、甘肃武威都曾发生过一贯道组织的暴乱<sup>⑤</sup>。

至于其他如骗财、骗奸等种种罪恶活动,一贯道的道首们更是无所不极。他们“欺骗勒索道徒,敛聚财物,以供自己挥霍;有不少道者,并奸污入道妇女,使不少受骗道徒人死财空”<sup>⑥</sup>。他们用尽各种手段和名目,如入道费、渡

---

① 罗瑞卿:《罗瑞卿论人民公安》,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7页。

② 野樵:《一贯道黑幕》,第17页。

③ 同上,第15页。

④ 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

⑤ 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⑥ 野樵:《一贯道黑幕》,第15页。

大仙费、月助、开班费等，诱骗、强迫道徒交纳钱财。很多道首由此发了家。张光璧 1946 年去四川时，光是用飞机就运走了 1500 条黄金。而且，一贯道首还以“乩语”、“神附体”等迷信手法作掩护或以治病为名，奸污妇女。女点传师白秀茹竟组织了所谓“暴字队”专门强奸妇女，甚至杀人灭口<sup>①</sup>。其罪恶行径令人发指。

由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一贯道并不是什么“宗教组织”而是“一个由很多反革命的特务匪特操纵把持，破坏革命，危害人民，扰乱社会，奸淫妇女，诈骗钱财的反动组织”<sup>②</sup>。它的种种罪恶活动，已经严重地危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安全。所以，建国前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而复杂的取缔斗争。

建国前后，取缔一贯道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 1949 年 1 月到 1950 年 10 月。

1949 年 1 月 22 日，前华北人民政府公告全区，命令“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sup>③</sup>。在这以后，山西、察哈尔、绥远、内蒙、河北、山东、天津等地的一部分地区，都积极行动起来，开展了取缔一贯道的斗争。

这一时期，取缔斗争开展得最为彻底的是东北地区。1949 年 8 月 9 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出布告，命令“自布

---

① 1950 年 6 月 10 日《人民日报》。

② 1950 年 12 月 20 日《人民日报》。

③ 1949 年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

告之日起,所有东北地区之一贯道……等均属反动的封建会门、道门组织,应即一律解散,不准再有任何活动”<sup>①</sup>,并具体规定了各项取缔办法。在布告发出的同时,东北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各地政府、公安机关、人民团体都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进行了这一斗争。公安机关在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之后,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统一行动,查封一贯道的坛堂,区别情况逮捕、严惩或登记各级道首。各地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方式,揭露一贯道是“操纵在匪特手中并与反动地主富农相勾结”的反动本质,提高道徒的觉悟,号召道徒退道。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取缔斗争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一贯道的组织被打垮,受骗道徒纷纷退道。沈阳市一天之内就有300人声明退道,辽西新民县二区狼洞子一个小村子就有150人退道<sup>②</sup>。东北地区是全国第一个肃清一贯道势力的地区。

这一时期的取缔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由于当时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战争尚在进行,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尚未肃清,而且又面临着恢复经济,安定人民生活等各项迫切任务。同时,还存在着“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认为一贯道仅是个封建迷信组织,可以待以后慢慢解决。这些原因都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取缔斗争未能开展起来或深入下去。

---

① 1949年8月11日《东北日报》。

② 1949年8月26日《东北日报》。

第二个时期是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10月。

这一时期，各地主要是结合着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严惩了一批罪大恶极的一贯道分子，部分地区还有重点、有计划地摧毁了一贯道的组织，其中，北京、山西、察哈尔等省市及山东、河北，江苏等省的一部分地区进行得比较彻底。

北京市的取缔斗争开展得卓有成效。市公安局在经过严密侦察，掌握了一贯道各方面的情况后，制定出了周密的行动计划。1950年12月19日，全市统一行动，发出布告，查封坛堂，逮捕道首，发动群众。《人民日报》于20日头版报道了这一斗争情况，并登载了《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指出“取缔一贯道是维护首都治安，保护生产，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革命谣言的必要措施<sup>①</sup>”。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3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堂1283个<sup>②</sup>。

这一时期的取缔和反取缔的斗争是较为激烈的。由于一贯道这一庞大组织并未受到致命的打击，而且在解放前后又根据所谓“长期隐蔽活动计划草案”做了“应变”准备，再加上一贯道又与特务、土匪勾结在一起，从而使斗争更加复杂、激烈。一贯道道首炮制出“应付魔考19

---

① 1950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② 赵凯：《民国帮会：秘闻与纪实》，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69页。

条”，拒绝登记、交代或假登记、假坦白，威胁小道首和道徒，不准他们登记和退道，气焰十分嚣张<sup>①</sup>。对于这些死硬分子，人民政府给予了严厉制裁，大都公开逮捕法办。据统计，到1952年9月份，全国被依法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中，“反动会道门头子（主要是一贯道）占20%”<sup>②</sup>。人民政府警告说，“那些执迷不悟的反动道首，如果依然与人民为敌，只能是自寻绝路”<sup>③</sup>。人民政府的决心，极大地震慑了一贯道的道首和道徒，于是，登记的人数多了，态度也老实了，退道的人数也与日俱增。

为了彻底摧毁一贯道这一反动组织，各地都利用了各种方式对道徒进行思想教育。主要有：利用报刊、电台广播发动舆论攻势；召开各种群众大会动员宣传，揭发一贯道的罪恶；举办一贯道罪证展览；动员道徒索还被骗钱财等。这一时期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到1951年5月，西北区退道道徒有10万人，山东省有10万人，察哈尔省为10万人，皖北有3万人，苏北有2万多人，天津有16万多人<sup>④</sup>。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一贯道已受到严重的打击，但就全国范围而言，一贯道作为一个反动组织并未被完全摧毁，特别是在一些新区，一贯道还有很大的势力，就是在已经取缔过的老区，也有漏网的反动道首在阴谋活动，

---

① 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

② 政农：《两年来的政法工作》，《时事手册》第22期，人民出版社1951年9月，第38页。

③ 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

④ 1951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企图死灰复燃。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新区,主要是解放战争刚刚结束,社会还不安定,城市民主改革和农村的土地改革还未进行,镇反也只是严惩了一些大道首,一贯道的反动组织基本上还没有被触动。在老区,主要是取缔人员存在着麻痹思想,错误地认为一贯道经过一次取缔斗争就被彻底打垮了,没有彻底清查漏网的一贯道道首,对登记过的道首也不严加管制,对声明退道的一般道徒也没有进行经常的教育,这些原因,都给一贯道继续进行活动以可乘之机,取缔斗争还需要进行一步深入进行。

第三个时期,是从1952年10月到1953年上半年。

这一时期,从中央公安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开始,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开展了不同形势的取缔斗争。在东北、华北、山东等老区、半老区,也就是已经把取缔斗争作为一个中心运动,大张旗鼓,发动群众进行了比较彻底取缔的地区,取缔斗争主要是深入教育群众,有重点地对受一贯道毒害较深的老道徒进行思想教育,从根本上杜绝一贯道的影响,并注意对漏网潜藏的反动道首的阴谋活动进行侦察,在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后,坚决给以严惩。同时,还认真进行了被判刑、被管制的道首的劳改教育工作。在解放较晚的华东、华南、西南、中南、西北的一般地区,由于在镇反运动中,只惩处了一些道首,或者做了一些群众退道工作,而基本上没有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退道运动,所以,在这类地区主要是进行了“补课”,重新侦察一贯道道首的罪恶,并依法惩处;通过“补课”的各



个环节,如专案侦察,揭露控诉道首现行反革命活动和其他罪恶活动等,认真发动广大群众,展开了退道运动。在少数解放较晚而情况又较为特殊的地区,如广西、云南、湖南、甘肃等省的部分地区,由于民族或其他社会问题,一贯道基本上没有被触动,组织活动没有受到任何打击。在这类地区,主要是高度重视,把取缔斗争做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开展了全面的取缔斗争,不仅惩办了道首,而且教育、动员了广大道徒自动退道,使取缔斗争进行的较为彻底。到1953年上半年,全国取缔一贯道的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在这场历时4年多的取缔斗争中,党和人民政府显示了高超的斗争领导艺术,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在现在看来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一、结合建国前后的主要形势、主要任务,党和人民政府始终把取缔斗争当作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来抓,给予积极的领导。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人民政权也在各地相继建立起来,但同时,新生的人民政权也面临着种种困难的考验。当时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彻底铲除反动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政权;二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准备。这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经济搞不上去,政权早晚也要丧失,而要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就必须彻底铲除反动残余势力,巩固人民政权。这样在中国人民面前就不能不提出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要保卫中国人民已得的胜利和巩固中国人民自己的政权,

就绝对不能容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就不能不采取坚决的镇压。取缔与匪特勾结,危害社会,罪恶累累的反动组织一贯道的斗争,也就成了巩固人民政权,保卫经济建设的严重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了。

在整个取缔斗争中,党和人民政府不断发出指示、布告、命令等,指导着斗争的进行。1949年1月4日,前华北人民政府发出解散一贯道的布告,拉开了这场取缔斗争的序幕。8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新解放区的剿匪斗争中抓紧“解散土匪特务所利用的会门”。<sup>①</sup> 1950年10月,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指出:“会门,特别是一贯道是目前和我们作斗争的最大的反动组织”。<sup>②</sup> 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sup>③</sup> 这样就使惩办一贯道道首有了法律的保障,量刑的标准。仅在1951年1月至2月间,中共中央即三次转发了有关山西省、察哈尔省和北京市取缔一贯道的报告,为其他地区的取缔斗争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和指导。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对于几地的取缔斗争“各地均可仿行,

---

① 《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

② 《中央公安部关于全国公安会议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44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3页。

以期有计划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sup>①</sup>。1952年7月,公安部颁布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中明确把“反动会道门头子”列入被管制之列<sup>②</sup>。10月,在第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罗瑞卿部长指出:“认真做好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是此期镇反的中心,也是取得镇反彻底胜利的重要标志”<sup>③</sup>。1953年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要把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作为农村社会改革的严重一仗”<sup>④</sup>。从当时的资料看,除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外,全国各级党组织、各地人民政府,都发出过指示、命令、布告等,指导着各地取缔斗争的进行。

各地在开展取缔斗争的时候,也大都成立有专门负责的领导机构,并设有专人负责。如北京市成立了由市委秘书长顾大川负责,以市公安局治安处为主的领导机构。内蒙古托克托县成立了“取缔委员会”<sup>⑤</sup>,湖南浏阳设立了“取缔反动会道门办公室”<sup>⑥</sup>,由县主要领导和公安局长任总指挥。

## 二、采取了正确的取缔政策、方法和行动步骤。

取缔斗争的政策,主要是党所一贯坚持的“宽大与惩办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

---

①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1951年1月24日。

② 《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2),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3页。

③ 《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

④ 《许昌县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246页。

⑤ 《托克托县志》,1984年版,第153页。

⑥ 《浏阳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页。

受奖”。在实际斗争中，严格把反动道首和一般道徒区别开来；罪大恶极、死不悔改的大道首与罪恶轻微、又肯悔改的中小道首区别开来；把一贯道的反革命活动同各种宗教活动区别开来；把一贯道在封建迷信掩护下所进行的反革命活动与一般道徒和落后群众的迷信活动区别开来。

天津市军管会的取缔布告中规定：“一贯道中除少数有重大罪恶之首要分子予以逮捕法办处，属于‘点传师’以上之分子……予以宽大处理”，“至于一般‘坛主’……免于登记”，“对所有被胁迫或被欺骗而参加‘一贯道’之‘道亲’，一经脱离组织，停止活动，即不予追究，其能揭发匪特奸谋破坏活动者，并酌情予以奖励”<sup>①</sup>。这样，就使取缔斗争真正做到了打击惩办少数首恶，教育改造多数，挽救广大被骗群众。

这项政策的另一方面是严格区分一贯道的反革命活动与普通群众的宗教信仰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普通群众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以宗教为掩护所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则应受到法律制裁。对于普通群众的迷信活动，党和政府认为这主要是认识问题，可以用教育的手段慢慢进行解决；而对于在封建迷信活动掩护下所进行的反革命活动，则是犯罪问题，要用革命的手法，决不姑息，严加惩处。

---

<sup>①</sup> 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印：《天津市法令汇编》第3卷，1950年版，第228页。

取缔斗争的方法,各地有些差别,但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结合”的方法,即:把取缔斗争“作为一个专门问题集中解决,实行专案侦察与一般调查相结合,重点破案与普遍取缔相结合,打击道首与争取道徒教育群众相结合,镇压威力与政策宣传相结合”<sup>①</sup>。

取缔斗争的行动,大体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捕捉职业道首,摧毁其领导机关,使其整个组织陷于瘫痪;第二步,对中小道首进行登记,区别情况进行教育管制;第三步,对道徒进行教育,在有觉悟的基础上展开退道运动。

三、不仓促行事,采取慎重的态度。在取缔斗争开始前,做充分而细致的准备工作;在取缔斗争开始后,集中时间,统一行动。

建国前后,由于一贯道在道徒和落后群众中还有很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而且一些死硬分子,唯恐天下不乱,竭力寻找一切机会,制造事端,如果条件不成熟而贸然采取行动,则有可能引起一定的混乱,甚至是适得其反。所以,在取缔斗争中,党和人民政府是比较慎重的。毛泽东在北京市委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上批示:“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sup>②</sup> 罗瑞卿在全国第五次公安会议上指出:“由于反动会道门主要是利用群众迷信落后进行活动,因此

---

① 《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群众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8 页。

②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的批语》(1951 年 2 月 28 日)。

农村取缔反动会道门必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必须在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即必须在广大群众具有初步政治觉悟,经济生活亦有初步改善的时候”<sup>①</sup>。

一贯道这一反动组织,同其他会道门组织松散的结构不一样,其自身组织较为严密,内部分工也比较完备和精干,而且在解放前后,在组织上又加以整顿,加强内部控制,化整为零,由大城市转到中小城镇和农村,有计划地转入地下活动。其公开活动的组织,也都改头换面,或以合法宗教、教派名义活动,或以其他会道门组织的名称活动。在西南各省,发现的 217 种反动会道门中,有 146 种即 66% 是一贯道的化名。而且在日伪和国民党的档案中都难以找出任何有价值的资料。所以,各地公安机关在大规模取缔斗争开始前,都进行了严密的侦察摸底工作,主要是确定一贯道在本地区的组织情况,活动范围,活动特点及其罪恶事实等详细情况。

此外,许多地区在取缔斗争前,还进行了取缔斗争的试点工作,以期通过在小范围内进行取缔斗争,获得一些必要的经验,确保以后大规模取缔时少走弯路,少犯错误。1949 年 10 月间,“察北各县大都搞了取缔一贯道的实验村”<sup>②</sup>。河南省许昌县也在“五女店区小王寨村进行了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斗争的试点”<sup>③</sup>。

---

① 《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第 148 页。

② 《张家口地区大事记》(1948—1983),档案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 页。

③ 《许昌县志》,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46 页。

在充分而细致的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各地在一定的区域内,集中在一定的时间里,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如济南市集中在1949年4—7月内,河北省邢台市集中在1950年12月16日,统一采取行动,取缔一贯道。

由于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又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整个取缔斗争如毛泽东所说:“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sup>①</sup>。而集中时间,统一行动,又使一贯道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无法重新有效地组织布置,对抗取缔,从而使取缔斗争可能遇到的阻力减小到最低的程度。

四、实行群众路线,动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到取缔斗争中来。

在取缔斗争中,党和人民政府始终认为:“取缔反动会道门,是一场剧烈的群众斗争,一定要发动群众,因此必须在党委领导下,与文化、卫生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并要十分注意做好宣传工作,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sup>②</sup>。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是公安机关,注意克服关门主义、神秘主义的倾向,利用各种宣传方式,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动员工作,特别是大力宣传了党和政府的取缔政策,使取缔政策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而一旦群众掌握理解了政策以后,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使取缔斗争的最终胜利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

<sup>①</sup>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请》,1951年1月24日。

<sup>②</sup> 《罗瑞卿论人民公安工作》,第148页。

东北地区,前辽西省义县曾“组织 1200 名干部,组织 18 个宣传队,赴向农村进行宣传教育,并推动农村小学教师和小学生进行屋顶广播和家庭访问”<sup>①</sup>,大力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取缔政策,揭露一贯道的罪恶,动员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参加取缔斗争。其他地方也都组织有类似的宣传队,深入城乡,主要是农村,进行宣传教育,动员发动群众。

与此同时,报刊、电台等新闻传播媒介也发挥了强大的舆论作用。各地的取缔布告都在报纸上公开登载,并登载有全国各地和本地区取缔斗争的情况,适时地配发社论、短评,或刊载图文并茂的连环画、漫画等。电台也播送一些有关取缔斗争的报道,并专门转播群众控诉大会的情况。

有效的动员发动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群众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参加取缔斗争,一贯道的死硬分子在人民的天罗地网中,无处藏身。据《人民日报》载,天津小学生胡承志等 7 人就曾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阴谋放火、行刺的一贯道点传师王金龙和道徒沈子哲<sup>②</sup>。

五、注意肃清一贯道的封建迷信和反动思想在道徒和落后群众中的影响。

动员发动群众的重要一面是教育挽救道徒和落后群众,从他们头脑中清除一贯道的封建迷信和反动思想的

---

① 1949 年 8 月 11 日《东北日报》。

② 1951 年 5 月 12 日《人民日报》。



影响。只有使道徒和落后群众的思想觉悟有所提高，认清一贯道的本质，认识到自己所受的欺骗和愚弄，才能对一贯道进行揭露和控诉，自动退出一贯道，使取缔斗争取得真正的、彻底的胜利。另一方面，因为一般道徒和落后群众都是劳动人民，他们只是不同程度地受了一贯道的欺骗和愚弄，他们是可以而且应该是被挽救的。所以确切地说：“取缔一贯道不仅是一个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斗争”<sup>①</sup>。

肃清一贯道封建迷信和反动思想的影响的重点是揭露一贯道与匪特勾结、进行反共反人民和欺诈广大道徒的罪恶以及那套骗人的鬼把戏。各地大都采用了电影（最有影响的是以北京天桥为背景的《一贯害人道》）、戏剧、广播、展览会、群众大会、宣传队、座谈会、鼓词、相声和漫画等形式，而且尽可能地利用已觉悟彻底坦白的坛主、点传师、三才等向道徒和落后群众揭露一贯道勾结匪特，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演示他们那一套“扶乩”等骗人的鬼把戏，并揭露他们骗人的经过。其中最有效的应该是各种展览会了。1951年1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一贯道罪证展览”。展览会的内容包括一贯道头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各种罪证和他们从老百姓手中敲诈来的金银财产。“展览会并设有‘控诉台’由十几个觉悟了的点传师和三才当场表演‘传三宝’‘扶乩’，向群众揭穿一贯道用封建迷信骗人的内幕，并控诉一贯道进行反革

---

<sup>①</sup> 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命活动的罪恶”。展览会在广大群众的要求下，一直延期到3月4日才结束，总参观人数达到26.6万余人<sup>①</sup>。其他地区，如山西太原、上海宝山等地也都举办有类似的展览会。展览会收到了极大的效果，揭露了一贯道的本质，提高了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极大地肃清了一贯道封建迷信和反动思想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退道运动的开展。北京市展览会期间，“到二月下旬为止，向政府登记的一贯道道徒，已有十六万余人”<sup>②</sup>。山西太原“仅在展览会期间，就有5140名道徒宣布退出一贯道”<sup>③</sup>。

肃清一贯道的封建迷信和反动思想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集训下层道首。因为下层道首也大都是穷苦人出身（辽西省集训的868个下层道首中，贫雇农、中农占71%）<sup>④</sup>，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也是受害者；而且他们一般没有较大的罪恶，更重要的是，被改造教育好的下层道首在揭发大道首的罪恶、教育一般道徒方面，有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下层道首的最好形式是办集训班。在集训班内，一方面向他们宣讲党、人民政府的取缔政策，促其解除顾虑，彻底坦白交待；另一方面通过一些觉悟快的分子组成学习小组，帮助、教育落后的分子，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上述工作，最大限度地肃清了一贯道封建迷信

---

① 郑惠：《展览会是向群众进行宣传的好方法》，《时事手册》第10册，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50—51页。

② 同上。

③ 《山西省大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

④ 1950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和反动思想的影响,使彻底取缔一贯道有了可能。但是,肃清一贯道的思想影响,也并非短期可为,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

建国前后,取缔一贯道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贯道做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被彻底取缔了。但党、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同一贯道的斗争却并没有结束。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家,封建迷信思想曾经甚为流行,至今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仍大有市场。而会道门组织也是源远流长,并且很有一套欺骗、迷惑群众的鬼把戏。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经济文化生活比较落后,文盲半文盲还占有一定的比例,特别是在边远山区和偏僻的农村地区,一些群众缺乏科学文化知识,封建迷信思想也比较浓厚,当他们遇到自然灾害或疾病等不可抗拒的威胁时,很容易接受一贯道的荒诞邪说而受骗上当。另一方面,一贯道在解放前后被大规模地取缔后,仍有一些残渣余孽在继续进行活动。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刑满释放分子或管制、解除管制的分子,他们时刻都在蠢蠢欲动,企图东山再起。

在肃反运动中,就发现有一些潜藏或隐藏在地洞和基层单位的一贯道分子,他们仍积极地进行着各种破坏活动。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他们活动更加积极。一直到了80年代,尚有一贯道分子在活动。1982年,云南省华宁县就有一贯道分子进行活动<sup>①</sup>。1983年,河南省也有一

---

<sup>①</sup> 《华宁县志》,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页。

贯道分子在搞复僻活动<sup>①</sup>。这些情况都充分说明,彻底取缔一贯道这一反动组织,将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任务,只有时刻警惕,常抓不懈,才能取得最后的、彻底的胜利。

---

<sup>①</sup> 《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9 页。

#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梁 秀 峰

## 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基础和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临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就是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富强的工业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就是根据这个历史任务,并且适应我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而进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不是偶然的,而有其相应的基础。

各级人民政府的建立和政策的统一,民主改革任务的完成和安定团结局面的呈现,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政治基础。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市场物价的基本稳定和国有经济掌握了全国经济命脉,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经济基础。

各级政府经济管理机构的充实和完善,中央、地方、部门和大中型企业计划机构的建立和加强,特别是国家

计划委员会的建立,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组织基础。

先后编制了主要部门(行业)年度计划要点和试编了国民经济年度计划概要,对若干重要经济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原苏联计划方法的学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工作基础。

《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决定》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条例(法令)的颁布和实施,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奠定了体制基础。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组织基础、工作基础和体制基础的奠定,是计划得以制定和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同时,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又面临着复杂的形势、任务和矛盾。

一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同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矛盾。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胜利完成和国有经济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就总体而言,当时我国经济还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占国民经济相当大比重的农业经济仍然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相当明显。据统计,1952年国民收入中,国有经济占19.1%,个体经济占71.8%,资本主义经济占6.9%。而在农业生产中,农民个体经济占99%,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经济占居绝对优势。这种以私有制为主体和相当程度的自然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既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和实施,特别是对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是很大的困难和制约。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下,对各种经济成分的安排采取统筹兼顾的政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质上采取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把社会主义改造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把国有经济发展同其他经济成分发展结合起来。

二是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同加速工业化进程的矛盾。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这个原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据统计,1952年的国民收入中,农业净产值占57.7%,工业净产值只占19.5%;而在工业净产中又有55%左右是依靠农业提供原料得以实现的。特别是在全国总人口中,农业人口所占比重高达85.6%。因此,工业与农业问题、工人与农民问题、城市与乡村问题始终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根本性问题。严重的问题在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手工劳动的农业与机械生产的工业、分散的农业与集中的工业、自然经济的农业与商品性生产的工业、缓慢增长的农业与迅速发展的工业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集中表现在商品粮供应和工业原料作物生产远远满足不了城市和工业发展的需要。据统计,1952年我国农产品商品率只有30.5%,其中粮食商品率

仅为20.3%。农业发展的落后特别是商品粮供应不足的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就相当突出。当时全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能提供商品粮 380 斤,粮食供应和粮食调拨难度很大。以我国粮仓著称的东北地区,计划上调中央粮食 42 亿斤,结果只能上调 26 亿斤,对城市人民生活和市场稳定影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极端重视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民以食为天”。据此安排好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工人等基本关系,为求把工农联盟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三是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同复杂的国际环境的矛盾。

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为了争取抗美援朝的更大胜利,我国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据国家财政决算材料,1953 年国防费为 75.4 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 34.2%),超出国防费预算支出的 44.3%。当时,美帝国主义以武力霸占我国领土台湾,并对我国采取军事包围、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的政策,妄图扼杀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复杂而艰险的国际环境,要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采取相应的战略部署,通盘考虑争取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同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关系、经济建设同国防建设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争取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同加快工业化步伐的关系。



## 中共中央的指示和部署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极为重视和亲自过问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在组织领导方面,为了加强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组织领导,1951年春,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和宋劭文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随着计划制定的进展和工作的需要,1954年4月,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成员有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和陈伯达。

在重要指示方面,中共中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方针任务、战略部署和重大对策等关系全局性问题,先后做出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和决定,从而构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思想、基本要点和重要依据。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即再用22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从1953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的精神,当年2月19日,朱德在全国工业会议上着重讲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问题。他要求立即行动起来,着手做好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准备工作。

在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

需要首先研究和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方针、任务和政策。对此,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对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如下指示:(一)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是在抗美援朝环境下进行的,必须按照中央“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来从事国家建设。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这是我们制定计划的出发点。必须由此出发考虑国家建设的投资、速度、重点、布局和比例。(二)工业化的速度首先取决于重工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大规模建设的重点。这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而不是分散力量去进行基本建设,要求我们以有限的资金和建设力量,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建设起决定性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和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建设的同时,决不可以忽视轻工业、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决不可以忽视贸易事业、运输事业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三)在制定生产计划时,必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预计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0—60%要依靠工业企业的积累来解决;国家建设必要的机器设备相当大的部分应当依靠现有企业的生产来提供。因此,合理地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和现有设备能力,充分发挥企业的潜在力量,就成为制定生产计划最为重要的问题。(四)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因此具体了解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研

究,熟知国民经济状况和掌握各方面的发展比例等,是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基础。中共中央作出的这些原则指示,对搞好五年计划是极为重要的,又是很宝贵的。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工作加紧进行,并着手研究如何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相衔接之际,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基本要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又进一步确定,要以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对其中一些重大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主体,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为我国工业化奠定稳固的基础。(二)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是发展重工业,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在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有计划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商业和文化教育等事业。(三)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首先发展国营工业,并发展国营交通运输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逐步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比重不断增长。(四)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

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既规定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明确的要求,从而使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安排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并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一个重大步骤。

### 计划制定的主要过程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是在缺乏资料、缺乏经验和缺乏人才这种“三缺”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不能不带有浓厚的探索色彩,不能不经过多次反复调查研究和多方案分析比较(仅从主要编制过程来说,先后进行了五次编制;以工业增长速度而言,先后提出了七个方案),从而使计划的制定一步一步地趋向充实完善和接近实际。

早在1952年5月21日至6月5日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就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了酝酿和讨论。李富春在会上强调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尤其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基础工业,从而为我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农业、轻工和交通等事业应围绕重工业这个中心来发展。他还

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干部与技术力量不足(5年共需35万人),特别是地质人员和设计人员更为缺乏,如果不集中力量突出这一点,其他问题都不好解决。这是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重点和突出问题较早的论定。

根据全国财政会议讨论的情况和有关方面的初步研究,1952年6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以及煤矿、电力、石油、钢铁、有色、化工、电器、机械、交通、纺织、轻工、农业、林业和水利等20多本表册。尽管其中内容还比较粗浅,但它们确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最初表现形式。当年8月,周恩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曾以这两个文件同原苏联政府交换意见,并商谈对我国的援助。这个五年计划轮廓的要点是(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并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二)经济建设的重点是工业,工业建设又以重工业为主,轻工业为辅。(三)工业在可能条件下应力求迅速发展,五年期间以年平均20.4%的速度持续增长。(四)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安全和长期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充分利用东北地区和上海等工业基地,并为建设新厂矿和新基地创造条件。(五)铁路建设以沟通西南、西北和中南为主要任务,以适应国防安全条件下国家长远建设的需要。(六)五年基本建设投资505亿元,并根据我国经济建设

的需要,提请原苏联援助我国工业建设项目 91 个。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设想。由于时间紧迫和缺乏经验,特别对 1950 年—1952 年期间那种恢复性质的快速增长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提出的基本任务和主要指标一般偏高。

对于这个计划轮廓设想,当时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进行研究和讨论,认为这个五年计划轮廓设想还不成熟,需要做很大的工作,经过充实资料和仔细研究计算,然后再作计划,并于 1953 年 4 月向中方提出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归纳起来主要是:(一)五年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是建设重工业,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二)工业年平均递增 20% 的速度是没有保证的。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要超额完成,因此工业年平均递增速度安排 14—15% 比较适当。在建立新的工业基地的同时,还要注意旧厂的利用和改造。(三)在五年计划中,要培养自己的专家,加强地质资料工作。这项工作只能由中国自己做,提前做。这是当前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四)要注意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工业,这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作用很大。(五)要十分注意农业发展问题。对此,不仅要考虑生产大量质量好、价格低的简单农具和化肥,还要保证工业品对农村的供应,发展城乡物资交流。(六)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和发展商品流通方面,还要用很大的力量进行研究,特别是要进行财政和物资的平衡。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科学性、完整性和可行性大有帮助。在这次商谈中,还确定帮助我国建设的重大

工业项目中,由苏方担负工作量的 70—80%,设备供应的 50—70%。从而使一批最关重要的工业建设项目得到落实,成为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骨干。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采纳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建议,以及援助我国工业项目的确定,与此同时又发觉在制定五年计划工作中流露出急于求成的倾向。据此,国家计委于 1953 年第二季度先后召开了十几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邮电、商业外贸、劳动工资、成本物价和文化教育等问题,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某些主要指标进行压缩和调整,并对若干重要内容进行调整和充实,然后向当年 6 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政经济会议作了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报告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地增长。在这一总的目标下,相应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积极地有步骤地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作用,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报告还强调指出:发展重工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环节;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不断增长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道路;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是制定计划和政策的出发点;安排五年建设留有一定的后备是制定计划的重要思想。(二)对原来设想的五年计划主要指标进行压缩和调整。工业年

平均增长速度由 20.4% 降低为 14.9%；并对农业年平均增长 7%、劳动生产率年平均提高 10—12% 和职工平均工资年平均提高 12—15% 等过高指标进行压缩和调整；五年基本建设投资大体维持 500 亿元左右。（三）提出在制定五年计划过程中必须注意的若干重要问题。一是既要反对冒进倾向，又要反对保守倾向，在当前情况下，反对冒进倾向往往是主要的，特别是要克服建设进度和生产指标要求过急过大过高的倾向。二是针对计划安排没有做好各种平衡，提出五年计划必须做好综合平衡特别是物资、设备、外汇、财政、劳动力和干部等几个方面的平衡。三是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地方的需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国家计划能够比较正确地反映中央经济部门、各个地区的经济情况和发展要求。四是制定五年计划必须克服对任务和指标考虑多，对实现计划需要采取的物资技术和组织措施考虑少；对工业注意多，对其他注意少；对争取国外援助考虑多，对自力更生考虑少等片面思想。经过这次进行的重大调整、修改和充实，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逐步接近实际，五年计划的框架也初步确定。以后的计划制定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平衡、细化和落实，并进入计划纲要草案的起草阶段。

1954 年上半年，中央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成立后，由陈云主持、李富春协助先后召开了 14 次会议，对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草稿）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于当年 6 月 3 日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着重对若干实质性问题和重大比例关



系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一)关于工农业生产建设问题。工业生产计划平均每年增长15.5%的速度,估计可以完成和超额完成,但钢材、棉纱和有色金属等主要产品完成计划还有困难;五年期间工业增加的产值75%主要依靠原有工厂和自己设计的工厂来实现;在苏联援助的“141项”工业建设项目全面铺开 after,“一五”后两年基建力量会更加分散,可能遇到更多困难,因此,有些项目(包括“141项”)需要推迟;农业生产五年平均递增5%,由于物质条件所限,生产增长只能主要靠合作化运动。(二)按比例发展问题。总的来讲,五年计划中部门比例安排是有缺点的,但目前只能按照拟定的方案来办。一是农业与工业比例。按照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使农业生产完成计划,也是很紧张的。对此,国家在财力上对农业应予更多的支持,五年对农业的投资占经济建设总支出的比重应达到15%以上。二是轻重工业比例。目前轻工业发展主要问题是缺乏原料特别是农业原料,五年计划安排的轻重工业投资1:7.3的比例维持不变。重工业内部主要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炭和电力紧张。这种状况目前还无法改变。三是技术力量不足,需要与供应相差11万人。(三)财政收支平衡必须反对冒进和保守两种倾向。一方面需要保有一定数量的预备费(“一五”后三年安排预备费38亿元,占总支出的3%);另一方面又准备在年度计划中可能增的投资。(四)购买力与商品供应,1957年供求差额为40亿元(占供应总额的8%)。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主要是

增加工农业生产、发行公债、提倡储蓄和适当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但对调整价格要极其慎重，量力而行。(五)现在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大体轮廓已定，不宜再变。由于间接计划部分很大，因此这个计划应经地方党委在更大范围内加以讨论。

根据八人小组汇报的基本内容、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和地方党委的建议，国家计委对计划纲要(草案)再次进行修改和补充。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当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广州集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共同审阅了这个《纲要草案(初稿)》。同年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了11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建设重点、工农关系、地区布局和人民生活等重大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会议同意国家计委拟定的《纲要草案(初稿)》，并提出若干修改和补充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是：(一)“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应明确反映出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落后技术变为先进技术的要求，并以“141项”为中心来发展我国工业生产建设。(二)发展重工业是一个长期建设的任务。因此，“一五”又要同“二五”相衔接。(三)抗美援朝战争虽已停止，但不能忽视国防建设，“一五”计划还要考虑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因此，在基本建设中特别是重要工业企业建设不能过分集中，并且还要考虑防空问题。(四)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农民和农业生产有很大影响。有些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会影响工农联盟和农业生产。

(五)工业建设要大中小相结合。“一五”期间搞一些大型工业企业是必要的,但中小型工业企业搞起来也有很多好处。因此,建设我们的国家,不能只走一条道路,而要多想些发展道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审阅,中共中央责成国家计委对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再作进一步的修改,然后提交 1955 年 3 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

1955 年 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并颁布实施。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一)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 156 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 694 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二)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 14.7%,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 4.3%。(三)五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 427.4 亿元。其中工业部门投资占 58.2%,农林水利投资占 7.6%,运输邮电投资占 19.2%。(四)工业建设的地区战略部署是:合理利用东北、上海和其它城市现有工业基础,以加速工业建设;积极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的新的工业基地建设;在西南开始进行部分工业建设,并为新的工业基地建设准备条件;

逐步把沿海城市某些可能迁移的工业企业向内地迁移。  
(五)五年内,职工平均工资增长 33%,农民购买力增加一倍。

最后确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制定过程中的几个草案相比,有很多重大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有五点:(一)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根据国力可能和建设条件,将原拟定的“建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修改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个修改实质上是适当放慢了工业化的进程,客观上也纠正了那种急于求成和百废待兴的思想,从而把国家建设建立在比较坚实可靠的基础上。(二)对若干重大指标进行了调整。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由 20.4%调整为 14.7%,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由 7%调整为 4.3%,五年基本建设投资由 500 亿元调整为 427 亿元。从而把我国生产建设建立在比较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三)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对若干重大比例关系特别是工业与农业、建设与生活、投资规模与财政拨款、购买能力与商品供应、生产建设与技术力量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妥善的安排,推动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和快速发展。(四)对工业地区布局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部分地纠正了工业建设过分偏重内地而忽视沿海的倾向,从而促进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相互推动和协调发展。(五)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对城乡人民生活做了适当的安排。以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的统购统销为要点,重点安排城乡居民吃饭和穿衣两项最基本生活低标准的需要,并多方面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力求保证经

济、生活和社会的稳定。

## 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前后经历了4年的时间,进行5次重要的编制和多方案的分析比较,最后确定了比较可行和大体适合国情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在计划实施过程中,由于指导思想的急于求成、重大决策的改变、经验的不足和不可预见因素的增多,也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

### 一、农业落后同加快工业化进程的矛盾

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工业和城市的迅速发展,农业落后特别是粮食、棉花和油料等主要农产品供应紧张的状况日益暴露,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工业生产发展、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和市场物价稳定,中共中央决定,于1953年11月和1954年9月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这对保证人民低标准的基本生活必需、市场物价的稳定和城市的发展是很必要的。但是在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和主要农产品商品量不足的情况下,实行粮棉油的统购统销,实际上是把全国播种面积的90%以上由国家间接地做出安排,使农民生产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影响。

自然灾害频繁是造成农业生产不稳定的重要因素。1953—1957年期间,全国水旱灾害受灾面积累计14.5

亿亩(占耕地面积的 17.1%),减产粮食 993 亿斤。主要是自然灾害的原因,五年期间有 4 年未能完成国家农业生产计划。

农业生产的落后和不稳定,对工业生产建设影响很大。1954 年我国发生严重水灾,粮食生产仅完成计划的 95%,棉花生产完成计划不到 80%。1954 年的农业欠收对 1955 年的工业生产影响巨大。这一年,导致 80%以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纺工业生产比 1954 年有所减产;基本建设投资只比上年增加 2 亿元;财政收入也只增加 3.7%;粮食净收购则减少 12%。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由于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因而收效不够显著。

## 二、盲目冒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时有发生

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急于求成的倾向就时隐时现。正如周恩来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在 1953 年,有些部门和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张、百废待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倾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加以预算收入底子铺得过大和预算支出增加过多,发生了财政金融膨胀和巨额财政赤字。对此,1953 年 8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由于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并调整了国家计划和财政预算,国民经济很快地稳定下来,减轻了这次“小冒进”带来的损失。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推动下，我国出现了带有全局性的盲目冒进。这次冒进，是在1955年12月毛泽东提出批判所谓“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的推动下，以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颁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为先导而迅速扩展起来的。这个《纲要》要求在以后的12年期间粮食和棉花产量分别以年平均8%和12%以上的速度递增，以保证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和棉花产量达到1亿担。农业的高指标催逼着工业、交通、文教和基建等方面的高指标，并要求相应修改原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1956年计划。例如原来确定的1956年投资计划为121亿元，在急于求成和盲目冒进思想的推动下增加到170亿元，比1955年实际高出90%，国民经济出现不稳定态势。针对这种错误倾向，周恩来在1956年6月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地指出：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急燥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对此，周恩来、刘少奇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遏制盲目冒进，并对财政预算、基建投资和物资供应等主要指标进行压缩（基建投资由170亿元压缩到147亿元），使严重不平衡的国民经济逐步趋于稳定。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实施不久，却遭到毛泽东的非议。他认为“反冒进”是反掉多快好省，是“促退”，并提出要反“反冒进”，从而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曲折的局面。1956年，重工业比上年猛

增 39.7%，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 37%，货币发行比上年增长 42.1%，并对 1957 年及其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少问题。

### 三、生产关系变革的急于过渡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大而又深远的问题，是生产关系变革的急于过渡。1953 年夏季以来，中央主要领导人就流露出急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情绪，集中反映在毛泽东 6 月 15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论点，斥责为所谓“右倾的表现”。这种急于过渡的思想在 1955 年下半年的农业合作运动和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高潮中发展为全党的实际行动，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对原定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一些时间才能基本实现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极为复杂、极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在 1956 年就“提前实现了”。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约有 4000 万个体农民跨越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而直接“跃进”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从而在我国城乡形成了比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回顾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时 1956 年的经济基础是：人均国民收入只有 140 元的低水平；农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比重 49.8% 和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比重高达 80.6% 这种农业国的现实；工农生产中 60% 以上是依靠手工劳动的生产方式；农产品商品率只有 31.4% 这



种自然经济特征；特别是温饱问题远未解决。急于过渡所导致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给以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 四、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新形势新矛盾

旧中国殖民地经济和畸形发展的特征之一，是工业分布偏集于沿海几个少数城市。按照目前的三大地带划分范围，1952年我国工业总值中68.3%集中在东部地带，而西部地带仅占4.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是在一种复杂和艰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的。因此，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要点是：第一，合理利用东北、上海和其它城市已有的工业基础，发挥它们的作用，以加速工业建设的进程；第二，积极进行华北、西北、华中等地新的工业建设；第三，在西南开始部分的工业建设，并积极准备新工业基地建设的条件。现在看来，这个战略布局思想是比较恰当的，但在实施过程中曾经发生一些片面思想。1955年夏季曾经提出要重新考虑工业布局，在沿海城市新建、改建的项目凡非绝对必要的一律停止建设，在内地的建设项目亦应适当分散。这种片面强调国防的倾向影响了我国工业的合理布局。1956年以来，在总结前一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并对国际形势进行了新的判断，认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因此，对工业布局进行了调整。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资完成结果，沿海地区占41.8%，

内地地区占 47.8%，未分地区占 10.4%。现在看来，这样建设布局大体上是适当的。

## 计划实施成就巨大

总的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个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的好计划。在那种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能够制定出这样的五年计划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宝贵的。它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不成熟、理论探讨不彻底和社会实践不充分，曾经发生过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由于觉察较早、决策及时和措施有力，因而减轻了损失，并保证计划实施取得巨大成就，我国经济面貌也发生了初步变化。

在社会生产方面，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商业都得到较快的发展。五年社会总产品增长了 70.9%，其中工业增长 128.6%，农业增长了 24.8%，都超额完成了计划。

在经济建设方面，初步展开了建设布局，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五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550 亿元，超额 15.3% 完成国家计划。五年新增固定资产 460 亿元，交付使用率高达 83.7%，投资效率比较好。以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基本化工、机械工业和国防军工为主体的“156 项”重点建设顺利展开，成为我国工业的骨架，其中 68 个重大工业工程项目已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在此期间，我国建立起一批新工业部门，并在东北和中部建立起

一批新的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化工等基础工业基地，在西部和中部建立一批国防工业重点工程。建设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成为支持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继续前进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支撑力量。

在交通运输方面，全国货运量由 1952 年的 31516 万吨增加到 1957 年的 80365 万吨，即增加 1.55 倍。集二铁路、宝成铁路和鹰厦铁路分别于 1955 年、1956 年和 1957 年建成通车。公路和水运事业也有较快的发展。

在商品供应和市场物价方面，在工农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基础上，1957 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 474 亿元，剔除物价因素，实际比 1952 年增长 62%。由于国家掌握相对较多的商品，并且又注意保持市场供求的大体平衡，因而市场物价基本稳定。五年期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年平均仅上升 1.7%。

在文教卫生方面，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各级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由 1952 年的 5444 万人增加到 1957 年的 7181 万人，其中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由 19 万人增加到 44 万人；卫生机构也由 38937 个增加到 122954 个；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状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五年期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提高了 22.9%，年平均仅递增 4.2%，保持了较低的基本生活需要。

这些情况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是大体接近我国实际的，计划执行结果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取得的经

验教训也是宝贵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胜利地开拓了我国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航程，谱写了我国计划史上胜利的开首篇章。因此，人们在回顾我国经济建设史特别是计划史时，把第一个五年计划称谓“新中国计划史上的春天”，涵意是深厚的。

# 中共八大对“一五”经济工作的分析

董志凯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以每年递增11.3%(社会总产值)<sup>①</sup>的速度发展;全国以苏联帮助建设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为核心,以限额以上的694个(至1957年为992个)<sup>②</sup>建设项目为骨干全面展开基本建设,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各业兴旺,财政金融平衡,市场稳定,人民生活改善,形成了五十年代我国的繁荣景象。正值1950年即将提前完成一五计划主要指标之际,中共八大在筹备之际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作了实际的全面的总结。从而形成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不朽著作与在经济工作中“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指导方针,构成了八大路线的基本内容。这些思想围绕着中共中央提出的“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上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宗旨,形成了一系列有中国特色的经验总结,至今仍在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史上熠熠生辉。

---

①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5》,第21页。

② 国家统计局:《1950—198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第155页。

对于“一五”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共八大前后的分析和探索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 一、探索“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的经济管理制度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把苏联经验当作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认真学习苏联的经验，对于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1956年初，苏共的二十二大，对于在国际共运中解放思想，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起了促进作用。是年春天，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各部门的汇报时多次指出，要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导致八大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会见外国代表团谈到学习苏联经验时都采取分析的态度，强调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去创造适合本国情况的建设道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在1956年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实践，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包括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及其管理经验，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刘少奇在1956年6月17日曾经说，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只有一种比较好的，对一个国家或某种情况来说比较合适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是比资本主义制度好，但是必须不断改进和完善，把任何一种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毛泽东在1956年12月7日讲了关于

允许雇工、开办私营大厂、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些认识对于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经济起了促进作用<sup>①</sup>。

在三大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负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陈云首先敏感地发现了对市场机制过分限制——主要包括国营商业对工业产品无区别地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的办法；国营批发商业之间自上而下的派货办法；限制私商采购和贩运的办法——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了在三大改造过程中，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过多地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以及忽视农民家庭副业，而导致生产积极性下降、产品品种减少。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应是“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著名论断：“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决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

---

<sup>①</sup> 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四十年的回顾与思考》，第35页。

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sup>①</sup> 陈云的这些论述,开创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双重机制结合作用的先河,他从实际出发提出的这些论述,闪耀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火花。

周恩来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最高领导,根据 1956 年 5 月到 8 月全国体制会议的精神,提出“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地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中心的问题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同时提出了“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就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sup>②</sup>。

在以上精神的指导下,各部门、各地方的负责人也就完善局部的经济管理办法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国务院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也针对手工业的特点提出:“在进行经济改组和技术改造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保持手工业不同行业的生产经营特点,保持手工业与大工业之间应有的分工,不能千篇一律地要求手工业向大工业看齐,变修理业为制造业,或者挤掉手工业复杂多样的小产品。”“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统一核算盈亏和分别核算盈

---

① 《八大文件》,第 336 页。

② 同上,第 141 页、138 页。



亏……应该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情况,从实际出发,稳妥地进行改组改造工作。……不论是大社、小社、小组,或合作社领导下的分散经营户,只要是没有剥削,都应该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sup>①</sup> 这些论述均有利于纠正三大改造后期出现的要求过急、进程过快、方法过于简单、形式过于单一等脱离我国生产力实际水平所出现的种种问题。

## 二、总结国家计划管理的经验教训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时期。在建立新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对于计划体制的建立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极其审慎,反复与苏联专家探讨,反复实地勘测和研究设计方案。仅一五计划的制定就历时五年,六易其稿,在实施了3年以后的1955年才正式定稿。因此,他们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时格外深刻与丰富。

1、关于中国计划管理的特色。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首先深刻地分析了我国计划管理的背景: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而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农业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以前,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地质资源的情况还不清楚;统计工作的基础薄弱,编制计划的根据还不完全;而我们

---

<sup>①</sup> 《八大文件》,第580—581页。

对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还缺乏经验,对全国规模的计划工作更缺乏知识和经验。在此基础上,我国计划工作的特点为:“除社会主义企业的计划外,对其他经济成分的计划,还不能不带有相当大的估算性质。因此,在计划方法上,有的采取直接计划,有的采取间接计划;在计划所根据的资料上,有的采用统计数,有的采用估计数;在计划的范围上,在些生产、建设和副业的主要指标在国家计划中作了具体规定,有些则不作具体规定;在计划工作的分工上,各级计划机关除负责综合平衡外,着重注意直接计划,而在间接计划方面(如农业、手工业和私人工商业),则采取由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分工管理的办法来进行工作。”<sup>①</sup>

这种全面计划和区别对待相结合、统一综合和分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与苏联的计划管理办法有很大差异,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保证了“一五”时期经济建设的圆满成功。

即使如此,我国在实施一五计划的过程中,仍走了一些弯路,积累了许多教训。如化学工业部几年来,除配合国外设计以外,自己设计的工业项目大小共 68 项,其中因计划变更取消和返工的项目就占总数 60% 以上。有的初步设计已经做完,有的甚至技术设计都已做完又取消了。其后果,不算对施工单位和建设工程的影响,仅就设计院来说,根据 1954、1955 年两年不完全统计,共浪费勘

---

<sup>①</sup> 《八大文件》,第 447、449 页。

测设计力量 8.5 万个工作日,相当于 280 人一年没有做工作。此外,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各部门在协作配合上矛盾很多,常常无人负责及时解决。这些问题要求编制和修订计划有更高的科学性,各部门和各方面能够充分协作等等。

此外,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管理方面,八大会议还提出了:

2、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sup>①</sup>;

3、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使各部门按比例发展<sup>②</sup>;在这个问题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从国家财政、农产品价格、消费等方面提出了工业同农业、重工业同轻工业、国家建设同人民消费之间的比例问题。并且进一步要求“不能不增加一些轻工业投资的比例,适当改变一些重工业投资的比例和其他方面支出的比例,在保证我国工业较高的发展速度的条件下,适应情况的变化,作一些必要的调整,这是应当的。”<sup>③</sup> 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贾拓夫则从发挥原有工业的潜力,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大型工业和小型工业的关系方面,提出今后“轻工业的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也应该比第一个五年的

---

① 《八大文件》,第 117 页。

② 同上,第 118—119 页。

③ 同上,第 393—394 页。

12%有所提高”<sup>①</sup>。

4、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sup>②</sup>；

5、正确地安排经济与财政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sup>③</sup>；在这个问题上，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根据新中国财政工作几年来的经验，首次提出了几个数量界限：“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者略高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的，是比较稳妥可靠的，它既可以保证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可以保证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使我国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些。”<sup>④</sup>

6、正确地安排基本建设投资的结构和布局。<sup>⑤</sup> 在生产布局方面，会议注重发挥沿海地区原有工业基地的作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的发言指出：“过去三年来，国家对江苏地方工业的投资共3800万元，仅为江苏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和税收的4.78%，其中用于更换固定设备的投资还抵不上同一时期固定资产的折旧，以致各项工业交通运输的设备，得不到及时的更新，超龄的部分

---

① 《八大文件》，第435—437页。

② 同上，第120—121页。

③ 同上，第121、126页。

④ 同上，第232—237页。

⑤ 同上，第128—130页。

日益增加。有些产业的设备能力的利用率有的偏低,最差的如火柴、卷烟还不足 25%。资源潜力的利用更差,如全省有一千多华里的海岸线,但海产的产量仅占蕴藏量的 20%,江河湖泊的也只利用了 20%。这种对原有工业和各种资源潜力利用很不充分的情况,是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的”<sup>①</sup>。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在坚持有计划地在内地建设新的工业基地的同时,强调了充分利用沿海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

周恩来批评了经济工作中“只追求多和快、不重视好和省的偏向”。对于计划工作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他强调指出:“计划所造成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计划所造成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因此,“各级国家机关和企业部门应该首先做好计划工作”<sup>②</sup>。这些意见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工作的一些特点,有利于经济体制建设和经济工作的改进。

### 三、探讨改进企业管理,调动人的积极性, 通过集约经营发展经济的方式

八大期间,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从多方面探讨了通过集约经营发展经济的方式。其中不仅涉及加强企业定额管理、技术管理,贯彻执行责任制度;而且提出了推进

---

① 《八大文件》,第 548 页。

② 同上,第 149、148 页。

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问题,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促进技术的发展<sup>①</sup>。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从当时我国机械工业落后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将修配性的工业改造成为制造工业和从仿造向自行设计的方向发展的问題。关于前者,他提出了企业的专业生产方向;建立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建立正规的制造方法和制度;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几个方面的具体措施。指出了“一五”时期工业企业生产中存在着“只顾前方,忽视后方”的偏向,即“设计、工艺工作跟不上车间的要求;工具车间很薄弱,工夹具供应不上;机械修理车间能力不够,设备往往失修,不能保持精度;材料的化验,零件和成品的检验,产品和工艺的试验研究机构等都还很不健全;计量标准还不统一;标准化工作还没有开展等等”,并且检讨道:“对老厂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我们认识得比较迟,下手较晚,过去对老厂的投资也削减过多,直到去年才开始比较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预备在今后两三年内,根据不同的情况,逐步进行各厂的技术改造。”他强调指出:现在已经出现的许多问题,光靠仿造是解决不了的。我们一方面要继续采取仿造的办法,大量发展品种;另一方面还必须努力培养设计力量,开展产品的设计工作。设计工作必须充分占有国内外的产品资料,开展技术情报工作;设计人员必须积极参加试制和试制品的鉴定工作,要有科学试验研究工作作基础,推行生产标准化。

---

<sup>①</sup> 《八大文件》,第149、132页。

八大前后许多领导人均探讨了三大改造以后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问题。在城市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人的地位由工人监督生产转变到由工人和国家机关所派的公股代表一起去管理生产;资方人员被国家给予了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权,即公务人员的职权。对此,有多方的不适应。陈云针对这些问题从工人和原资方人员两个方面阐述了需要作的工作<sup>①</sup>。

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全面阐述了要正确处理国家对合作社的计划指导关系:“国家对农业生产计划不能订得太细太死,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机动性。应该逐步改变现在由国家规定生产指标的制度过渡到将来国家只规定各省的调拨指标,各省、县只规定各社的征购指标,国家经济部门则同合作社订立采购合同。全作社在完成国家的征购指标和发行经济部门的合同义务以外,有权根据社员的需要和可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来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除了完成征购任务及履行合同义务以外的多余产品也可以自由支配,国家不要样样去干涉他们。这样做可以大大发挥农民的积极性,而对国家又并无害处。”在农业合作社中,则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与社员个人之间的关系。邓子恢提出了四项原则:“在合作社的产品分配方面,要采取‘少扣多分’的方针”;“在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方面,应该采取‘大的集中,小的分散’的方针”;“在生产资料处理方面,应该采

---

<sup>①</sup> 《八大文件》,第 327—328 页。

取‘主要公有，次要私有’的办法”；“在合作社组织领导方面，必须实行‘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原则，实现民主办社”<sup>①</sup>。

#### 四、市场物价政策问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物价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反应最为敏锐。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在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市场，恢复经济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随着统购统销的普遍实施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限制了市场物价的作用，一方面维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主要是价格不能随着经济与市场的发展变化，因时因地及时调整，在农副产品方面反映尤其突出，以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农产品的生产与城市副食品的供应。陈云与李先念在八大的发言均正视了这些问题。如前所述，陈云从经济管理体制上深刻阐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李先念则从财政与物价工作的角度提出了物价调整的具体原则和方向：“在稳定物价的基本方针下，根据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商品流通，既照顾国家积累又照顾人民消费的原则”，1、较大幅度地提高生猪、油菜籽、桐油、茶油的收购价格，适当地提高芝麻、茶叶和部分地区的花生、蚕茧的收购价格；2、适当缩小同地购销差价，适当分散粮油等农副产品

---

<sup>①</sup> 《八大文件》，第 361—362 页。



的加工经营,恢复农村城镇的小型加工作坊;3、对交通不便地区的农副产品收购补贴运费;4、适当提高小杂粮的收购价格;5、修正不适当的农产品品质标准和等级差价,纠正农产品收购当中压级压价的错误作法;6、贯彻执行按质论价、优质优价的政策;7、适当地调整工业品的地区差价。

上述发言表明,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务实的中国经济工作领导人已经在实践中初步领悟到了计划要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工作不能背离价值规律法则。然而届时我国正处于高速工业化的阶段,资金不足,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农产品供应紧张,人民消费水平很低,国际封锁尚未完全解除。因此,市场物价问题往往使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有些产品的销售价格是应当相应提高的。但考虑到有些产品和这些产品的制成品是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为了不过多地影响广大人民的生活,销售价格目前还不宜变动”。于是李先念提出的第一步解决方案为:第一尽量减少经营环节,减少商业费用,从改进工作当中想出路;第二国家可以考虑减低这些农产品的税率,减少国营商业经营这些农产品的利润,这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性的办法。对农产品中的经济作物采取了上述提价措施后,尚需考虑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争地的问题,需要考虑经济作物的结构问题,此外,粮食价格是所有农产品价格主体,是市场物价的中心,粮价一有变动,必然牵动整个市场物价。因此,他又提出:“对于粮价的调整必须慎重

从事；个别需要调整的地方，也只能分期分批地进行。”<sup>①</sup>

直至今日，当我国确定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关于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价的一些原则还有现实意义。其原因就在于要求快速发展的主客观环境和尊重价值规律是一脉相通的。

## 五、增加国际经济交往

1956年前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由于其内部矛盾缺口越来越大了；1954年亚非会议以来，我国同许多亚非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与交往越来越密切了；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与我国经济等各方面的互助协作关系在继续友好发展，这一切，使我国增加国际经济交往的一贯主张有了进一步实现的可能。因此，周恩来在八大高瞻远瞩地宣布：“我们也愿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发展经济上、技术上和文化上的联系。我们一直在努力扩大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并且愿意把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方法中有用的东西吸收过来，为我们的建设事业服务。尽管美国对我们实行禁运，并且强制许多国家对我们采取同样的政策，但是这个彻底违反各国人民利益的政策，已经遭到各方面日益强烈的反对，这个不合理的人为障碍，迟早是会被扫除

---

<sup>①</sup> 《八大文件》，第386—393页。

的。”<sup>①</sup>

综上所述,1956年至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八大前后,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总结了一五时期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其中虽然没有提出市场经济的问题,但是在指导思想中具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特点;对于三大改造以后形成的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提出了放开搞活、多元化的思想;对于三大改造运动中要求过急、进程过快、方法过于简单、形式过于单一等偏差提出了修正的措施。站在今天的高度来看,这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均是极为有益的。

---

<sup>①</sup> 《八大文件》,第151页。

# 杨献珍同志的生平及主要贡献\*

汪 家 鏐

杨献珍同志 1896 年 7 月 24 日出生于湖北郧县安阳镇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1916 年考入国立武昌商业学校,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汉第三区区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后经社会各界人士营救,于 1929 年 7 月被无罪释放。1929 年 9 月,杨献珍去上海,在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的沪滨书店任编辑,并为党团成员。1930 年 9 月,杨献珍离开上海,赴河南开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以教书为掩护,团结、教育进步师生。

1931 年春,中共中央派杨献珍到华北开展政治情报工作和营救被捕的顺直省委负责同志。7 月到北平,在与党的关系人接头时被东北宪兵司令部宪兵逮捕。在敌人的一再刑讯逼供面前,他坚贞不屈,没有向敌人泄露丝毫机密。在狱中,他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向敌人展开了长期、艰难、复杂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

\* 本文选自汪家鏐同志 1996 年 9 月 19 日在纪念杨献珍同志诞辰 100 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题目为编者所加。

1936年9月，他在党的营救下出狱。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薄一波等同志前往太原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了“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杨献珍作为该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根据党的指示，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参加实际上由我党掌握的“军政训练班”、“民众干部训练团”的工作，利用山西当局的口号和政治术语，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其后，他还分别担任决死队第三纵队随营三分校主任、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校长、山西第五专署党团成员、秘书长等，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1940年1月，杨献珍调任北方局秘书长，不久，兼任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任。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党校教育生涯。此后，他曾先后担任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马列学院教育长、副院长，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中共中央党校顾问等。从1940年起，杨献珍长期从事党校工作达半个多世纪，这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献珍十分重视和热爱党校工作，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努力奋斗，付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30年代初，在北平敌人的草岚子监狱中，杨献珍就作为狱中支部的学习干事，组织难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亲手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论民族问题》等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供同志们学习,从而使一所敌人用以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变成了共产党人的“狱中党校”,杨献珍则成为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教员。多年后,许多当年从敌人监狱出来的老同志还十分怀念他、崇敬他。

1940年他担任北方局秘书长时,就开始在北方局党校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事党校工作后,他在担负领导工作的同时,担负了大量的教学工作,并积极探索党校教育的特点和规律。1953年,他担任马列学院副院长时,继承延安中央党校的优良传统,总结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积累的经验,提出了“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为尔后党中央批准制定的全国各级党校的教学方针奠定了基础。杨献珍非常重视从世界观方法论方面武装和提高干部。他从切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实际工作的成败,关键取决于广大干部能否实际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自己的哲学教学和理论活动中,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联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大力宣传科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同时,他非常注重把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上升到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加以分析,从两种宇宙观、两种历史观、两种思想方法、两种领导方法、两种工作作风的对立中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使学员深受触动、启发和教育。为了提高党校的办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杨献珍注意广泛地学习吸收各种知识,应用于教学工作中。他经常深入

实际,调查研究,深入学员,了解情况,从而能够抓住学员的思想症结,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使教学工作具有高度的理论性、思想性和针对性。多年来,听过杨献珍的课,受过他直接教诲的干部难以计数。作为一名光荣的党校教师,杨献珍的学生遍布全国,桃李满天下。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杨献珍在深入阐发、实际运用和坚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方面留下了很多重要篇章。他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宣传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而且言行一致、身体力行地坚持和贯彻这一原则。他对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之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的高度,发表了不少批判浮夸风、共产风的讲话和文章。即使为此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政治迫害,他也在所不计,不为所动。他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敢讲真话,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定的党性原则和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人们由衷的敬意。杨献珍在理论研究活动中勇于探索,富有创见,在许多哲学学术问题上发表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提出的这些见解,虽然有的引起长时间讨论和争议,但是对于活跃学术研究,发展哲学理论,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应当发扬杨献珍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

杨献珍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国家的富强奋斗了一生。他的一生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是战斗的唯物主

义者的一生。他的道德、文章风范长存。我们今天纪念他，更要向他学习。



# 杨献珍的风范

萧 岛 泉

杨献珍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家。他有着光荣的艰苦卓绝的从事地下工作和监狱斗争的历史。他一生对党对人民贡献很多,但最大的贡献在教育。他长期担任党校的领导工作和教学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和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就在他的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他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和灾难。

1959年,这是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的岁月;也是杨献珍自称他“闯祸”的岁月、遭谴的岁月。此时的共和国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狂潮激烈的驱动下,全社会几乎完全失去了理性,刮起了一股虚报成绩、谎报产量、侈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浮夸风、共产风;在经济领域里,经过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而积累起来的并不富裕的工业原料和粮油产品,在打擂比武竞相攀比的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的大跃进的热浪中,被糟践、被消耗得已所剩无几。一个数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国民经济面临大滑坡的境地。然而,被“造神运动”所煽动起来的近乎疯狂的所谓“群众热情”,却难以冷却下来。就在人们

被三面红旗折腾得头晕目眩，七颠八倒的时候，杨献珍依据自己所到之处的实地考察，敏锐地觉察到了大跃进已经并且还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深刻的危机和沉重的灾难，他不惜承担一切政治风险，毅然挺身而出，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在接见各地党校负责干部的谈话中，在应社会各界之邀所作的演讲中，对大跃进、三面红旗给国计民生所造成的灾难予以有力地剖析和深刻地批判，他尖锐地指出：“大跃进是胡想、胡说、胡干。”大跃进是“吹牛”、“说大话”，“现实中尽是弄虚作假”，“搞得乌烟瘴气”，“大跃进带来大紧张”。“1958年像发了疯的钢琴一样”。“从大跃进以来老百姓没有吃过一顿‘顺气饭’，我国当时土地上的肚皮外的都不是自己的。”“钢铁粮食都是硬东西，说假话是办不到的。钢铁是一吨一吨炼出来的，粮食是一粒一粒长出来的。有人想学孙悟空，拔一把毫毛一吹，要啥有啥，可惜孙悟空的本领失传了，没有学会。现在我们缺的是真铁真钢，不是缺少假的钢铁卫星。社会主义不是靠吹牛吹得来的，而是靠一点一点建设起来的。”“这几年我们出了不少共产主义的书呆子和吹牛家，亩产几万斤，高指标，吃饭不要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几年，什么话大就说什么话，说大话不要花钱买。比如定一个指标，根据什么？他们什么也不根据，嘴一张，猛一喊，虚报产量，在粮食收下后，叫群众敞开肚皮吃，结果到今年春天粮食不够吃，有的干部没办法，愁的哭。我看他们粮食不够吃，应该叫他们吃卫星。”“开始放开肚皮吃，以后勒紧裤带吃，这样一松一紧也是

对立面的统一嘛！”“离开唯物主义的敢想、敢说、敢干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刮‘共产风’就是这样来的，已经造成了恶果，而今粮食紧张情况就是这种恶果，就是在受离开了唯物主义的惩罚。”“我们大跃进的成绩，也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他们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作任何事情不要任何条件，那就是无条件论。”“这几年有的地方就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我们的历史，随心所欲地干，不管客观实际情况，不从实际出发。去年创造了好多规律，如再造更多的话，恐怕连包谷面也吃不上了。”“去年刮共产风的时候，我们有些人把平均主义当成共产主义，或者把共产主义当作平均主义，这个和马克思所说的科学共产主义有什么相干呢？这是毫不相干的。这不是在搞共产主义，是在糟蹋共产主义。还有些人把共产主义看成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不分析我们在经济上成熟的程度，不要任何物质基础，凭脑子一热，凭主观愿望，嘴一张，说要进入共产主义就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唯心主义是什么？”“去年那股‘共产风’刮得实在不好，如果还有点好处的话，那就是给学习唯物主义提供了丰富的反面教材，使人们从中深刻体会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所给予人民利益的危害是如何的大。”“甘肃省提出：农民无产阶级化，那就是要革农民的命，把农民弄得干干净净。‘无产化’让农民穷死。群众没有吃的，那就完了。农民指着干部说我们饿死了，你们也快了。”1959年，杨献珍到河南看望下放干部，想要回家看看，但又下不了决心，他说：“我想回又不想回，主要是农村太苦，无颜见江东父老。”

“大跃进三面红旗式的共产主义，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伪共产主义，它实际上是十八世纪末在欧洲流行过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化。原始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即绝对平均化地实行财产的人人占有，对于不能平均分配的物质财富，就毁灭了它，是毁灭文明，倒退的反动空想。”“这种共产主义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不如，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为了讽喻那些热衷于鼓吹假共产主义和“造神运动”的人们，杨献珍甚至用心良苦地以讲民间故事的形式来说明原始共产主义的危害。他说：从前有一个戏班子到农村去巡回演出，这个戏班子里有一个花旦，长得漂亮，戏也演得很好。村子里的一群戏迷（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追星族）都很崇拜他。演出结束后，戏班子都搬走了，但村子里的那些戏迷们就像丢了魂似的，恋恋不舍，心里一直不得安宁。有天，一个戏迷跑到戏台周围转悠，指望侥幸能够捡到那个花旦一点什么东西，作个纪念。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忽然，他眼睛一亮，在一个角落里他发现了只便壶，是那个花旦丢下的。他欣喜若狂地把这只便壶悄悄拿回家中藏了起来。但此事后来不知怎么被其他一些走火入魔的戏迷们知道了，便纷纷向那个戏迷索要这只便壶。大家你争我抢，搞得不可开交。没有办法，于是，大家决议，这只便壶，谁也不能据为己有。为了使所有戏迷都能得到这只便壶，他们最后决定把这只便壶砸碎碾成粉末，投入井中，以便大家在饮水时都能品尝到便壶的滋味。杨献珍就是这样毫不留情地用他那警

愚醒顽、振聋发聩的言论去唤醒人们不要相信那些假马克思主义、假共产主义者的欺世盗名，蛊惑人心的宣传。

然而，可悲的是，就在杨献珍向人们揭示“叫花子”式的原始共产主义，批评“大跃进”是唯心主义的胡吹、说谎，沽名钓誉、弄虚作假，随心所欲创造历史、随心所欲创造规律的时候，有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理论家、政治家、科学家们，却在那时通过各种舆论媒体鼓吹“一穷二白”的中国，正在一天等于20年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从理论上，实践上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合理性、科学性寻找根据。“明月在天无人仰视，流星落地惊得鸡飞狗跳。”在全国上下只有一种声音，万支歌曲只有一个音符的时候，杨献珍竟在此时“不识时务”地挺身而出，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另唱一支歌曲，这自然会被那些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人物所不容，从而被他们视之为“大逆不道”、“怪物异类”，成为他们批判攻击的靶子。

果然，时隔不久，一场横祸便降临到了杨献珍的头上，是年的7月7日至8月1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此次会议上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地展开了批判斗争。庐山会议后，于同年的11月间，在康生的指使下，中央党校对杨献珍也发起了批判斗争。康生通过其妻子曹轶欧之口，在中央党校批判杨献珍的会议上讲：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是“山上山下，一文一武。”真是“立片言以居要”。

康生之妻所说的山上山下，一文一武，不用解释人们自然明白指的是彭德怀和杨献珍。1960年3月化名为撒仁兴的关锋发表文章就公开声称：“正在开展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问题的论战，其目的就是批判把我们前进中的、暂时的缺点，看作是唯心主义世界大问题而大嚷大叫，对大跃进吹毛求疵地挑剔，以至否认大跃进的杨献珍”。曹轶欧在中央党校批斗会上吠声，撒仁兴在社会上吠影，于是会内会外，弓弩箭矢，一齐向杨献珍猛烈地袭来，直打得他身心交瘁，力不可支。这是一幅何等悲凉凄绝的战斗啊！时隔30多年之后，当我们回顾这场“斗争”时，我们清楚地看到：两军对垒的形势实在是太不成比例了。站在杨献珍对面的是浩浩荡荡，气势汹汹的围剿大军，他们手持权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直逼杨献珍这位形单影只，茕茕孑立的年已67的衰翁，而站在杨献珍这边的也不过只有二三勇士，尽管他们也拥有无数同情者，拥护者，但在当时那种言论罪、文字狱炽盛的岁月，却少有敢于步其后尘的追随者和参战者。如果说“两间余一卒”的情境，曾使当年的鲁迅“荷戟独彷徨”的话，那么，现在作为被批判的一方，杨献珍竟连彷徨的余地也被剥夺得干干净净了。更令人可悲的是，像杨献珍那样受到口诛笔伐的人，恰恰代表着坚持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性和良知，而那些依仗权势，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向理性和良知大张挞伐的人，却无不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作践、破坏马克思主义的声誉。

“宁做比干刚强谏死，不做箕子佯狂自全。”<sup>①</sup> 杨献珍在经过了9个多月的被批被斗之后，又被错误地罢了官，由中央党校校长、党委书记降为副校长、副书记，但他不抑郁，不沉沦，意志不摧，精神不垮，锐气不减，相反，他经过亲赴陕西、新疆等地实地调查研究后，大量的事实使他更加坚信了自己立场、观点的正确性。1961年8月8日，在祖国的边陲城市乌鲁木齐杨献珍应新疆各界人士之邀，发表演说时，再一次大声疾呼：“要好好学习唯物主义，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在哲学上是意识自由论。‘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是这种哲学在实际工作上的表现。”“要从实际出发，办事情没有条件不行，前几年批什么‘条件论’，那是以唯心主义批判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要经常讲，否则就会瞎指挥，胡思乱想。以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历史唯心主义代替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搞下去，非出乱子不可。”事实上，乱子已经在许多地方出了。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在当时的不少地方已经发生了。“青海小麦亩产8000多斤，出了一个卫星，全省亩产就按8000计算了，这样粮食过关了，人却过了鬼门关。”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带来的结果迫使

---

<sup>①</sup> 据《史记》记载，商纣王有三个贤臣，名韦子、箕子、比干。后因纣王昏庸，韦子只得逃走，箕子亦装疯，以保全性命，比干则因中肯直谏，被纣王剖腹掏心而死。“不做箕子佯狂自全”即不像箕子那样，佯装神经失常而保全性命。

人们不得不进行冷静的思考，加上当时取代杨献珍出任中央党校的老资格的革命家王从吾的力排众议，积极支持，从而使杨献珍重登中共中央党校的讲坛，使之有了能够继续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和维护其一代哲人风范的机会。

此时已年近七旬高龄的杨献珍，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他不只继续批判大跃进、人民公社，指出：大跃进以来，我们经济工作越搞越死，农民的生产路子越来越窄，经济工作犯了死症，一购什么，什么就少，少了什么，就统什么，越统越少，越统越死，光是统只统不放，或者只取不予。现在有的人说我们对农民是“竭泽而渔”，我看岂止是“竭泽而渔”的问题，简直是“竭海而渔”了，农村工作犯了死症，就是不懂辩证法。而且还公开宣传中国应当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批评一些人因害怕资本主义而反对农民求富的欲望和行为。他说：“列宁关于农民站在十字路口的说法，现在情况变了，不能那么看，农民是坚持走社会主义的，不可能再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有一种思想怕社员富起来，社员不富公社如何富？古语说：‘民强则国富’。民不强国家怎能富得起来。”“资本主义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就会产生。有人在市场上，十几块钱买一只鸡，他就发展起资本主义吗？”“什么投机倒把？赚几百元算什么？中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些资本主义生产中好的东西，我们不懂得，我们对资本主义生产中一些办法不能一概否定，我们没有这些东西。”这几年这也怕资本主义那也怕资本



主义,怕的什么东西都不敢搞了,我们吃大亏啦!在总结经验时,这一点大家都要理解。”

杨献珍讽喻的“一铺一盖,一碗一筷,叫花子式的共产主义”,本来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讲的,知者有限,但经过批判家的批判,却不胫而走,名扬海内外。现在他重登讲坛,在中共干部中立即引起极大的轰动,于是在他演讲时,不仅在京津的干部趋之若鹜,坐无虚席,场场爆满,而且竟有人以旁听者的身份乘飞机从外地赶到北京听他演讲。不独如此,在那些日子里,杨献珍不仅坚持自己的观点为自己翻案,而且还以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姿态亲自登门访问知情者,搜集材料,准备为中央党校的右派分子平反。他说:“这几年的政治运动,不是有什么反什么,而是反什么有什么。1957年反右派时,中央党校定了一个标准,中央书记处一讨论,我们顶不住,又划了一批,后来又搞了第二个标准,结果又冲垮了,现在要纠偏,这就对了。这几年的政治运动都搞坏了,是主观主义的。三反是典型的不实事求是。”“这几年党内最大问题是不能说话;谁也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动不动扣一个右派帽子,谁不害怕。1959年的反右倾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感觉的复合,马赫主义。混淆了党的思想斗争问题的性质,采用了敌我斗争的方式、方法,重复了党内历史上曾经犯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中央党校1959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是一次是非不清,黑白颠倒的运动。当时,中央党校干部思想中主要偏向是‘左’,却确定以反右为中心,这实际上是以错误反正确,助长了党的左倾情绪的继续

滋长，一些敢于坚持真理和敢于顶歪风邪气的同志受到了斗争、批判，戴上了右倾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几年干部可是受苦了、遭劫了，老实人挨批挨斗，投机钻营的人升官发财。”杨献珍的这些翻案言论和行动，曾经受到中央党校许多教职员工的拥护和支持，但是，他那里知道翻案之举谈何容易！

1962年9月，中华大地上响彻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吼声，阶级斗争的强大政治气流吹散了杨献珍的“翻案风”。1964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开始席卷中国大地。在这个政治风暴的中心北京，它的主要打击目标就是批判斗争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何谓“合二而一”？简言之，“合二而一”就是杨献珍从中国古代大思想家的思想中寻找到的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立统一规律”思想的一种方式。人所共知，杨献珍是一位勤奋好学，治学严谨，又富有创新意识，进取精神的哲学家；即使在以往教条主义现代个人迷信炽盛的极左路线统治的年代里，杨献珍也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合二而一”就是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理论家，深入思考而得出来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的由来是：50年代，中国出版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和《谈谈辩证法》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列宁讲到了对立统一规律问题。杨献珍读了列宁关于：“统一物之分为两部分以及对

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以及经列宁引证并肯定的裴洛的“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论述后,受到了极大的启发,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部分”,用中国话说,岂不就是“一分为二”,“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岂不就是“合二而一”吗?由此他联想到对立统一规律是一个普遍规律,那么,既然这个规律在古代希腊的大思想家的思想中有所反映,也必然会在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思想中有所反映。但中国古代思想家是怎样反映这种规律,怎样表达这种思想的,他却一直没有发现什么史料。1961年2月下旬,杨献珍在被错误批判斗争了九个月之后,到陕西的临潼县农村调查研究。五月初,他的腿部受伤,不能行动,住进了西安的陆军医院进行治疗。在医院期间,他托西安市委的同志借阅了西安周围附近几个县的县志。在阅读兰田县志时,他发现上面有一条记载,说宋朝晁公武的读书志上讲,兰田吕大临著有《老子注》,阐述了老子的“合有无谓之元”的思想,使他受了启发,认为这一思想和黑格尔的“存在和无的统一或不可分性提供转化生成”是类似的。以后他又从明朝方以智的《东西均》一书中,发现有“合二而一”的提法,进一步引发了他对辩证法表述的思考,认为这正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对立统一规律思想的一种表述方法。后来,于1964年他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给新疆班学员讲课时,便第一次讲授了“合二而一”的思想,他说:“什么叫对立统一规律?中国有句古话叫‘合二而一’。在认识论里,有‘一分为二’这句话,同上句是一个意思。‘合二而一’是世

界观，‘一分为二’是方法论。”“辩证法不应当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不应当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二而一’，辩证法只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只要斗争性，不要同一性，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的理论，是阉割了辩证法的全面性，因此是打人的理论。”“列宁讲的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而且对立面的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而斯大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现在我们有些同志也不大了解；还是形而上学，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杨献珍的这些观点本来是正确的，无可非议的，而康生却把这个问题硬上纲成为“反党”、“修正主义”的政治问题。由于晚年的毛泽东正以“一分为二”的哲学命题，作为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因此，当康生向毛泽东汇报到杨献珍的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当即说：“这是反对我的。”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强调：“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一场全国性的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便铺天盖地地向着杨献珍扑了过来。

批判“合二而一”的运动，是在阴谋家、野心家、理论恶霸康生的直接策划、指挥下进行的。运动初期，康生之流，为了达到他们“引蛇出洞”的罪恶目的，在首都的报纸上还给“合二而一”披上了一件学术讨论的外衣，以诱惑

更多的人上钩,果然,时过不久,全国各地一批天真善良的哲学爱好者便纷纷向新闻媒体投寄稿件,表示支持赞同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的观点,而中了康生之流的毒计,从而成为批判“合二而一”运动中的牺牲品。在全国各地数以千百计的从未与杨献珍谋过面的、仅仅在文章和言论中表示同意他的观点和同情他的不幸遭遇的人,统统被扣上杨献珍的“应声虫”、“吹鼓手”、“合二而一”分子等等各种离奇古怪的罪名,或被批斗,或被开除公职,或被下放劳动改造,有的甚至被判处徒刑,监禁坐牢,长期遭受摧残折磨。在中央党校当康生之流假借学术讨论的名义,诱人入瓮的把戏表演结束,转入实质性的批判斗争之后,那些批判家们便立即撕去其假面具,穷凶极恶地把几位赞同“合二而一”观点的教师和杨献珍的秘书推上名为会议实为“公堂”里进行审讯,硬逼他们交待杨献珍是如何利用“合二而一”理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所谓罪行。为了给杨献珍罗织更大更多的罪名,当时中央党校的领导人甚至不惜煞费苦心地将杨献珍过去发表的他们认为能够加以歪曲利用的所有讲稿、文章、言论都锱铢必收、一字不漏地印成批判材料,供那些批判专家们肆意上纲上线,恣意想象发挥。其批判的范围,远可追溯到杨献珍 1940 年撰写的那篇著名的揭露阎锡山在抗日战争中背信弃义、反共降日罪行的《论十二月政变》的文章,近可批判到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争论中的观点,凡是能把杨献珍衍化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反革命分子者,就可

以被誉之为“党的好干部”、“积极分子”，就可以因此而立功受赏。通过这些无情的批判和斗争进一步将在屡次哲学论争中站在杨献珍一边的校内外的哲学工作者以及广大支持、赞成、同情杨献珍观点的各方面的人士悉数收入他们的网罗之中，然后一一加以清算和惩处。一时在校园里学员停止上课，职工停止上班，几乎天天都在开批判会，搞逼供信，人人胆战心寒，个个惶恐不安，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校园。那些曾经在“翻案风”中为杨献珍鸣冤叫屈的党校干部，从副校长侯维煜到普通教职员工，或被编织进杨献珍“反党集团”之中，备受歧视冷落；或被贬谪到外省外地，或被下放劳动改造。康生之流竟把他们对杨献珍的这场批判，美其名曰哲学战线上一场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论战。遗憾的是，古今中外的所有论战的历史，却从未有过这样“战而不论”的论战，在整个论战的全过程中，人们只看到康生之流单方面的名为批判，实为污蔑、攻讦，蛮不讲理的声讨檄文，而没有听到杨献珍本人只言片语的申辩，更没有人为他写过一篇辩护论文，有的就是经过这次大批判，在全国制造了一桩又一桩，一件又一件的奇冤错案。这一遍及全国的冤假错案也同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冤假错案一样，是对科学与民主，理性与良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次猖狂的挑战和天大的讽刺。

杨献珍善良执着，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一贯思想，认为哲学的基础问题，就是我们实际工作的基本问题。坚信“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

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才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原则。”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唯心主义只能为一切丑恶现象提供理论根据。一个政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正确与否，不取决于为上者之圣明，而取决于是否符合唯物主义。因此，他的哲学思想，理所当然地被视之为异端邪说和大逆不道而横遭批判和斗争。杨献珍襟怀坦白，心地无私，他始终坚信共产主义，坚信唯物主义原则，即使在身陷囹圄之时仍矢志不渝，操守如一。1977年，历经8年牢狱之灾的杨献珍，旋即又被流放于陕西潼关的黄土高坡被软禁了起来。在那里他曾向一位远客陈述道：“我从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从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我反对的只是那些背离唯物主义和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胡作非为。害我者康生，非毛主席也。”是年已年逾80高龄的杨献珍曾经演出过一出又一出感人至深的悲剧。此时他再次给人们留下了不同寻常的悲剧性的韵味。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生为追求真理而久历磨难的杨献珍直到他的晚年终于理解了呼唤理性，良知和党性，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1989年4月，杨献珍以他的垂暮之年在病榻上和一位造访他的记者就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问题作了两个小时的长谈。他感慨地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封建主义制度长期统治着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封建社会中脱胎出来的。”“回顾建国几十年来，在学术、理论界发生的一次又一次的不幸事件，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民主便没有科学。学术理论上的不同主张不同观点应该允许批评与反批评，通过心平气和，充分说理的办法进行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先搁置起来，让实践去检验是非，让历史去辨别真伪。一定要区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不要把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这是伏尔泰老先生的一句名言。作为从事学术理论研究工作的人员，都应当有此气魄和雅量。要坚决反对长期存在于学术理论界的学阀风气和恶霸作风，动不动给自己的论敌扣帽子，打棍子，搞无限上纲，把对方一棍打死的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手中挥舞打人的棍棒，动辄就想置人于死地的人，其实正是那些胸中无点墨、手中无真理的人……”杨献珍的上述言论，正是他在逝世前三年找到一条中国哲学贫困的道路。

杨献珍是中国的一个真正的哲人。今年是杨献珍诞辰100周年，也是他逝世四周年。现在杨献珍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人们总认为他仍活在我们中间，就像他家乡的那座武当山峰，永远满目青翠，永远伟岸壮观，永远驻留人间！

附记：

1992年8月25日杨老不幸仙逝后，我曾和杨老的前任秘书马鸿谟同志商议，决定以我们俩人的名义撰写



一篇悼念杨老的文章，并且酝酿了一个提纲，搜集了一些材料，然后由我执笔写就了此文的草稿，草稿完成后本欲再同鸿谟一起共同切磋修订好此文的，但孰料鸿谟同志后来身染重疾，数年不愈，以致于今年3月29日不幸离开了我们。现在当我终于完成这篇纪念杨老100周年的拙文时，不禁使我再次忆及我与鸿谟同志的友谊以及他对我工作上的支持与帮助。故此，我在这里特记下这段文字，藉以表达我对鸿谟同志的深切怀念与哀悼。

萧岛泉又及 1996年9月

# 长征中的《红星报》

孔宪东 顾 鹏

《红星报》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于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办，为铅印四开、毛边纸印刷，邓小平、陆定一先后任主编。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长征开始后不久，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和行军作战的便利，决定将千辛万苦从根据地搬来的机器诸如电台、X光机、发电机等忍痛埋掉或扔掉。《红星报》社也按照上级的统一安排，丢弃了曾为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铅字印刷机，从此两根扁担、四只箱子，四五个人组成的《红星报》社紧随党中央、中革军委又踏上了漫漫征途。长征途中，他们坚持一边行军，一边出报，由铅印改为刻蜡版油印，在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仍坚持10天左右出一期，每期多数保持两个版面，印七八百份发到连队。总计在长征前后3年多的时间里，共出版100多期，长征开始后它又是仅存的一份中央级报刊。《红星报》极大地鼓舞和激发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高昂革命斗志，为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充分发挥喉舌作用，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

政治家办报，这是办好报纸的重要条件。《红星报》办报的宗旨在创刊号的“见面话”中便予以了明确阐述：它是一面“大镜子”，要反映红军的生活、工作；是一架大“无线电台”，要传播红军、地方以及全世界革命斗争的消息；又是一个“政治指导员”，要帮助红军指战员提高思想、改进工作；要把它办成“政治讨论会”，无论思想工作、文化教育、红军生活等等，都可以在报上展开讨论。特别是在革命转折的重要历史关头，《红星报》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辨明是非，同王明的机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坚定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以《红星报》主编的身分列席了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党的遵义会议在清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的同时，要求红军政治工作必须迅速“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和加强党对各红军部队与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为了保证红军广大指战员切实领会和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红星报》以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为指导，连续发表了《在新的环境下的政治工作》、《用我们的铁拳消灭蒋介石的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面胜利》、《为创造云贵川新苏区而奋斗》等社论，及时宣传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其中，在1935年2月19日第10期上，《红星报》全文刊载了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决议案》，号召全军“一切拥护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坚信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的正确结论与领导下，一定能团结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领导全体红军战士在广大的运动战中，争取伟大的胜利”。《红星报》代表全体党员表示：“一定以最大的努力向全体战士进行充分的解释”和“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和红色战士的积极性”，坚决夺取“战争和创造新苏区的胜利”。各部队在《红星报》的大力宣传教育和感召下，一扫焦急悲观失望盲然等情绪，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精神，坚定了革命胜利的信心。遵义会议以后，陆定一替代邓小平担任了《红星报》的主编。《红星报》继续保持其特色，以宣传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方针政策为己任，同时又以简短的新闻和生动活泼的通讯，及时报道红军胜利的喜讯，并适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经验教训的分析与总结。

### **激励广大指战员在长征中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精神**

红军长征是在行程二万五千里的广阔地域、自然环境极端恶劣，天上有敌机、地上有强敌围追堵截的情况下进行的，战斗之残酷，困难之严重，生活之艰苦都是无法想象的。这就要求红军在政治思想上，更需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保持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和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这既是严峻客观形势的需要，也是红军长征中《红星报》的中心政治任务。1935年5月，为了粉碎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的阴谋，在四渡赤水、威逼贵阳、巧越金沙江的作战中，《红星报》明确指出当前的政治工作“主要是进行作战的鼓动，最高度的提高战斗情绪，一定要有把握的打胜仗”。同时强调指出：“解释与鼓

动的工作单靠一两次会议是不够的，要利用各种方法，特别是行军时的政治工作，针对红色战士的情绪、疑问与不了解，进行不断的解释与教育”，给予作战中的红军以很大的鼓舞和及时指示。红军以一部抢渡大渡河后，又沿河北上，抢占泸定桥，掩护主力中队渡河。泸定桥是座铁索桥，连接着泸定城，守敌在我军到达之前，已拆掉了铁索上的木板，只剩下十几根铁索链悬空在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在这种情势下，红四团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充分发扬了英勇牺牲精神，纷纷要求参加夺取泸定桥的战斗。最后红四团二连的 22 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夺桥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横空的铁索链向对岸冲去，英勇地穿过敌人在桥头燃起的火海，占领了大桥，为红军北上打开了前进的道路。红军跨越天险大渡河的胜利消息传来，《红星报》立刻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我们已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的报道和社论，并以四个小标题分述了“四个先头团的英勇战绩”，其中着重详述了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经过。此期《红星报》分发到连队后，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指战员展开了大讨论，纷纷向党组织宣誓，决心坚决跟党走，坚决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坚决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坚定信心夺取最后胜利。1935 年 6 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确定了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星报》及时载文，号召各部队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具体解释北上的意义，同时还要求各部

队制订出具体的政治动员计划。在此号召下，各部队纷纷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

### **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宣传，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

红军长征经过的广大地区大都是新区，有的还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群众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不了解，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他们普遍对红军存在着怀疑、恐惧心理。因此，能否成功地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是关系到能否战胜困难险阻，胜利完成长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1934年11月4日，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在《红星报》发表了《红军是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的社论。社论要求红军对群众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应“首先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的基本主张的宣传”和“建立地方党与群众组织的基本工作”。11月25日，《红星报》又发出了《健全连队写标语竞赛》的口号，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将这个工作“先在连队深入的动员，并严格地督促实行”。这就有力地加强了党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有效地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鼓舞了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红军进入云贵川边后，针对该地区比较贫穷落后的状况，《红星报》及时发表《怎样来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一文，号召部队要认真执行党和红军的群众纪律，认真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各单位在派出找禾草火把的人员中至少有一名是政治战士，“保证对群众进行充分解释工作”，不致“损害群众利益”。正是由于红

军严格地执行群众纪律，这才真正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拥护，新区人民彻底认识到了红军是自己的部队，纷纷担粮送肉慰劳红军。当红军开进仁怀县城时，“仁怀的劳苦群众派出了代表五十余人，其中一半是工人，抬了肥猪三只，茅台酒一大坛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并明确表示“红军在遵义桐梓的一切事情，我们都清楚了，红军是保护我们乾人的军队”。正缘于此，许多青年群众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仅在遵义短短十多天内，就有4000多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使红军从物质到人力上都得到了迅速的补充和扩大。

针对贵州、云南等省多民族的特点，总政治部在《红星报》上发出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及对瑶苗民的口号》，指出：红军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的剥削，主张汉民与瑶苗民的民族平等，给瑶苗民以彻底的民族自决权。1935年4月10日，红军长征即将进入彝民区。彝族人民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军阀的欺凌，对汉人存在着极深的成见和敌视，他们特别反对汉人官兵入境，而红军要抢渡大渡河，就必须以最大努力争取彝族群众的支持，顺利通过彝族区。在继总政治部发出《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的指示后，5月22日，《红星报》发表社论，动员红军各部队“百倍争取彝民的工作，采用各种方法找寻他们的线索，与他们发生密切的关系，抓住他们反军阀的热情，组织彝民游击队，团结他们在我们的周围”。与此同时，还具体要求：每个战士送一件礼物给彝民；争取彝民当红军，扩大彝民游击队；绝对不打彝民的土豪；严格遵

守红军的纪律,不脱离彝民群众;每个连队与驻地彝民举行联欢。《红星报》这些宣传教育,有力地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又有力地保证了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区。

### **动员红军做好物质工作,切实保障部队战斗力**

针对一些部队中不少战士打赤脚的状况,《红星报》于1934年11月14日在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评论。指出:“解决部队中的草鞋问题,在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上,占着重要的位置”,要求各部队的“政治机关和供给部门应马上提出具体的办法来解决草鞋问题”。评论同时还提出了可供部队采用的三种方法,并强调“政治机关必须从各方面来保证这些办法的实现,做到没有一个打赤脚的”。

1935年3月,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河的胜利后,针对天气逐渐变热,部队一直处于频繁转战的情况,《红星报》又不失时机地对部队进行了《不喝生水不生病》的宣传,强调了注意卫生,不喝生水不生疾病对于巩固部队战斗力的意义。要求全体指战员“每人做个竹筒,装开水路上喝”,“为巩固我们的战斗力而斗争”。

红军北上途经的川西地区,人口稀少,给养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食极其缺乏。为了进一步提高广大指战员对于筹措粮食的重要意义的认识,《红星报》及时地总结了红六团担任探路先锋进入草地失败的教训。红六团由于没有做好必要的粮食准备工作,出发的头一天走了110里路,只吃了一餐野青稞和炒麦子,第二天没吃饭就



匆匆出发,在饥饿和疲劳中两次同前来袭击的藏族上层反动统治者的骑兵进行激战,不能支持而被迫后撤。对此,1935年8月3日,《红星报》在介绍红六团在草地英勇作战的同时,发表了《为筹集粮食而斗争》的社论。社论指出:红六团这个教训“是值得拿来警惕我们的”,“因此筹集充足的粮食,是当前极重要的战斗任务”。社论同时强调指出,在粮食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仅准备对付可能较好的环境,而且要准备克服可能的最坏的环境,努力“战胜当前的粮食困难”。在《红星报》的大力倡导宣传下,红军各部队纷纷行动起来,开展了筹集粮食的竞赛活动。为了抓好这个工作,还专门成立了筹粮委员会。各部队筹集粮食工作的开展,为广大指战员发扬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为红军顺利翻过雪山走出草地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其中《红星报》功不可没。

### **对部队大力进行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意义与加强团结的宣传教育**

1935年6月12日,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后,总政治部于13日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汇合后政治工作的指令》,要求中央红军各军团政治部迅速“传布已经与四方面军汇合的捷报,提高红色战士的情绪”。6月15日,《红星报》专门开辟了“学习红四方面军以少胜多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发扬红一方面军机动灵活猛打猛追的特长!”的专栏,加强对一、四方面军会师的伟大意义和促进两军团结的宣传。在专栏中,《红星报》发表了《伟大的会合》的社论,兴奋地指出,两军的会合是“历史

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发展的基点”。同时，还刊登了总政宣传队谱写的《两大主力会合歌》，组织红军各部队进行认真的教唱。为了促进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加深红一方面军对红四方面军的了解，《红星报》还在这个专栏中发表了《向野战军介绍一下红四方面军》的文章，从红四方面军的产生、反“围剿”的胜利到长征以来的胜利等六个方面，向红一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作了详细介绍。随后，《红星报》又在这个专栏里，全文刊登了红一、四方面军首长分别代表所属全体指战员相互慰问的致敬电。《红星报》的这些宣传教育，有力地促进了两军指战员对胜利会师的伟大意义的认识和相互了解，为增强两军的团结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5年8月4日，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经草地继续北上。由于战争环境进一步恶劣，《红星报》在8月3日出完第26期后被迫停刊。

# 历经长征的新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名录

谭 铮

## 一、历经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

### 正军职以上主官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红军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建国后授元帅军衔);周恩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军委红军大学、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建国后授元帅军衔);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博古(即秦邦宪,中共中央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洛甫(即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中革军委委员);

叶剑英(中革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军陕甘支队参谋长兼第三纵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建国后授元帅军衔);张云逸(红军副总参谋长,红军陕甘支队副参谋长,建国后授大将军衔);陈云(中央纵队政治委员);罗迈(即李维汉,中革军委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中革军委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央纵队司令员,红军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叶季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军委总供给部部长);凯丰(即何克全,军委总供给部政治委员);贺诚(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建国后授中将军衔);朱良才(大金省军区司令员,军委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建国后授上将军衔);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红军陕甘支队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建国后授元帅军衔);聂荣臻(红一军团、中央红军先遣队、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建国后授元帅军衔);左权(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建国后授元帅军衔);杨尚昆(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总政治部副主任);董振堂(红五军团军团长,红五军军长);李卓然(红五军团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昆(红八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罗荣桓(原红四军政治委员,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授元帅军衔);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红三十二军军长);蔡树藩(红九军团、中央纵队政治委员);何长工(红九军团、红三十二军

政治委员);彭雪枫(红军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司令员);黄甦(红八军团政治委员);吴焕先(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程子华(红二十五军军长、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政治委员);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建国后授大将军衔);张国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建国后授元帅军衔);陈昌浩(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树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建国后授大将军衔);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参谋长);倪志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四方面军后方纵队司令员,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建国后授中将军衔);周纯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建国后授上将军衔);王宏坤(红四军军长、政治委员,建国后授海军上将军衔);许世友(红四军军长,建国后授上将军衔);陈再道(红四军军长,建国后授上将军衔);王建安(红四军政治委员,建国后授上将军衔);程世才(红三十军代军长、军长,建国后授中将军衔);李先念(红三十军政治委员);詹才芳(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建国后授中将军衔);王维舟(红三十三军军长);张广才(红三十三军政治委员,建国后授少将军衔);杨克明(红三十三军政治委员);邵式平(金川省军区政治委员);李干辉(红三十二军政治委员);李特(红四方面军总

指挥部参谋长);郑义斋(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部长,红军总供给部政治委员);何畏(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曾日三(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五军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孙玉清(红九军、红三十一军军长);陈海松(红九军政治委员);余天云(红三十一军军长);罗南辉(红三十三军军长);黄超(金川省军区、红五军政治委员);李彩云(金川省军区司令员);贺龙(红二军团军团长,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主席,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建国后授元帅军衔);任弼时(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湘鄂川黔军区、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萧克(红六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建国后授上将军衔);关向应(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副政治委员);李达(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建国后授上将军衔);甘泗淇(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授上将军衔);陈伯钧(红六军团军团长,建国后授上将军衔);王震(红六军团政治委员,建国后授上将军衔);袁任远(红三十二军政治委员);宋时轮(红二十八军军长,建国后授上将军衔);宋任穷(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建国后授上将军衔);甘渭汉(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建国后授中将军衔);聂鹤亭(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参谋长,建国后授中将军衔);刘晓(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萧劲光(陕甘宁省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建国后授海军大将军衔);赖传珠(陕甘宁省军事部政治委员,建国后授上将军衔);钟赤兵(陕西省军事部部长,建国后授中将军衔);罗瑞卿(红三军团政治部主

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建国后授大将军衔);谢嵩(红二十九军军长)。

## 二、历经长征的人民解放军 高级将领

历尽千辛万苦的长征队伍中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批栋梁之才,许多参加长征的红军指战员后来成为了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在这支队伍中有元帅 9 位: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大将 8 位: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上将 56 位:王平、王震、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韦国清(壮族)、邓华、甘泗淇、朱良才、刘震、刘亚楼、许世友、杨勇、杨成武、杨至成、杨得志、苏振华、李达、李涛、李天佑、李克农、李志民、李聚奎、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张爱萍、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陈奇涵、陈锡联、周桓、周士第、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sup>①</sup>、贺炳炎、郭天民、唐亮、萧华、萧克、黄永胜、韩先楚、彭绍辉、傅钟、谢富治、赖传珠、刘华清<sup>②</sup>、张震、秦基伟、郭林祥、尤太忠、王诚汉、李德生、向守志;中将 156 位:丁秋生、王诤、王必成、王近山、王尚荣、王宗槐、王秉璋、王恩茂、王紫峰、王辉球、王道邦、韦杰(壮族)、文年生、方强、方正

---

① 1955 年和 1988 年两次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② 以下 8 位上将为 1988 年授予上将军衔,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被授衔时则分别被授为少将和中将军衔。

平、邓逸凡、孔石泉、孔庆德、甘渭汉、田维扬、邝任农、皮定均、成钧、毕占云、匡裕民、朱明、朱辉照、向仲华、刘飞、刘忠、刘少文、刘西元、刘先胜、刘兴元、刘志坚、刘转连、刘昌毅、刘金轩、刘浩天、刘道生、庄田、汤平、孙毅、孙继先、杜平、杜义德、杨秀山、杨国夫、杨梅生、苏静、李耀、李天焕、李成芳、李寿轩、李作鹏、李雪三、吴先恩、吴克华、吴法宪、吴信泉、吴富善、吴瑞林、旷伏兆、何德全、邱会作、邱创成、余立金、余秋里、张才千、张天云、张仁初、张令彬、张池明、张贤约、张国华、张经武、张南生、张祖谅、张翼翔、陈康、陈仁麒、陈正湘、陈庆先、陈先瑞、范朝利、欧阳文、欧阳毅、罗元发、罗舜初、周彪、周仁杰、周玉成、周希汉、周志坚、周赤萍、周贯五、冼恒汉(壮族)、郑维山、胡奇才、赵镗、钟汉华、钟赤兵、饶子健、饶正锡、姚喆、驾诚、袁子钦、袁升平、莫文骅、聂凤智、聂鹤亭、顿星云、晏福生、钱钧、倪志亮、徐立清、徐深吉、徐斌洲、郭鹏、郭化若、唐天际、唐延杰、陶勇、萧向荣、萧望东、萧新槐、黄志勇、黄新廷、曹里怀、康志强、梁必业、梁兴初、韩伟、韩振纪、彭林、彭明治、彭嘉庆、覃健(壮族)、程世才、傅连璋、温玉成、曾国华、曾绍山、曾恩玉、谢有法、赖毅、鲍先志、詹才芳、蔡顺礼、廖汉生(土家族)、廖容标、谭甫仁、谭希林、谭冠三、谭家述、滕海清；少将 862 位：丁盛、丁甘如、丁世芳、丁先国、丁武选、丁荣昌、卜万科、于侠、万振西、马龙、马辉、马文波、马忠全、马泽迎、马琮璜、王屏、王谦、王力生、王大华、王万金、王才贵、王元和、王六生、王文模、王云霖、王平水、王世仁、王东保、王永浚、王全国、王



全珍、王远芬、王赤军、王良太、王茂全、王英高、王奇才、王明坤、王定烈、王学清、王绍南、王政柱、王奎先、王贵德、王振祥、王海廷、王海清、王银山、王智涛、王集成、王德贵、王耀南、韦祖珍(壮族)、毛少先、毛会义、毛和发、方正、方槐、方震、方子翼、方升普、方明胜、方国华、方国安、方国南、方毅华、邓岳、邓东哲、邓龙翔、邓可运、邓仕俊、邓克明、邓忠仁、邓经纬、邓家泰、孔俊彪、孔瑞云、尹明亮、甘思和、甘祖昌、石志本、石忠汉、石敬平、石新安、左齐、左爱、龙潜、龙飞虎、龙开富、龙书金、龙炳初、龙振彪、龙道权、龙福才、帅荣、叶明、叶长庚、叶运高、叶青山、叶荫庭、叶健民、叶道友、叶楚屏、卢克、卢仁灿、卢绍武(壮族)、卢南樵、卢燕秋、田厚仪、史可全、冉泽、白志文(满族)、白崇友、冯仁恩、冯丕成、兰庭辉、宁贤文、成少甫、匡斌、吕清、吕仁礼、吕作松、吕黎平、朱火华、朱玉学、朱玉庭、朱士焕、朱兆林、朱声达、朱绍田、朱绍清、朱家胜、朱致平、朱虚之、朱耀华、伍生荣、伍国仲、伍瑞卿、任荣、任昌辉、任思忠、刘义、刘丰、刘何、刘林、刘昌、刘昂、刘放、刘涌、刘彬、刘鹏、刘福、刘镇、刘大煜、刘子云、刘子奇、刘友光、刘少卿、刘月生、刘世洪、刘世相、刘永源、刘发秀、刘华春、刘华香、刘自双、刘兴隆、刘贤权、刘绍文、刘显宜、刘振国、刘振球、刘健挺、刘清明、刘辉山、刘善福、刘禄长、刘锦平、刘新权、刘福胜、刘德海、刘鹤孔、刘耀宗、齐勇、齐丁根、江文、江波、江拥辉、江学彬、江鸿海、江勇为、江燮元、汤池、汤光恢、安东、安志敏、关盛志、兴中、许诚、阳自碧、孙光、孙文采、孙仪之、孙润华、孙继争、孙超

群、杜彪、杜文达、杜西书、杜国平、杜海林、严光、严政、严俊、严庆堤、严家安、巫金锋、扶廷修、苏进、苏鲁、苏鳌、苏宏道、苏启胜、苏焕清、李元(江西)、李发、李贞(女)、李明、李治、李勃、李信、李真、李基、李铨、李毅、李士才、李大清、李元明、李夫克、李开湘、李木生、李少元、李中权、李化民、李长暉、李文清、李水清、李书全、李书茂、李布德、李永悌、李发应、李光辉、李兆炳、李庆柳、李汎山、李呈瑞、李佐玉、李迎希、李良汉、李国良、李国厚、李定灼、李俭珠、李宏茂、李桂林、李振邦、李振声、李致远、李建良、李家益、李资平、李继开、李梓斌、李辉高、李景瑞、李道之、杨力、杨卓、杨森、杨大易、杨中行、杨以山、杨世明、杨世荣、杨永松、杨克武、杨怀珠、杨虎臣、杨尚高、杨尚儒、杨明山、杨国宇、杨树根、杨思禄、杨俊生、杨家保、杨焕民、杨植亭、杨辉图、别祖后、吴西(壮族)、吴忠、吴杰、吴岱、吴烈、吴彪、吴子杰、吴世安、吴仕宏、吴永光、吴华夺、吴自立、吴钊统、吴林焕、吴宗先、吴诚忠、吴荣正、吴保山、吴振挺、吴瑞山、吴融锋、何辉、何云峰、何以祥、何正文、何光宇、何廷一、何运洪、何柱成、何济林、何家产、何能彬、何维忠、何敬之、何辉燕、何德庆、邱蔚、邱子明、邱先通、邱会魁、邱国光、余积德、余非、余成斌、余光文、余光茂、余克勤、余述生、余品轩、余洪远、余致泉、余嗣贵、谷广善、邹衍、邹国厚、邹善芳、闵学胜、闵鸿友、况开田、况玉纯、汪易、汪乃贵、汪东兴、汪运祖、汪洪清、汪祖美、汪家道、宋文、宋烈、宋玉林、宋庆生、宋治民、宋承志、宋维栻、宋景华、宋献璋、张华、张忠、张和、张雄、张瑞、张

力雄、张万春、张广才、张云龙、张元培、张天恕、张开基、张太生、张水发、张书祥、张平凯、张正光、张世盖、张汉丞、张吉厚、张百春、张光华、张廷发、张行忠、张汝光、张志勇、张步峰、张秀龙、张希才、张松平、张英辉、张贤良、张明远、张国传、张宗胜、张宜步、张春森、张树才、张树芝、张荣森、张贻祥、张显扬、张济民、张海棠、张培荣、张铨秀、张新华、张竭诚、张震东、张德贵、张潮夫、张耀祠、陈力、陈宏、陈奇、陈波、陈钦、陈浩、陈彬、陈熙、陈德、陈士法、陈云中、陈云开、陈文彪、陈外欧、陈发洪、陈坊仁、陈华堂、陈远波、陈志彬、陈伯禄、陈其通、陈明义、陈忠梅、陈金钰、陈炎清、陈宗坤、陈宜贵、陈信忠、陈美福、陈美藻、陈挽澜、陈海涵、陈福初、陈福章、陈德先、陈鹤桥、林伟、林彬、林乃清、林茂源、林忠照、林接标、范子瑜、范阳春、范忠祥、范保顺、范朝福、幸元林、欧阳平、欧阳奕、欧阳家祥、欧致富(壮族)、易耀彩、罗云、罗通、罗章、罗斌(江西)、罗元炘、罗仁全、罗文华、罗文坊、罗有荣、罗华生、罗亦经、罗应怀、罗坤山、罗若遐、罗洪标、金世柏、金如柏、金忠藩、金绍山、周涌、周彬、周维、周九银、周长庚、周长胜、周世忠、周发田、周则盛、周志飞、周志刚、周时源、周纯麟、周明国、周学义、周家美、周浣白、郑国、郑三生、郑大林、郑友生、郑本炎、郑旭煜、郑国仲、郑效峰、官宗礼、官俊亭、孟庆山、胡大荣、胡云生、胡正平、胡立声、胡立信、胡华居、胡备文、胡定千、胡炳云、胡继成、胡登高、胡鹏飞、查玉升、查国桢、赵杰、赵俊、赵文进、赵正洪、赵兰田、赵国泰、赵承丰、赵复兴、赵炳伦、赵章成、赵遵

康、赵鹤亭、钟伟、钟池、钟辉、钟人仿、钟元辉、钟文法、钟生溢、钟发生、钟贤文、钟明彪、钟炳昌、钟辉琨、侯正果、侯世奎、段德彰、洪水(越南京族)、姜钟、姜齐贤、祝世凤、胥光义、胥治中、姚运良、姚国民、姚醒吾、贺健、贺东生、贺光华、贺庆积、贺俊侦、贺振新、贺盛桂、秦光远、桂绍忠、桂绍彬、耿锡祥、袁光、袁彬、袁克服、袁佩爵、袁学凯、袁意奋、袁福生、莫春和、贾若瑜、夏伯勋、夏耀堂、钱江、钱信忠、徐斌、徐文礼、徐文烈、徐光友、徐光华、徐体山、徐其孝、徐其海、徐明德、徐国夫、徐国贤、徐国珍、徐绍华、徐德操、殷国洪、殷承桢、翁祥初、郭成柱、郭延万、郭延林、郭卓辛、郭金林、高林、高先贵、高志荣、高厚良、席舒民、唐明、唐凯、唐子安、唐青山、唐金龙、唐健如、唐健伯、涂则生、涂锡道、涂学忠、涂通今、资凤、陶汉章、陶国清、梅盛伟、萧前、萧森、萧锋、萧大荃、萧元礼、萧友明、萧文玖、萧永正、萧永银、萧全夫、萧远久、萧志贤、萧应堂、萧学林、萧荣昌、萧思明、萧新春、萧德明、黄厚、黄萍、黄霖、黄文明、黄玉昆、黄立清、黄有凤、黄光霞、黄连秋、黄作珍、黄忠学、黄忠诚、黄径琛、黄经耀、黄炜华、黄荣海、黄思沛、黄胜明、黄振棠、黄曹龙、黄朝天、黄惠良(壮族)、黄鹤显、黄新友(壮族)、黄德魁、曹广化、曹丹辉、曹玉清(侗族)、曹光琳、曹传赞、曹思明、曹德连、龚兴业、龚兴贵、盛治华、戚先初、常玉清、符先辉、符确坚、康庄、康烈功、阎捷三、梁天喜、梁仁芥、梁玉振、梁达三、韩卫民、韩东山、鹏飞(土家族)、彭盛、彭方复、彭龙飞、彭寿生、彭显伦、彭清云、彭富九、董永清、董志常、董洪国、董家龙、蒋

克诚、覃士冕(壮族)、覃国翰(壮族)、喻新华、喻缦云、程明、程世清、程业棠、程启文、程悦长、程登志、程儒珍、傅传作、傅绍甫、傅春早、傅家选、傅崇碧、焦玉山、舒行、鲁加汉、鲁瑞林、童国贵、温先星、游好扬、游胜华、曾征、曾威、曾美、曾凡有、曾光明、曾传芳、曾旭清、曾庆良、曾克林、曾育生、曾保堂、曾宪池、曾祥煌、曾敬凡、曾新洋、曾雍雅、谢良、谢明、谢斌、谢正荣、谢正浩、谢立全、谢忠良、谢国仪、谢锡玉、谢胜坤、谢振华、谢家祥、谢福林、谢镗忠、赖达元、赖光勋、赖春风、靳虎、靳来川、蓝侨、蓝文兆、蒲大义、雷钦、雷震、雷永通(畲族)、雷绍康、鲍起祥、詹大南、詹少联、阙中一、蔡永、蔡长元、蔡长风、蔡爱卿、裴周玉、廖明、廖步云、廖述云、廖昌金、廖政国、廖冠贤、廖海光、廖鼎祥、廖鼎琳、漆远渥、谭天哲、谭开云、谭友夫、谭友林、谭文邦、谭知耕、谭善和、熊飞、熊奎、熊晃、熊作芳、熊伯涛、熊应堂、熊梦飞、黎光、黎化南、黎东汉、黎有章、黎同新、黎锡福、黎新民、樊学文、樊哲祥、颜文斌、颜东山、颜吉连、颜青云、颜金生、颜德明、潘峰、潘焱、潘世征、潘寿才、潘振武、薛少卿、戴文彬、戴正华、戴克林、戴润生、魏天禄、魏传统、魏国运、魏洪亮、瞿道文、李平、袁渊、段苏权、曾涤、王泮清、曹灿章等。

### 三、历经长征的共和国部级 和省军级以上领导

参加过长征，建国后任部级和省军级以上领导职务

的干部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胡耀邦、丁国钰、卜盛光、于桑、于辉、于江震、马青年（回族）、天宝（藏族）、云广英、扎喜旺徐（藏族）、王星、王斌、王子纲、王文兴、王文章、王幼平、王观澜、王宗金、王定一、王首道、王海山、王维舟、王稼祥、王德润、文建武、方明、孔勋、邓飞、邓禹、邓存伦、邓典桃、邓颖超（女）、石邦智（苗族）、叶子龙、叶季壮、叶树德、左叶、冯文彬、冯雪峰、边章五、成仿吾、邢绍孔、乔加钦、伍云甫、伍修权、伍晋南、任国章（壮族）、任质斌、任弼时、朱光、朱辉、朱开铨、朱涤新、朱继先、池龙、江华（瑶族）、江波、江一真、许金彪、许建国、刘伟、刘英（女）、刘型、刘晓、刘寅、刘亚球、刘向三、刘护平、刘明辉、刘重桂、刘俊秀、刘炳华、刘海清、刘海滨、刘随春、刘惠农、刘瑞龙、阳震、阳焕生、严大芳、苏井观、苏毅然、杜长天、杜华安、杨杰、杨一青、杨玉山、杨东生（藏族）、杨立三、杨奇清、杨尚昆、杨国喜、李立、李轩、李一氓、李井泉、李中一、李长林、李文模、李玉奎、李发南、李先念、李廷赞、李芳远、李克如、李克林、李坚真（女）、李林枝、李卓然、李质忠、李金德、李学先、李培南、李盛财、李维汉、李握如、李富春、吴伟、吴松、吴机樟、吴仲廉（女）、吴亮平、吴溉之、吴德峰、谷志标（白族）、邱一涵（女）、邱仁华、何长工、何兰阶、何明智、何凯丰、宋侃夫、宋裕和、沈仲文、沈振东、沈新发、邵式平、陆秀轩（壮族）、陆定一、陈云、陈光（湖南）、陈光（江西）、陈刚、陈大义、陈行庚、陈志方、陈希云、陈昌浩、陈时夫、陈家贵、陈漫远、张量、张子意、张世功、张平化、张永励、张永清、张如心、张体学、

张良诚、张启龙、张际春、张国坚、张闻天、张琴秋(女)、张震球、张德生、欧阳钦、范希贤、林木森、林月琴(女)、林伯渠、林海清、卓雄、易秀湘、罗明、罗日运、罗志敏、罗青长、罗贵波、金生、金昭典、周龙、周光、周兴、周文龙、周水朵、周光坦、周季方、周素园、周康民、郑位三、孟昭亮、胡正先、胡立教、胡金魁、胡嘉宾、赵友夫、赵发生、赵炳安、饶兴、侯政、侯国祥、钟平、钟枫、钟夫翔、贺彪、贺云卿、贺劲南、贺翼张、耿飏、秦传厚、贾拓夫、夏世厚、夏德义、袁任远、袁福清、翁徐文、钱之光、钱益民、徐以新、徐启文、徐洪才、唐子奇、高峻、郭述申、姬鹏飞、曹西康、曹祥仁、曹菊如、萧鹏、萧贤法、萧春先、萧道生、黄达、黄凯、黄荣(壮族)、黄镇、黄太兴、黄火青、黄立功、黄亚光、黄庆熙、黄赤波、黄英夫、黄松坚(壮族)、黄欧东、黄祖华、黄祖炎、黄继甫、寇庆延、康一民、康立泽、康克清(女)、阎光彩、梁达山、覃应机(壮族)、董必武、蒋光东、蒋学道、彭宗珠、彭胜昔、彭海贵、喻杰、舒同、傅忠海、程坦、程浩、程子华、童小鹏、曾三、曾汉周、曾传六、曾庆梅、曾希圣、曾绍东、曾宪辉、曾继富、谢扶民(壮族)、谢松柏、谢觉哉、谢象晃、强自珍、蓝亦农、赖际发、赖金华、雷经天、蔡畅(女)、蔡书彬、蔡树藩、漆承德、廖生东、廖似光(女)、廖志高、廖诗权、廖承志、谭尚维、谭政文、熊志生、黎光、黎明、颜义泉、潘汉年、潘永堤、潘自力、戴镜元、穰明德、蹇先任(女)、蹇先佛(女)、钟学林、汪荣华(女)、胡定发、朱业奎、马仁辉、赖可可、李干辉、李伯钊(女)、徐特立、徐长勋、冯志湘、李湘、吴忠泰、钟华农、赵炳润、杨宗胜、郑亦胜、李志明(壮族)、

吴建初、昌炳桂、尹先炳、邓启修、阙森华、刘夕青、岳心广、胡政、叶再元、孟谦、黄定基、朱仕朴、沈润生、朱玉山、林青、黄新义、郑重、田麟勋、益平、张云、王直哲、陈昌奉、萧光、杨光池、杨子明、毛普安、王敬群、李占武、李华安、罗友林、林海云、赖祖烈、林恺、胡弼亮、程启光、伍辉文、王传训、刘顺文、陈明友、刘远生、黄良诚、牟泽衍、周树槐、旷泉吉、曾昭林、武杰、曾广初、王琳、黄新远、段辉亮、张怀礼、喻楚杰、刘生标、黄永辉、陈慧清(女)、彭嘉伦、刘鼎、王逸群、戴季英、陈正峰、方官富、程荣耀、王立中、赵国威、罗龙生、吴昌炽、聂洪国、欧阳竞、张水泉、王昌虎、马平、符必玖、朱明辉、涂其友、王志廉、张广恩、陈德三、尹保仁、王恩厚、杨启轩、唐国华、许德厚、长虹、张仁、谷佑箴(白族)、孟克、孙洪道、罗孟刚、陈野萍等。

#### 四、历经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高级将领和共和国省部级领导

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队伍中，也有一批指战员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其中有元帅1位：陈毅；大将1位：粟裕(侗族)；上将4位：叶飞、钟期光、傅秋涛、万海峰；中将7位：卢胜、刘培善、张藩、林维先、饶守坤、黄火星、梁从学；少将86位：王直、王胜、王义勋、王香雄、王蕴瑞、邓少东、孔峭岬、叶泰清、卢文新、朱云谦、朱直光、朱鹤云(壮族)、邬兰亭、刘文学、刘玉堂、刘永生、刘亨云、刘毓标、江腾蛟、阮汉清、阮贤榜、孙克



骥、李士怀、李长如、李世安、李世焱、李彬山、杨汉林、杨银声、吴詠湘、吴嘉民、何志远、邱相田、余明、汪少川、汪克明、张开荆、张日清、张文碧、张闯初、张宜爱、张强生、张雍秋、陈挺、陈祥、陈仁洪、陈茂辉、陈铁君、林胜国、罗斌(福建)、罗厚福、罗桂华、罗维道、罗湘涛、郑贵卿、胡贤才、钟发宗、钟国楚、段焕竞、姜茂生、秦化龙、倪南山、高立忠、萧选进、黄仁廷、黄玉庭、康林、梁金华、彭胜标、彭德清、童炎生、曾如清、曾昭墟、谢锐、詹化雨、蔡炳臣、廖成美、熊挺、熊兆仁、戴克明、李元(湖南)、李人林、顾鸿、马白山、周庆鸣、周子楨等。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指战员，还有一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了省部级和部队军级以上的领导职务。他们是：马长炎、王国华、文敏生、方方、方毅、方志纯、尹林平、邓子恢、古大存、艾明山、左丰美、左洪涛、龙跃、卢叨、冯白驹、伍洪祥、江渭清、许彧青、孙仲德、杨尚奎、李六如、李步新、吴实、吴生敏、吴怀才、吴大胜、何耀榜、宋孟邻、汪金祥、陈一新、陈丕显、陈再励、陈郁发、陈福胜、张凯、张祥、张兆汉、张如屏、张旺午、张鼎丞、范式人、林辉山、罗其南、罗孟文、罗炳钦、周里、周骏鸣、胡明、胡德兰(女)、贺敏学、桂林栖、袁仲贤、袁学之、徐敏(女)、徐觉非、郭光洲、黄明、黄康、黄宏儒、黄知真、黄耀南、梁广、程序、温仰春、曾山、曾镜冰、谢威、蓝荣玉、赖绍尧、谭余保、谭启龙、谭震林、潘友宏、薛子正、魏金水、何浚、黄国璋、谢育才、许立、曾志(女)、朱曼平、许军成、唐少田、钟得胜、梁国斌、钟大湖(畲族)、袁血卒、郑丹甫、周

桂生、吴英诚、乐少华、俞炳辉、黄宏伸、周绍昆、张治银、陈桂昌、蔡园、赖畅茂、彭嘉珠、黄吉民等<sup>①</sup>。

---

<sup>①</sup> 这些领导人中也有个别的不是在南方8省而是在其他省份坚持革命斗争的。

# 《中共党史资料》第 51—60 辑\*

## 目录索引

### 文 献

-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张闻天(53. 1)  
增强新干部新党员的党性…… 陈 云(54. 1)  
一组“三一八”惨案资料并注释…… 王善中(57. 1)

### 回 忆 录

#### 忆抗大东北干部队挺进冀中

- 兼忆张学思同志…… 高存信(51. 1)

#### 忆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酒泉卫星发射

- 基地 …… 粟右山(51. 20)

- 忆党中央在转战陕北中召开的小河会议…… 习仲勋(52. 1)

#### 1965 年中央组织部关于党的建设的

- 三个报告的形成过程 …… 赵生晖(52. 12)

#### 从梨园口到星星峡

- 记西路军历史的最后一页 …… 刘 琦(53. 21)

- 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记 …… 李 锐(53. 28)

---

\* 索引分类文章按发表先后顺序排列；标题后面括号小圆点前数字代表辑数，圆点后数字代表页数。

在庐山会议上 .....	万 毅(53.56)
忆抗战时期党在东北的秘密工作 .....	钟子云(54.7)
惨绝人寰的长城“无人区” .....	李运昌(54.14)
陈集歼灭战 .....	邢泽、王志甲、沈政、孙志杰(54.26)
回忆嫩江剿匪 .....	张汉丞(54.31)
在我军第一所航校学飞行 .....	韩明阳(54.55)
援越顾问团工作琐忆 .....	张德群(54.71)
从“九一八”到“七七” .....	温济泽(55.1)
毛主席关怀我们办抗大 .....	莫文骅(55.6)
追忆平型关血战 .....	孙 毅(55.18)
人民自卫军的诞生 .....	吕正操(55.26)
回忆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的货币斗争 .....	杨 波(55.33)
工人干部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	
——忆抗战时期党对工人干部的培养 .....	马洪等(55.40)
战斗在狼牙山上 .....	葛振林(55.49)
突破日军的“铁壁合围” .....	曾思玉(55.57)
美军观察员多兰上尉在一次惊险的	
地道战中 .....	高存信(55.68)
华中反攻的序幕——车桥之战 .....	叶 飞(55.78)
用胜利迎接大反攻	
——记 1945 年冀中我军夏季攻势的第二	
阶段作战 .....	李 健(55.86)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延安的学习生活 .....	王兆相(55.95)
抗日烽火中的晋察冀妇女 .....	田秀涓(55.110)
1938 年长沙抗战文化中的“三报六刊” .....	张生力(55.119)
夜渡金沙 .....	黄新廷(56.1)
难忘的草地征程 .....	裴周玉(56.11)

我在西北经历的三次红军大会师 .....	陈鹤桥(56.18)
在日机轰炸中坚持斗争 .....	童小鹏(56.29)
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 .....	彭施鲁(56.32)
从延安到哈尔滨	
——回忆党中央先遣组派往东北 .....	钟子云(56.50)
押解和看押日、伪战犯 .....	徐其富、迟生、董家义(56.60)
刘伯承与中央教导师的组建 .....	裴周五(57.20)
艰难岁月几多事、但留真情在人间	
——忆和刘志丹在神府的最后几次会面 .....	王兆相(57.30)
延安时期的“赵占魁”运动 .....	杨长春(57.44)
“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 .....	李 锐(57.56)
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 .....	曹 瑛(58.1)
1947年晋绥的土改整党 .....	龚子荣(58.18)
在莫斯科六年半 .....	张德群(58.31)
八角亭编书记 .....	李 新(58.42)
红军长征初期的教导师 .....	孙 毅(59.1)
红色上干队 .....	莫文骅(59.10)
长征中的红军干部团 .....	方 强(59.16)
在长征中从事技术侦察工作 .....	王永潜(59.24)
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交往 .....	尚 钺(60.1)
对杨献珍反对“五风”的一点追忆 .....	庞长富(60.40)
我了解的有关杨献珍的哲学“罪案” .....	艾恒武(60.8)
改革开放之初的广州工作 .....	梁灵光(60.44)

## 专 题 资 料

进军大西南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

——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用兵艺术的光辉范例 .....	李兆荣(51.37)
建国初期的城市工商业调整 .....	徐稼华(51.54)
邓小平主持的 1975 年全面整顿 .....	张化(51.73)
邓小平与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 .....	黄如军(51.100)
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 .....	梁秀峰(52.22)
建国初期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概述 .....	于武真(52.48)
建国初期党关于就业问题的政策 .....	武力(52.6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政策的由来及发展 .....	杨亲华(53.65)
改革开放在浦东 .....	吴祥华 徐建刚(53.81)
改革开放在珠海 .....	陈锐明 刘利亚(53.93)
改革开放在厦门 .....	黄顺通(53.109)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围绕三民主义的一场论战 .....	郑德荣 董世明(54.77)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财经工作 .....	高宏的(54.92)
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前前后后 .....	刘以顺(54.102)
“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冤案酿成始末 .....	陈文斌(54.123)
烽火摇篮育新人	
——记“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	黄金轩(55.130)
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 .....	董福庆(55.138)
香港沦陷前的抗战文化运动 .....	袁小伦(55.155)
长征途中任弼时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	宋毅军(56.71)
建国以来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简介 .....	朱兆中(56.99)

红卫兵运动始末·····	关海庭(56.114)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前前后后·····	柳建辉(56.138)
中国共产党民族自治政策的成功尝试	
——记1936年红军西征期间建立的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孙国标(57.114)
延安的最高学府	
——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	宋金寿(57.123)
高岗发难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林蕴晖(57.132)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回顾·····	唐小莉(57.156)
五十年代国营企业党政关系的演变	
及其原因·····	武力(58.67)
中共八大后对高级社的整顿·····	高化民(58.82)
“双百”方针的形成过程·····	夏杏珍(58.104)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与民办教育·····	张志义 王文源(58.125)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发表·····	赵俊清(59.33)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斗争历程·····	熊向晖(59.44)
批林整风运动始末·····	郑谦(59.89)
围绕“风庆轮问题”的一场斗争·····	苏采青(59.123)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的政策·····	李荣珍(60.98)
建国前后取缔一贯道的斗争·····	郭玉强(60.114)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梁秀峰(60.136)
中共八大对“一五”经济工作的分析·····	董志凯(60.160)

## 人物介绍·传略·年谱

阿合提买提江·卡斯米传略·····	谢敏(52.81)
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传略·····	孟宪典 谢敏(52.96)

- 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陶行知…………… 周 毅(55.173)
- 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缪伯英传略…………… 伊胜利 陈书智(56.162)
- 李克农传略…………… 林 聪(57.168)
-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若干论述…………… 陈明显 崔艳明(58.168)
- 刘善本驾机起义到延安…………… 韩明阳(58.176)
- 耀邦同志在湘潭…………… 唐 非(59.149)
- 高君宇年谱…………… 张思荣(59.160)
- 杨献珍的生平及主要贡献…………… 汪家鏐(60.175)
- 杨献珍的风范…………… 萧岛泉(60.180)

## 会议介绍

-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 郑世铿(51.121)
- 遵义会议…………… 佟 静(53.119)
- 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 林蕴晖(54.136)
- 1941年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  
…………… 袁武振 梁月兰(55.181)

## 史实考订

- 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游泳》写作背景考  
…………… 张保山 沈世昌 陈书壮(51.197)
- 历史见证者的自述和辨证  
——老同志谈陕北建党时间评述…………… 生 德等(52.198)
- 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员考析…………… 钱听涛(53.194)



- 中央致叶挺两则电文释疑……………余海明(54.201)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面沦陷时间考……………宋德玲(55.219)  
 关于毛泽东挽黄公略联中几个字词的辩证……………吴直雄(56.187)

## 小 资 料

- 与国民党谈判释放张辉瓒身历记……………涂作潮(51.202)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反腐化斗争……………叶成林(53.203)  
 救亡名曲《松花江上》的诞生与传播……………宋新勇(55.227)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联合组建的游击支队……………姚莲瑞(56.189)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始末……………史言(57.245)  
 “彝海结盟”与党的民族政策……………叶心瑜(58.189)  
 “四人帮”对邓小平出席联大之诘难……………苏采青(58.197)  
 长征中的《红星报》……………孔宪东 顾鹏(60.197)  
 历经长征的新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名录……………谭铮(60.206)

## 大 事 记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发展大事记(之一)……………编写组(51.139)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发展大事记(之二)……………编写组(52.114)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发展大事记(之三)……………编写组(53.128)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 发展大事记(之四)..... 编写组(54. 151)
-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活动  
大事记..... 王 真(55. 189)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发展大事记(续完)..... 编写组(56. 167)
-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生平大事记..... 安建设(57. 215)

## 经济特区

- 改革开放在海南..... 唐昆宁 鲁 兵(58. 134)
- 改革开放在深圳..... 黄 玲(58. 144)
- 改革开放在汕头..... 陈维烟 王天海(58. 159)

## 资料信息 信息窗

-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  
中译本即将出版..... 陈 夕(58. 201)
- 《知青书信选编》、《知青日记选编》  
的史料价值..... 史卫民(59. 189)

## 民国史·现代史

- 黄埔军校与中国共产党..... 肖 牲(52. 181)
- 日本帝国主义在牡丹江的经济掠夺..... 张兆庶等(57. 235)

## 读者·作者·编者

- 对李志民回忆录《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的几点补充意见..... 陈鹤桥(51. 205)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